

继续革命

一九七六年

至

二零二六年

毛泽东同志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MLM-CRS



目录

目录	
阅读 & 转载须知	1
邮箱联系方式	4
编者的话	5
文化大革命万岁！	6
在深入工人阶级的反修斗争中继续革命	7
从教育革命到教育复辟——回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革命	20
托洛茨基主义批判（1）——“官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问题	38
中国当代阶级斗争	54
中国劳动中介的扩张及其对工人的压迫	55
大龄采茶女工调查报告	79
中国马列毛主义学生的阶级斗争	94
理论辨析	117
革命队伍内部思想斗争经验的简单总结	118
软件行业简单政治经济学分析	142
论民主集中制与工人的民主制度的关系	156
附录	161
本刊后记	162
致歉 & 致谢	164
关于我们	166
更安全的安装 xmpp 教程	172

阅读 & 转载须知

阅读提醒

建议手机安装使用自由软件 MuPDF 阅读，防止监控。下载链接：

- 点击链接下载 PDF 阅读器 MuPDF (清华大学 tuna 镜像源)
- 点击链接下载 PDF 阅读器 MuPDF (南京大学镜像源)
- 点击链接下载 PDF 阅读器 MuPDF (上海科技大学镜像源)

电脑建议使用 Edge 浏览器，或者**自由来源**的浏览器阅读。特别地，建议打开双页视图以获得更好体验。

- 在 Edge 中：页面视图 -> 选择“双页”，勾选“单独显示封面”
- 在 Chrome (其他使用 PDFium 的浏览器) 中：右上角：-> 勾选“双页视图”

MuPDF 使用贴士

MuPDF 打开文件后，上方导航栏右侧出现了三个图标（若没有，单击页面空白处），分别为：

- 一个横躺的回形针，单击使其变成蓝色，使你可以**点击 PDF 中链接实现跳转**。
- 一个放大镜，单击使用搜索功能，可以搜索内容（特别的，**不在一行的搜不到**），此时搜索栏最左边的叉号为退出搜索，中间为搜索关键词，右侧左尖括号为上一个匹配项，右尖为下一个。
- 竖着的三横线加三点，为目录，单击显示**目录**，可以**快速跳转**

转载要求

《继续革命》报的文章在此处采取 CC-BY-SA 协议提供。CC 即为知识共享协议簇，允许读者自由复制分发和再创作；BY 即为署名，要求读者在复制分发时必须保留原署名；SA 即为相同方式分享，要求衍生作品必须采用相同协议，即 CC-BY-SA 协议。若想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复制分发，需要联系我们的邮箱 (MLM-CRS@proton.me) 进行沟通协商。虽然 CC-BY-SA 是资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产物。但是本报同样认为其原则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使用，因而本报保留其保留署名自由共享的合理内核。

特别的，你只需要做到完全地转发整个 PDF 文档，并且不设法禁止对方再次转发，就可满足以上要求。

- 本报的 markdown 源码将公开于 codeberg 仓库, 你可以在工单 issue 处提建议, 当然更建议加入我们的读者交流群《继续革命》群众反修阵线
- 排版工具源码公开于 codeberg 仓库

转载安全

然而，本刊作为政治性刊物，我们不建议你在墙内实名制平台转发，这可能威胁到你的安全。对于墙外平台，且没有和你的墙内平台身份有关联的，一般没有问题。

建议先加入我们的读者交流群《继续革命》群众反修阵线，我们会教授更安全的转发方式。

后续更新

提供一系列**永久性**链接。提供放置时免翻墙镜像，一个一个尝试即可。当然，我们更推荐已按照后面的教程**安全地翻墙**。

- [MediaFire 网盘](#)
- [Github Release](#), [Github 镜像 Release](#) (V-数标号为本刊内容, 找到对应 release, 点开 assets 即可找到 pdf 下载)
- [网络版](#), [网络版 cf pages 部署](#) (注意使用左侧[网站目录目录导航](#))

XMPP 群聊会第一时间发布更新，期待你的加入。

邮箱联系方式

本报邮箱：MLM-CRS@proton.me

编辑部希望收集广大群众对本报的意见，各位同志在看完我们的文章以后，可以向我们发送邮件，告诉我们自己的感悟，给我们的文章提出一些建议，凡是有利的批评建议，我们都是会回复的。如果对某些文章特别感兴趣，我们也可以让文章作者直接和你对接，来详细谈谈一些问题。我们鼓励各位同志向我们发送邮件和进行投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报刊读后感，现实被压迫的经历（我们认真读完这些经历，并和你进行交流，如果有什么被资本主义社会压迫的经历，完全可以寻找我们倾诉），文章投稿等等，对于这些，编辑部是十分欢迎的。如果想加入本组织，也可以通过发邮件的方式与我们取得沟通，或者直接通过本报自带的教程下载 xmpp，来到我们的群聊与我们进行交流。

我们非常建议你前往 <https://outlook.live.com> 注册一个新 outlook 邮箱，使用和实名账号完全不同的用户名注册一个新号与我们联系。outlook 是国内不翻墙可以接触到的最安全的邮箱。

当然，直接来 xmpp 与我们交流无疑是极好的。

编者的话

《继续革命》编辑部

主要由于我们编辑工作的安排失误，原定于最晚 10 月 7 日出刊的《继续革命》第 14 期延后了数日才发布，在此向各位读者同志们表达歉意。

在《继续革命》第 13 期的文章《星火可以燎原——俄国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小组历史》中，在介绍勃鲁斯涅夫小组诞生的历史背景时，由于作者笔误，将“19 世纪 90 年代”错写成了“20 世纪 90 年代”。经过一名读者同志的提醒，我们才发现了该错误。在此为我们的错误向大家致歉，并向这名读者同志表示感谢！

此外，《继续革命》第 13 期还收到了其他读者同志的一些反馈意见，虽然我们未能全部采纳这些意见，但仍然需要向这些认真阅读了我们的刊物并给出宝贵建议的读者同志们表示感谢！

最后，由于第 13 期的文章《中国马列毛主义学生的阶级斗争》的排版有较大问题，我们在本期刊物中发布了《中国马列毛主义学生的阶级斗争》的重新排版版本。

致以革命的敬礼！

文化大革命万岁！

在深入工人阶级的反修斗争中继续革命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幕暨毛主席逝世五十周年祭

《继续革命》编辑部

一、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和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落幕，已经整整五十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用以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工具，也已经与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告别五十年了。

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机器告诉我们，毛泽东主席的晚年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与“毛泽东思想”是无关联的，文化大革命死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不再了。但是，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死，文化大革命还“活”着，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是毛泽东主席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继续革命问题的伟大实践，亿万革命人民都踊跃参与其中；毛泽东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俨然成为一种幽灵，漂浮在资产阶级的身边，使之深深恐惧，连谈论都不敢谈论。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性的革命印记，是一把永远悬在中国资产阶级头上的剑，一待时机成熟，就会落下将这一伙叛徒消灭。

现在统治着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团，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叛徒，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叛徒，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叛徒，更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叛徒，他们背叛了中国革命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背叛了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为建设新中国而献出的亿万条宝贵生命的伟大牺牲。他们和国际帝修反是一丘之貉，他们已彻底走向反动。正因如此，他们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活动怕得要死，恨得要死，他们极端

仇视人民，极端害怕人民，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讳莫如深。

他们的前身——党内资产阶级，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用宫廷政变的恶毒手段逮捕了中央的革命派领导人，施展种种阴险狡诈的手段，篡夺了中国的党政军大权，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团。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变，是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变。自此以后，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被剥夺了，他们又处在—批卑鄙工贼——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奴役之下。不仅如此，这伙卑鄙工贼还与当年苏修的叛徒集团如出一辙，厚着脸皮，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自居，将继承自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工程和革命人民的创造包装为所谓“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为自己歌功颂德。他们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披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外衣，把国企蜕变为自己掌握的工具，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假借“国家”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掠夺国库，采取各种手段，任意侵吞中国人民的劳动果实而骄奢淫逸，作威作福。

这一伙叛徒越来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来维持自己背叛革命的反动统治。今日之中修，在全国各地布下了严密监控，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反动规定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受压迫上访的人被暴力机关直接或间接打击迫害，有甚者还被关入形同监狱的精神病院。他们甚至出动坦克，对中国人民的反修斗争进行血腥镇压。

这一伙叛徒颠覆了教育革命的成果，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占据学校，使学校重新沦为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机器，变成了他们实施资产阶级奴化教育和保持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青年一代被塑造成服从命令、精神麻木、不具备反抗意识的顺民。无数青少年患上了抑郁症，甚至通过自杀以摆脱现实的苦难。这就是这一伙叛徒在“义务教育”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这一伙叛徒在中国复辟父权制，妇女从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能顶半边天”重

新变为了剥削阶级男子的奴隶，被排除在了社会化大生产之外，只能从事狭隘的家务，沦为丈夫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庭奴隶。这就是这一伙叛徒在“妇女解放”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现在，叛徒集团还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采取种种强制手段使之“汉化”。据自由派所说，叛徒集团还采取奴役、监禁等毒辣手段，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迫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为各族人民的监狱。

他们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法西斯专政，严格控制出版行业，在互联网上搭起防火长城使之与世界隔绝，缩小中国人民的眼界，疯狂地摧残和压制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思想，却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象洪水一样到处泛滥。毛泽东时代滋养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遭到严重摧残。毛主席亲自培育起来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日益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他们肆鼓吹帝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把互联网、出版行业、报刊媒体作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

他们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维护自己反动统治，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的同时，还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推行穷凶极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幌子下，实施新殖民主义，到处兜售修正主义的鸦片，麻醉人民群众，出卖革命利益，破坏革命斗争。

他们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共同的敌人，是万恶不赦的历史罪人，只配站在历史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亿万革命人民的审判。

他们造谣惑众，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浩劫”，是“灾难”。这是彻头彻尾的污蔑！文化大革命明明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继续，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原则的继续，是无数被修正主义路线压迫的革命闯将翻身的节日，是革命人民盛大的节日！他们恣意横行，好像社会主

义已经淹死在血泊之中，而无产阶级已经注定要永世受奴役了。可是，即使一次文化大革命落幕了，社会主义革命仍要发生，无产阶级仍要打碎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将革命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还根本没有消亡。

今日之中国正是建立在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基础上的，这十年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岂是靠他们这一伙叛徒热昏的胡话就可以抹杀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亿万革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全国的革命人民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帜之下，向全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扫荡，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一类骗子的反革命阴谋。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了斗批改的伟大变革，荡涤了其中资产阶级反动的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的污泥，在生产领域不断限制和缩小资产阶级法权，誓要将新生产资产阶级分子得以诞生的基础消灭掉，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战斗到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中，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派成长起来。他们在文化革命时期，充当革命闯将，站在文化革命的前线；在文化革命落幕后，坚持斗争，死不投降，继续革命，充分彰显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化革命深入发展，出现了许多突出工农兵英雄形象的文艺作品，改变了千百年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局面，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教育战线上，教育革命成果突出，学校教育“三脱离”的状况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得到根本改变；工人阶级及其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领导和管理学校；有实战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大学；千百万知识青年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踊跃上山下乡，汇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旧传统、旧观念，树立起无产阶级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新思想。

在卫生战线，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建立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

医疗制度，涌现出大批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革命人民辛勤劳作，粮食产量连年增长。工业战线上，生产持续上升，质量增高，品种增加。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北京的工业产值已是原来的三倍左右，上海的工业产值已是原来的两倍左右；拿原油产量来说，大庆已是原来的五倍左右。

如此伟大的成就，难道与这伙叛徒所说的“浩劫”“动乱”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恰恰相反，**文化大革命好得很！**所谓“文革浩劫”的一些事例，正是这伙叛徒的拥趸做出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这些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扩大打击面，在社会上批斗游街小牛鬼蛇神，将斗争对象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化为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打击革命派，完全违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受到革命人民的严厉批评。这伙叛徒又有什么颜面来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这样的伟大胜利，这伙叛徒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无时无刻不梦想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拼命挣扎，继续捣乱，他们代表修正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活动。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这伙叛徒集团的前身，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违反党的纪律，私自串联勾结，结成了一个反革命的神圣同盟。在毛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以后，就采取宫廷政变的卑鄙手段，将中央的革命派领导人逮捕。他们篡党夺权，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为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党，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却还宣称自己继承毛主席遗志，并开展所谓揭批查的“伟大”斗争。

这伙叛徒歪曲毛主席的话，捏造荒谬绝伦的谎言，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国上下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否定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颠覆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成果，窃取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果实。至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断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被颠覆了。

在此起彼伏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代表腐朽落后势力的复辟一方，取得了暂时的阶段性的胜利，在中国重建了资产阶级专政。可是正如前文我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死。

正所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在复辟之初，经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一批或多或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就在斗争实践当中正确认识到了，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不但不能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相反，它只能是从反面印证了在无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二、新条件下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的继续革命

反修正主义斗争，顾名思义，就是与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无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的针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已经转入党内，党内资产阶级就是他们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执行一条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根本相悖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在反修正主义斗争中继续进行的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反修斗争，是历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继续。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自从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来，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冒牌社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主线。而当科学社会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获得了统治地位以后，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主线，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生中，曾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

主义、杜林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展开了坚决不调和的斗争。在他们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长期的和平环境给第二国际各国党打上了合法主义的烙印；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用掠夺来的高额利润的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形成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大批小生产者破产，被抛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将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小资产阶级传统习惯带到工人队伍中去。这些综合起来，就导致了修正主义的产生。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

列宁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之流展开了坚决而不调和的斗争，在其一生中树立了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典范。在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党内又产生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修正主义派别，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粉碎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一样：“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

斯大林逝世以后，由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苏联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镇压劳动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风暴中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国家。

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真实面目不断暴露。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领导中国共产党，与全世界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并肩作战，

同以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为中心的当时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伟大斗争，经过大辩论、大斗争、大论战，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毛主席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面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规律，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自此，反修正主义斗争从过去在暴力革命中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发展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意识地反对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历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的继续，在运动过程中深刻揭露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及其实质。

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又有了新的内涵。统治着中国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仍然将自己的党称为共产党，他们在全国上下执行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之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仅是反对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更是反对执政的修正主义集团、修正主义党的斗争。如果要在我国继续革命，那么就必然要坚持反修斗争。相应的，我国的继续革命只有在反修斗争中才有可能实现。**反修正主义的继续革命是我们时代的中心任务。**

在如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还有着安托西修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我们必须坚决与这些派别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修正主义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现实力量，并不

只是少数人在思想上犯了错误，主要地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此，反修斗争不能仅仅停留在组织内的思想斗争、路线斗争、反中修的活动，必须深入实际的阶级关系和群众斗争。

如果革命者不深入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反修就容易变成少数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毫无意义的空洞争论；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同工人运动结合，批判的武器就不能转化为物质的批判。**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必须深入群众，革命才能成功。

文化大革命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亿万群众在这场运动中都发动起来了。革命人民发挥高度的革命积极性，自觉地投入到运动当中去。

历史上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必须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正如列宁所说：“**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无产阶级组织和一切革命者，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一定要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善于发现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投身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才能得到锻炼和成长。正确的纲领、路线，也只有在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并得到检验和贯彻执行。

毛泽东主席指出：“**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我们在现在的中国进行反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革命，也必须依靠广泛的宣传与鼓动工作，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

利。

但是，仅仅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历史的经验证明，有了革命形势，有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核心，即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这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消灭阶级这一最终目的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革命的发展需要有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需要建设一个同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决裂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否则就会导致革命力量分散而溃败。

这样的以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是靠少数自诩先进的个人凭热情和自觉建立起来的，它只能从成千上万的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中积累力量，从与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长期斗争中锻炼成熟，领导工人与反动统治斗争中发展壮大。

而正如历史上一切国家的革命运动一样，革命理论总是先为脱产的知识分子所掌握，如今的中国也不例外。现如今，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还主要的是为学生、小资产阶级和一些选择融工的革命知识分子所掌握，而没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工人运动中缺席。

为了改变这种局势，促进革命的发展，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深入工人阶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革命的组织都应当坚持融工的工作路线。既在深入工人阶级的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又在融工的宣传鼓动活动中向工人们揭露修正主义，宣传革命理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工人当中的影响。

在这个斗争实践当中，我们将锻炼出一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干部和具有深厚阶级感情的工人革命者，并为在中国重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群众基础上都做好准备，以便于未来革命政党的建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一个领导核心，极大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因此，革命的当前任务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在深入工人阶级的反修斗争中继续革命**。也就是，深入工人阶级进行宣传、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建设组织，发展运动，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并在这一过程中锻炼革命干部、培养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为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创造条件。**宣传-融工-建党，为在中国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在今天的中国，继续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就是对毛泽东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好的纪念。

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前，时刻挂念着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时刻挂念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的伟大的继续革命精神，其核心就是坚定地站在亿万革命人民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一切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方面的潮流，为捍卫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斗争，为共产主义革命战斗到死。概括起来就是说，兴无灭资，造反有理，信任群众，永远革命。

为要在新条件下继续革命，我们就必须继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革命的伟大精神，坚定站在中国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一方，反对资产阶级，再度进行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一精神当然不是在书斋里就能取得的，我们必须在深入工人阶级的反修斗争中才有可能真正领悟这些精神，我们必须把理论从书本上解放出来，让革命理论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让批判的武器变为武器的批判。

现在，毛主席逝世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过去五十年了。这五十年来，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并没有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消失，反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毛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离开我们五十年了，但是他们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仍在滋润着世界无产阶级。

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它的基本经验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尽管出现了各种新的问题，遇到各种困难和曲折，甚至暂时落幕了。但是，正如列宁在评价十月革命的意义时所说的那样：“**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即使文化大革命落幕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精神将一再表现出来。

斯大林同志说：“**十月革命并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就是国际性世界性的革命。**”就像十月革命并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一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同时也是国际性的革命。这场大革命获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热烈支持，在国际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闯将，在复辟发生以后，坚持斗争，谱写了无数悲壮的慨歌。现实的资本主义压迫也呼唤着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下岗工人举起巨幅毛主席画像，人们渴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文化大革命已在中国留下了根本不可磨灭的印记。叛徒集团认为已经彻底消灭的文化大革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一起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纪念毛主席，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不能停留在对过去伟大革命的追忆之中。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进行革命。**我们必须继承毛主席遗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旗帜，在深入工人阶级的反修斗争中继续革命，把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再次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让我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再度迎接那光辉的、属于无产阶级的盛大的节日。

让我们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那盛大的节日里相见。

让我们永远无愧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伟大旗帜，永远无愧于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那火红的十年，永远无愧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光荣伟大美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我们将跨过英雄儿女的鲜血所流成的长河，到达彼岸的共产主义明天！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从教育革命到教育复辟——回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革命

寸心书社

毛主席对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面对台下那些青春的面孔，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事实上，毛主席关于青年和教育的论述，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教育方向和阶级性质的认识之上的。教育究竟由哪个阶级领导、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什么样的人，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回答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教育制度、招生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展开的。今天重新讨论这段历史，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某些教育形式的怀旧，而应当考察当年的教育革命究竟试图解决什么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后来重新出现。

毛主席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 123 页）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并不会随着政权性质的改变而自动消失。教育领域究竟由谁领导、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知识究竟掌握在谁手中，这些问题依然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加以解决。因此，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育方针和旧的教学方法。

今天，在毛主席逝世五十周年与资本主义复辟五十周年之际，重新回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革命，我们充分了解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教育制度，以及当

年的教育革命究竟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它采取了怎样的实践？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后来又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

一、教育革命首先面对的，是谁掌握教育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新中国的教育领域已经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表现为招生、教学、教材和学校管理等具体制度问题，但归根结底，都集中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教育由哪个阶级领导、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为了明确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具体研究文革之前的教育制度，以及这种教育制度对工农子弟的毒害程度，这里以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景山学院为例。

1. 教育领导权与工农子弟的入学问题

旧学校的教育大权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实行资产阶级的党阀和学阀的联合专政，少数资产阶级“权威”垄断了学术讲坛。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旧大学招生制度向资产阶级子女倾斜，反而将广大工农兵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旧大学在招生和教学上故意刁难、打击和迫害工农学生，例如利用考试分数线作为对工农的“封锁线”，迫使工农学生留级或退学。

文革之前的北京市景山学院的招生简章”中明文规定招生条件是：“智力发展条件较好，求知欲强，并有较好的生活习惯，身体健康，发育良好，无残疾及其他慢性病。”并从资本主义国家里搬来一套“智力测验”，对六、七岁的孩子考听力，口齿发音，认识汉语拼音，模仿外语发音，看相貌，试灵敏程度，考唱歌、跳舞，观察走路姿态等，还要经过初试和复试等二关。凡是营养不好，或穿着破烂的孩子，不经考试就被淘汰，对工农子女还要调查家庭，灯光设备如何，兄弟姐妹多少，家长能不能辅导，有没有好的生活环境……等。更可恨的是有的工农子女符合了他们

的“智力测验”只因家庭是工农出身，学校就千方百计地制造种种借口不予录取。

一九六二年从报考的 1300 儿童中招收 120 名，其中没有一个工农子女，而其中却有 40 人通过后门进入学校。一九六三年，从十一个高级幼儿园选送来的 358 名“尖子”中挑选了 109 人，其中工农子女只有 2 人，仅占 1.8%。六年来，该校共招收了一年级新生 907 名，其中工农子弟仅有 78 名，占总数的 8%。

相反，对一批有“靠山”有“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子女则大开方便之门。反共老手吴晗的儿子要读书，一个电话就进了景山学校。这种贵族学校的招生制度，激起了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愤怒地质问：“景山学校是中宣部的子女学校还是什么学校？”有工农家长说：“这学校是培养高干的，我们的孩子他看不上。”有的说：“景山学校门坎太高，我们的子女登不上。”

2.“智育第一”与教育培养目标的资产阶级性质

旧大学使学生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劳动，将学生关在校园内闭门读书，导致学生“越读越蠢”、缺乏阶级感情与实际工作能力。旧教育推行“智育第一”、“读书做官”、“成名成家”、“知识私有”和“白专道路”，引导学生将知识作为个人争取名利和特权的资本，这种教育引诱着学生去爬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小宝塔”。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目标应该培养到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当厂长，车间主任，党委书记，市长、县长”。景山学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童大林按照主子刘少奇的腔调疯狂叫喊：“我们的毕业生绝不能成为象雷锋那样头脑简单的人，如果都那样头脑简单中国就要亡国了。”“景山中学要出天才出专家，要培养一大批有名的大人物。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工程师，大作家”，“培养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国

家干部的骨干，掌权的人”“培养县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央委员、总理、领袖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要培养硬笔杆子制造舆论的人”，甚至歇斯底里地叫嚣：“培养不出马克思，培养出个希特勒也不错。”

在这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指导下，学校借口：“要承认人的才能有高低，不能每个人都成为专家，”建立了一套毒辣打击排斥工农子女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的“制度”。他们把学生强行分成三、六、九等，把“尖子”集中编成为“实验班”，这是第一等人，剩下的编为“普通班”，这是第二等人，把所谓“学习差”“纪律不好”“又脏又笨”的学生及留级生凑在一起组成“收容班”，这是第三等人。不同的等级分别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和政治权力。在被视为上等人的尖子班里，工农子女少得可怜。有的只有一二名。有的甚至连一个也没有，而被他们视为低等的收容班里，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女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这样幸运入学的工农子女被看成低等人，他们就是这样打击工农子女，压迫工农子女。

3. 教材与教学内容中的封、资、修问题

旧的理工科教材体系充满了买办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发展过程奉为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鼓吹“专家至上”。在文科和理论教学中，旧大学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哲学中宣扬唯心论，在历史学中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在自然科学中则鼓吹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例如，景山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就开始在教师的带领下，摇头晃脑地吟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后，随着年级的增长，古文数量越来越重，到六年级就要学完《桃花源记》等六十多篇古代寓言和短文，一百多首《游子吟》之类的古诗，还有那本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被反革命急先锋吴晗誉为“儿童启蒙的必读的《三字经》”；中学则要熟读，背诵大量的《古文观止》；高中毕业要求读一百首，还要念《史记选》《三国志》《资治通鉴》……名目繁多，举不胜举。为了学古文，学校不惜国家资金，先后购买《古文观止》五百多套，《左传故事选译》《春秋故事》等古典

文学三四千册。

4. 从教学僵化到脱离实践：旧教学方法的问题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下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旧教育制度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上课采用“满堂灌”的方式，把学生的学习限制在书本和课堂之中。学生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书本知识，却未必能够解决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种教学方法实际上颠倒了认识的规律。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教育，只会不断制造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因此，教育革命并不是简单更换教材或者调整课程，而是要改变学校同社会、同生产劳动、同工农群众之间的关系。毛主席对此发表过重要指示：“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教育领域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以“教育由哪个阶级领导、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的。资产阶级旧教育是维

护剥削阶级特权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必须通过彻底的教育革命将其改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那究竟该怎么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毛主席提出了以下论断：“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革命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并不是停留在对旧教育的批判上，而是试图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毛主席提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这实际上从领导权、教师队伍、办学形式、学生来源、教材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革命方向。

1. 改革教育领导权，改变学校的阶级性质

教育革命首先针对的是“**谁来领导学校、学校为谁服务**”的问题，将领导权问题放在教育革命的首要位置，提出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都应当由工人阶级领导，中小学可以由工厂举办或由工厂与街道联合举办，大学则吸收工人参加领导。其根本目的，是改变过去学校主要由知识分子群体掌握、教育同工农群众相脱离的状况，使学校成为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教育机构。

这种改革同时体现在扩大工农子弟接受教育的机会上。材料提到，教育革命提

出学校向“90%以上的工农”开放，并实行普通教育十年学制、农村九年学制，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等设想，以扩大教育设施和教育机会，提高群众的就学率。

因此，这一方面的核心不是简单增加学校数量，相反，这是为了解决教育的领导权、服务对象和教育机会问题，把学校从少数人的教育机构转变为面向广大劳动群众的教育机构。

2. 改革知识分子的培养和选拔道路，打破“知识贵族化”

第二个重要方面，是改变传统教育按照考试、学历和家庭条件选拔知识人才的道路。旧教育体系表面上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标准，实际上，学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教育机会，从来不是由一张试卷单独决定的。家庭所拥有的经济条件、文化环境、学校资源以及社会关系，都会影响一个青年接受教育、继续升学以及进入专业领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和专业技术人员就容易集中于城市学校、知识分子家庭和原有教育体系之中，形成知识生产与劳动群众相互隔离的局面。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所要改变的，首先就是这种知识人才来源上的封闭性。它提出要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包括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这并不只是扩大几个工农子弟的升学名额，相反，这已经开始从人才来源上改变过去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构成了：使长期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及其子女，有机会进入过去主要由城市知识阶层占据的专业领域，使劳动人民不再只是知识和技术的被使用者，也能够成为知识生产和文化建设的参与者。

这种改变的意义在于，它实际上触及了“谁有资格成为知识分子”这一问题。过去的教育体系往往把知识学习和体力劳动割裂开来，把掌握理论知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看作少数受过正规教育者的专门活动，而广大劳动群众则主要承担直接生产劳动。久而久之，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隔离的社会分工：一

部分人掌握知识，却脱离生产实践；另一部分人直接从事生产，却缺乏进入知识生产领域的条件。教育革命试图打破的，正是这种固定化的分工关系。

因此，工农兵进入大学、进入专业技术领域，并不仅仅意味着“工农子弟也可以上大学”，更意味着教育和知识生产的主体发生变化。一个来自工厂的工人可以成为工程技术人员，一个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可以进入农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具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可以参与教材编写、技术革新和教学工作。这样，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就不再只是停留在劳动现场，而能够进入学校、科研和文化领域；与此同时，学校中形成的理论知识也必须重新接受生产实践的检验。

另一方面，教育革命并没有把知识分子简单地看成教育革命的对象，更没有把专业知识本身视为需要抛弃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原有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真正服务于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改变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实践的状况。

因此，在对待原有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教育革命强调再教育和思想改造，强调创造条件让他们同工农结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并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重新认识自己的知识和专业。这里的核心并不是取消专业知识，而是改变专业知识的服务方向和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一个掌握专业知识的教授、工程师或科学家，如果始终脱离生产实践，把自己的知识看作个人地位和特权的来源，那么知识就很容易成为少数人的资本；而如果能够同工农群众结合，把专业知识用于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那么知识就能够成为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工具。

因此，教育革命实际上同时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第一，是谁能够成为知识人才的问题。要改变过去知识和专业技术人员主要从城市学校、知识分子家庭和传统考试体系中产生的状况，为工农兵及其子女进入大学、科研、技术和文化领域创造条件，使劳动人民能够进入过去由少数知识阶层长期占据的领域。

第二，是知识人才应该成为怎样的知识人才的问题。即使工农子弟进入了大学和专业领域，如果他们最终仍然脱离生产、脱离群众，把知识当作谋取个人地位和

特权的工具，那么仅仅改变学生的家庭出身，也不能真正改变教育的社会性质。因此，教育革命同时要求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接受工农兵群众的再教育，在生产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改变知识与劳动相分离的状况。

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如果只是让少数工农子弟进入旧教育体系，而不改变旧的知识生产方式，那么新进入学校的人仍然可能被原有的教育关系和思想体系所塑造；反过来，如果只要求原有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却不改变知识人才的来源和教育机会，那么知识生产仍然可能由原有知识阶层长期垄断。所以，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所试图改变的，不只是“谁能够上大学”，而是整个社会中知识、教育、劳动和专业分工之间的关系。它要求劳动人民能够掌握文化和科学知识，同时要求掌握知识的人重新同劳动生产和劳动群众结合起来。

由此，这一方面可以概括为两条道路的改变：

一方面，是从“**谁当学生、谁能够升学**”的问题上，扩大工农兵及其子女进入教育和专业领域的机会，使劳动人民不再被排除在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之外；另一方面，是从“**谁来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同谁结合**”的问题上，改变知识分子脱离劳动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状况，使知识和专业技术重新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前者改变的是知识人才的来源和社会基础，后者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方向。二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教育革命对于传统知识人才培养道路的根本否定。

因此，教育革命所追求的，从来都不是把原来的知识分子换成工农子弟，也不是用“工农身份”取代专业能力，而是建立起了一条使劳动人民掌握知识、参与知识生产，同时使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结合，使知识真正进入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之中的革命道路。其最终目标，正：“**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意味着文化、科学和专业知识的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而应当逐步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知识分子劳动化”，则意味着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置于劳动群众之上，而必须通过同生产劳动和群众实践相结合，使自己的知识接受实践检验，并成为服务劳动人民、改造社会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教育革命所触及的并不只是教育领域本身，而是知识创造的社会基础。它试图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长期存在的隔离，使学校不再只是把劳动者培养成知识的消费者，而是使劳动人民逐步成为知识的掌握者、生产者和传播者。

3. 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

教育革命不仅要求改变学校的领导权和教育对象，也要求改变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传统教育把学校、课堂和书本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场所，学生长期生活在校园之中，学习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脱离，容易形成重书本、轻实践，重理论知识、轻实际能力的状况。因此，教育革命试图打破这种封闭的教育模式，使教学过程同生产、社会和群众联系起来，使学生能够在实际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学习知识、运用知识和检验知识。

这种改革首先表现在打破不同学科、不同教学环节之间的界限。清华提出打破过去把基础课和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线；同济等学校探索教学、设计、施工“三结合”的教学形式。这些探索都是为了改变过去基础理论与专业实践彼此分离的状况，使学生学习的知识能够直接同实际工作和生产实践联系起来。

其次，教育革命强调学校必须向社会和劳动群众开放。教师和科研人员可以同工厂、农村进行交流，学校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实行开门办学，把教学活动从封闭的校园延伸到工厂、农村以及其他社会实践场所。材料还提到校办工厂、厂校挂钩，以及医院办学、举办试点班等形式。这意味着学校不再被看作一个同社会生产相隔绝的封闭场所，而是要同实际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直接联系。

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材料提到现场教学、课堂讨论、民主评

议等方式，并概括为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学方法。与单纯依靠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学生在课本中接受知识相比，这种方式更加重视学生在具体实践中的学习，以及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讨论和相互学习。教育革命的实践方式也由过去比较单一的“指示—执行”“典型—学习”，进一步探索“讨论—共识”“互学—相长”的形式，使教育过程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群众性。这种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知识的重要环节。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一名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医专毕业生，把培养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通俗的农村卫生教材，介绍适合农村实际的医务书籍，并组织赤脚医生开展“兵教兵”，着重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使医疗知识能够在农村实践中迅速得到运用。

与此相对，也有医专毕业生的例子：这个人在学校中学习了多年医学知识，但由于长期脱离实际，参加工作后仍然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面对具体病例时，只会机械地运用书本上背诵的知识，甚至无法正确诊断一些常见疾病。材料由此指出，这种现象所暴露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专业或某一种教学方法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制度中知识同实践相脱离的问题。

因此，教育革命所强调的“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地在课程之外增加一些劳动活动，而是要求重新处理知识与实践、学校与社会、教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学生学习知识不能只停留在课堂和书本上，还要到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和运用；教师和知识分子也不能长期脱离劳动群众，而要通过同工农群众的接触和实践来丰富、检验自己的知识。当时的教师、科研人员与工厂农村之间的交流，学校与工厂的结合，以及医务人员到农村培养赤脚医生等实践，都体现了这一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革命试图改变的并不只是某几门课程或者某一种课堂教学形式，而是传统教育中“**学校脱离社会、教学脱离生产、知识脱离实践**”的整体状况。它要求教育打开学校的大门，使知识学习同劳动生产和群众实践发生联系，让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运用知识，同时通过实践检验知识的实际作用。其核心，就是使教育不再成为脱离社会现实的封闭活动，而成为同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相联系的过程。

4. 实行劳动教育和再教育，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教育革命还把劳动和社会实践本身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求学生参加劳动，而且进一步把劳动教育扩大到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和干部，通过他们同工农群众的结合，使长期脱离生产劳动和群众实践的人接受再教育。这里所说的“教育”，因而不局限于学校内部，而是延伸到工厂、农村以及整个社会实践之中。

首先，这种劳动教育体现在对学生和知识青年教育方式的改变上。我们说过，传统教育往往使学生长期生活在学校之中，学习主要围绕书本和课堂展开，同实际生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相隔离。教育革命则要求学生走出学校，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通过劳动认识生产过程和劳动群众。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求城市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中接受教育。材料指出，这一号召后来形成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整整一代知识青年产生了教育和锻炼作用。

其次，劳动教育并不只是针对没有参加工作的学生，进一步针对已经进入社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的实践，就要求长期脱离劳动的干部下放劳动，把劳动看作重新学习的重要机会。毛主席提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在职干部也应当分批下放劳动。由此形成的“五七”干校，实际上承担了干部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改变长期脱离劳动状况的作用。

这里的关键在于，教育革命并没有把“**已经毕业**”“**已经掌握知识**”理解为教育过程的终点。相反，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同样需要新的实践中继续学习。上海机械学院等学校的材料就提出，对于过去已经毕业、现在正在工作的中等和高等学校毕业生，也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同工农结合起来；对于能够在结合中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的人，应当加以鼓励。因此，劳动教育在这里具有明显的“**再教育**”性质。它针对就是知识同劳动、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即使拥有较多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如果长期脱离生产劳动和群众实践，也可能形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状况。因此，教育革命要求

知识分子通过劳动重新进入实际的生产和社会生活，在同工农群众的结合中认识现实，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知识。一名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医专毕业生，把培养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通过编写通俗的农村卫生教材、组织“兵教兵”等方式，把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用于农村实际工作，同时也在农村实践中继续学习。材料认为，这说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并非不能同工农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正确的方式，使他们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逐步改变原有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劳动教育实际上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方面，是教育学生和知识青年。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使他们摆脱单纯依靠课堂和书本学习的状态，进入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之中，在劳动中认识生产，在实践中认识社会，在同劳动群众的接触中获得新的经验。

另一方面，是对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再教育。对于已经具有文化知识、专业技能或者一定社会管理经验的人，同样要求他们参加劳动、接触群众，通过生产劳动重新认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和自身同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再教育针对的正是长期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群众的状况。

因此，劳动在教育革命中的意义，并不只是让学生“多参加一些劳动”，相反，是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作用：劳动既是学习知识、认识社会的一种途径，也是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重新同工农群众结合的一种途径。进一步说，教育革命通过这种劳动教育，改变传统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分离、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相分离的状况。传统教育容易把学校教育同劳动生产隔离开来，使接受较多教育的人逐渐成为脱离生产劳动的知识群体；而教育革命则试图通过劳动和再教育，使知识分子重新同劳动群众发生联系，同时让劳动人民获得更多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

因此，从整个教育革命来看，劳动教育和再教育实际上突破了“学校教育”的范围。教育不再只是学生在学校中接受知识的过程，也包括知识青年进入农村、干部进入“五七”干校、知识分子进入生产实践以及专业人员同工农群众结合等形式。

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已经打破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垄断。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让工农兵真正跨进学校大门，成为教育阵地的主人；他们大刀阔斧地砸碎了“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的阶梯，坚持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去改造各门学科，拆穿了自然科学中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唯心论神话，把书本知识与工农生产的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相连，真正致力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精神贵族”。

但当文革失败之后，走资派就又重蹈覆辙复辟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他们打着“正规化”和“尊重学术权威”的幌子，重新把分数再次奉为圭臬、捧上神坛，用冰冷的考试成绩筑起封锁线，实质上再次将广大工农子弟边缘化，却又假惺惺的将高考当作普通大众唯一一次翻身的机会；他们全面恢复了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僵化体系，让繁琐无用、与实际无关的理论重新占领讲台。时至今日，理论严重脱离实际、高分低能的现象愈演愈烈，教育重新沦为阶层固化的工具和通向资产阶级名利场的“小宝塔”。这种历史的倒退与重演，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当年那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批判是何等的高瞻远瞩。

三、从教育革命到教育复辟：教育路线的历史转折

让我们再放眼当下，面对早已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修政府也深知其难以为继，于是便像裱糊匠一般，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所谓“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他们打着“为学生减负”、“促进教育公平”的堂皇旗号，企图用行政手段一刀切地取缔校外补习班。然而，只要升学考试作为阶级分层工具的这一根本基础没有动摇，这种不触及本质的体制改良，注定只会演变成一场荒诞的闹剧。在这场“减负”运动中，资本与教育的结合并未被真正消灭，反而被迫转入地下，与监察机关打起了猫鼠游戏般的“游击战”。曾经摆在明面上的“商品教育”，如今转变成了更为隐秘、畸形的“黑市交易”。街头的辅导机构牌匾虽然摘

下了，但隐藏在高级住宅区、高端写字楼甚至以“住家保姆”、“高级家政”名义存在的私人定制辅导却大行其道。更为讽刺的是，政策的打压反而替那些资本雄厚的“高端优质”补习班完成了市场洗牌。这些地下机构借机增设了更为苛刻的门槛，不仅收费水涨船高，甚至还要看学生的所谓“悟性”。

教育资源的垄断被进一步加剧，普通的工农子弟甚至连“卷”的资格都被彻底剥夺，通向“小宝塔”的阶梯被彻底替换成了用金钱和特权堆砌的暗道。而身处这场风暴中心的广大学生，不仅没有从“减负”中得到任何喘息，反而沦为了更为可悲的牺牲品。为了争夺那寥寥无几的、所谓能上“好学校”的机会，他们被家长和升学焦虑裹挟着塞进这些隐秘的地下补习班。在那些缺乏监管的封闭空间里，学生不仅要面对成倍增加的、极度枯燥的应试课业，还要默默承受补习班老师为了追求“速效”而施加的巨大精神霸凌，甚至动辄打骂的体罚。这一轮轰轰烈烈的“减负”改革，非但没有砸碎束缚在学生身上的枷锁，反而用一种更隐蔽、更残酷的方式，让学生的心理与生理压力陡增。它无情地撕破了“教育公平”的遮羞布，让阶级固化以一种更为惨烈、更为内卷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也再一次从反面无情地证明：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培养精神贵族服务的目的，任何修修补补的改良，最终都只会重蹈覆辙，化作压在普通劳动人民子弟身上更沉重的大山。

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当下中修社会的所谓的“高等教育”，当教育彻底背离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目标后，大学早已沦为为资本增殖的加工厂、官僚特权的自留地和学阀门阀的独立王国。

在这里，知识被明码标价。几十年如一日死板僵化的教材，死死绑定着垄断采购与利益输送，早已沦为既得利益者赚得盆满钵满的“印钞机”。这种严重脱离社会生产实际的教育，导致学生耗费青春学到的知识，一进入残酷的自由市场便如同一纸空文。而在一些日新月异的高精尖学科中，体制的僵化甚至造就了“讲台上教授懂的还不如台下学生多”的滑稽局面，彻底扯下了“专家至上”的伪装。

到了研究生阶段，所谓的师生关系更是被赤裸裸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所取代。

导师摇身一变成为掌握生杀大权的“老板”，满怀热忱的学生则沦为任人宰割的廉价劳动力。在资本逻辑与绝对权力的驱使下，学阀们不仅用极低的待遇榨取学生的剩余价值，更为了满足私欲，恶意将能创造巨大价值的博士生延毕。学生们心血凝结的科研成果，常被强行窃取，甚至沦为导师在学术圈内权力置换、人情往来的“贡品”。近年来，不少青年学子因不堪难以承受的精神霸凌与重压而走向轻生的惨剧，正是这套吃人体制欠下的累累血债。

与平民学子的苦苦挣扎形成极为刺眼对比的，是学术特权明目张胆的世袭。那些出身学阀世家的子弟，凭借背后的暗箱交易和权力关系，神奇地在中学阶段就能“做出”前沿科研成果，或者刚进本科便获顶刊收录。这种有恃无恐的特权操作，将所谓的“教育公平”踩在脚下疯狂摩擦。而身居高位的教授们，为了争夺有限的科研经费，在内部大搞山头主义与派系斗争，为了发刊和迎合指标更是不惜大搞数据造假，炮制出无数荒唐的学术垃圾。

面对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积弊，他们也曾试图打出“产学研相结合”的旗号来进行修补。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利润导向和学阀挂帅下，这种所谓的结合，根本不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中“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伟大实践，而是彻底沦为了高校官僚与企业资本家相互勾结、共同分赃的利益联盟。其结出的恶果，便是如今遍地开花的所谓“校企联培”。在这个披着“联合培养”华丽外衣的体制下，青年学子被迫戴上了学校与企业的“双重枷锁”。一方面，学生以“实习生”或“联培生”的虚假身份被打包输送给企业，巧妙地被剥夺了正式劳动者应有的一切合法权益。他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拿着连维持基本生存都捉襟见肘的极低廉补贴，却要在企业里承担着全职甚至超负荷的高压工作，彻底沦为资本家毫无顾忌地榨取剩余价值的“高级耗材”。

另一方面，学校的学阀与行政官僚们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他们的控制。在被企业无情压榨了绝大部分白天的精力之后，学生们还要在深夜里拼命挤出时间，为了迎合学校那些苛刻的论文发表规定和毕业门槛而疲于奔命。资本要榨干他们的血汗，学校要收割他们的指标！撕开这层“高等教育改革”的伪善面纱，这种所谓

的“高端联培”，与那些大专院校打着“顶岗实习”的幌子，将毫无背景的职校学生如同包身工一般成批“卖”到血汗工厂流水线上的行径，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唯一的不同，仅仅是前者坐在实验室里耗尽脑力，后者站在工厂流水线旁消耗体力；前者被冠以“科研实践”的高雅名目，后者则是赤裸裸的廉价劳务输出。这根本不是什么教育的进步，而是官僚学阀与资本合流后，对青年无产者进行的又一场系统性、制度化的劳动力压榨与残酷掠夺。

这一切无情地证明：只要不砸碎这套把知识当资本、把学校当官场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学就不可能培养出掌握真理的劳动者，而只能源源不断地孵化出唯利是图的学阀、被压榨的学术奴工。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急速狂飙与自动化技术的全面铺开，机器取代产业工人的步伐正以空前的速度向前推进。这绝不仅是单纯的技术迭代，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总爆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支撑日益庞大的生产力，已经沦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进步非但没有成为解放人类的福音，反而化作了将成千上万劳动者无情抛入庞大失业大军的利刃。

一场更为深重、更为惨烈的系统性社会危机，已经不可避免地横亘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学子的面前。当机器抢走饭碗、资本垄断资源，毕业即失业的恐慌与阶级彻底固化的绝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然而，压迫愈深，觉醒愈烈。当荒诞的现实彻底击碎了小资产阶级学生试图实现阶级跃升的虚幻迷梦之时，我们不会选择屈服或沉沦，我们将带着对这个吃人社会更为透彻的洞察，带着对真正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无限向往，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发出属于我们这代青年最洪亮、最坚决的阶级怒吼！

从基础教育领域越减越重的“暗箱内卷”，到高等教育中门阀林立的学术名利场；从披着“产学研”外衣、实则大肆贩卖廉价青年劳动力的校企联培，再到如今在 AI 技术狂潮下日益逼近的全面失业危机——这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时代长卷，已经用铁一般的事实向我们宣告：教育从来不是脱离社会的桃花源，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是阶级再生产的统治工具。任何不触及所有权基础、不以无产阶级政

治挂帅为方向的改良主义修补，都不过是扬汤止沸的骗局。

当我们把这一系列教育乱象与社会危机串联起来，其背后的历史脉络便彻底原形毕露：背离了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教育体系，早已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紧密合流，铸成了一台绞杀青年一代青春与未来的庞大机器。但历史的辩证法同样无情地指出，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这台机器在疯狂榨取我们血汗的同时，也正不可挽回地大批造就着它自己的掘墓人。面对这个积重难返的修正主义教育旧体制，我们丢掉的只是虚假的幻想与温和的妥协。

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中，觉醒的青年必将重新举起那面赤红的旗帜，续写毛主席五十年前未竟的理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让真理的烈火燃尽这腐朽的藩篱，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我们必将赢得整个世界！

托洛茨基主义批判（1）——“官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问题

宛平南路 600 号

在左翼的舆论宣传中，比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论更广泛地流传的，是所谓“特权阶级异化论”。这一类论调把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其背后的阶级本质割裂开来，将一个抽象的“官僚”“特权阶级”作为其倡导者攻击革命领袖的靶子。托派的理论，即托洛茨基主义，包括写出《新阶级》这部旷世奇书的自由派分子吉拉斯，还有那些秉持“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人，就是这些论调背后的倡导者的典型代表。这些反动论调很显然误导了人民群众，使他们向社会主义发起攻击。我们作为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人，为了在群众中间宣传革命，就必须对这些论调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进行彻底的批判。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托派们常用的话语吧：

“官僚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了政治权力。为了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收入和特权，官僚建立了一个无限制的个人独裁制度。”

“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新的阶级统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极端落后和帝国主义包围条件下的一种极度畸形、官僚化退化的产物。”

“苏联的官僚主义地退化了的工人国家，其经济基础依然是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官僚阶层是寄生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官僚是‘捍卫公有制’的，那也只是因为公有制构成了他们自身统治和特权的唯一物质前提。他们捍卫公有制，就像寄生虫捍卫它所寄生的宿主一样。”

“或许它还算工人国家，但无产阶级专政已完全荡然无存。退化的工人国家处于官僚专政之下。”（引自《被背叛的革命》及第四国际文献）

而后来曾经试图在南斯拉夫引入托洛茨基主义、被捧成“异端马克思主义明

珠”的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共产主义国家，虽然没有私有财产，但国家机构对生产资料拥有绝对的控制和分配权。因此，掌握这种权力的官僚集团就成了事实上的新统治阶级。”

托洛茨基本人没有明确说过官僚是独立的阶级，但是现代托派仍然或多或少地向吉拉斯的表述靠拢。以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创始人托尼·克里夫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流派，和美国托派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沙赫特曼为代表的官僚集体主义流派认为苏联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工人国家，而是诞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由官僚作为一个全新剥削阶级所统治的新型阶级社会。这一观点比吉拉斯提出《新阶级》的时间还要早一些，两者的底层逻辑高度一致。以第四国际（如曼德尔为代表）为主的正统托派，虽然在名义上坚守托洛茨基的“退化的工人国家”（或对后发革命国家的“变形的工人国家”）概念，在理论上不承认官僚是一个合法的、长治久安的“历史性阶级”（因为缺乏私有产权继承权，且在苏东剧变中官僚最终纷纷主动把公有制瓜分为自己的私产，这在他们看来印证了托洛茨基的预言——即官僚如果不复辟资本主义就无法转化为真正的资产阶级），但在描述官僚的实际政治经济特权、对剩余价值的支配权以及对无产阶级的压迫时，现代正统托派使用的词汇和批判力度，也常常和吉拉斯的描述非常接近。因此，本文对“官僚阶级论”的剖析与批判，并不是笔者臆想的“托派”稻草人，而是在现实中被“认同托洛茨基主义”的诸多派别或多或少予以承认的一个观点。（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也有部分托派是反对本文所批判的对象的，他们和大多数托派一样，认为上世纪根本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搞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观点我们在以后的部分会讲。）

要回答“官僚是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回到列宁的经典论述：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成文和

固定下来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自己所支配的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

现在又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官僚?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有这样的表述:

“官僚机构是一个意识的等级共和国,……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

“国家目的变成了国家的各种意图,或者说,国家的意图变成了国家的目的。……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

列宁也多次指出,官僚就是“享有特权的、脱离群众的、高高在上的一小撮管理人员”。也就是说,官僚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因为个人独裁而产生的东西,而是剥削阶级用来实现自身阶级统治,执行阶级意志的工具——这个工具常常体现出脱离群众、办事推诿,利用手中的行政指挥和分配权对群众进行管、卡、压的特点。托派分子们为什么说官僚不是资产阶级分子,而是什么“社会主义异化物”呢?他们恰恰是死咬住列宁那句划分阶级的经典话语,硬说“官僚只有管理权,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

我们从列宁的那句划分阶级的经典话语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判断一个社会群体是否成其为一个阶级,就必须考察该社会群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它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主要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但是,生产关系还有另外两个部分——分配方式和相互关系,它们也会对所有制关系起到反作用——人类历史上历次所有制的变革都能体现出这一历史的辩证法。实际上,所有制决非一张

废纸般的契约或法律条文，而是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对剩余产品的占有权以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如果一个集团可以任意支配几百万亿的国有资产、决定生产什么、拿走绝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自身的特权消费和官僚特权再生产，那么在经济实质上，他们和私人资本家行使的职能就已经没有区别了。这种“集体占有”或“实质占有”，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官僚化的私有制。这些官僚的作为也决非是为了“保卫公有制”，而是为了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和群众赋予他们的对生产领域的支配权、管理权转化为事实上的官僚资本所有制。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全面复辟时，那些“官僚”不仅贪污腐败，而且还利用手中权力暗中支持投机倒把、开设地下工厂、明目张胆地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给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开绿灯；他们在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篡夺了政权后，那些“官僚”们更是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搞物质刺激，看似是劳动者“多劳多得”，“这种激励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实际上是为了通过扩大收入差别来分化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验过工资被拆分成种种“绩效”“奖金”和基本工资，犯点小错就被扣除一大半工资的人都知道，这种方法不过是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所谓的利润挂帅也根本就不是什么调动积极性、满足人民需求，而是穷尽泰罗制、“谢基诺试验”等一切手段把工人的剩余价值吃干抹净。在苏东剧变时，那些口口声声“捍卫公有制”的苏联官僚阶层，在体制崩塌的前夜和瞬间，极其自然、毫无阻碍地把他们长期“代管”的国家财产，通过私有化浪潮瓜分变成了自己的私产。曾经的苏联红色经理人、各部部长、党政高官，几乎无缝衔接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的第一代寡头和资本家。历史证明，官僚对管理权的长期垄断，不仅“试图”转化为所有权，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未变质时就已经部分地将其管理权转化成了他们的私有产权，只要外部条件成熟，这种转化可以瞬间彻底完成。

阳和平有一个极其形象的类比：走资派是蛆，资产阶级是苍蝇，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就是从蛆变成苍蝇的过程。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引申这个类比——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附庸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

子的产物，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个人独裁”的结果，就像蛆和苍蝇本质上仍然是同一物种一样。奴隶制阶级转化为地主阶级，地主阶级转化为资产阶级，它们的剥削逻辑不仅在法理上发生变化，其本质也改变了。而“官僚新阶级”转化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它们剥削的逻辑、阶级再生产的方式在形式上有差别，本质上并无不同，根本不构成一个“新阶级”。如果说还处在”蛆“这个萌芽阶段的走资派官僚因为他们的表面行为和“典型的资产阶级”大相径庭，就可以说他们在本质上是两个物种，那么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那些商业资产阶级可也没有像”典型的资产阶级“那样搞什么扩大再生产，而是到处通过殖民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难道他们就不属于资产阶级的行列了吗？

当然，这些托派先生们一贯喜欢咬文嚼字，他们说，“斯大林时期和你们所谓的苏联修正主义时期，官僚始终作为‘社会主义异化物’寄生在公有制框架内，因为官僚们只要下台就会丧失别墅、特供和子女教育特权，他们手中的特权既不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那样可以继承，他们通过特权从无产阶级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形成的‘隐形资本’也因为法律限制没有形成资本循环。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主要是通过特供体系消耗剩余价值，这种消费剩余价值的模式具有保守性，而这是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逻辑背道而驰的。”

这些自诩“真正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托派先生们，在论述官僚问题时，仅仅从所谓“公有制框架”“特供体系”“特权没有继承性”等法律意义上的字眼和表面现象出发分析，而拒绝对苏联官僚在社会生产和经济运动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进行考察，还抛出一个“根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相关资料，苏联的特权阶层主要是通过特供体系消耗剩余价值”这所谓的实证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这是何等“高明”的理解，对马列主义何等高明地运用啊！

让我们仔细拆解他们的逻辑吧。首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享有特供体系（如克里姆林宫食堂、特供商场、专勤医院、高级别墅等）的核心官僚及特权阶层（即所谓“官僚名门”或 Nomenklatura），连同其家属在内，总人数在几十万到上百万人左右，占当时苏联两亿多总人口的极小比例，而苏联国民收入（或剩余产

品)绝大部分被投入到了重工业与基础建设(占用了国民投资的巨大份额)、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和全民的基础社会福利与常规消费,也就是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相比之下,几十万人再怎么穷奢极欲、吃好穿好、住别墅,其个人消费在整个国家几千亿卢布的国民生产总值(GNP)面前,也只是九牛一毛,绝对不可能达到“消耗了大部分剩余价值”的程度。根据西方经济史学界对苏联解密官方统计数据(如格里戈里·汉金、诺曼·斯通等学者的测算)的研究,苏联经济有一个极为反常且突出的特征:其国民收入中用于资本积累(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长期高居全球之首,远超同期的美、日、欧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50至1970年代,苏联的资本积累率(即扣除消费后,投入到新建工厂、基建、机器设备等扩大再生产中的剩余价值比例)常年维持在30%至40%甚至更高。因此,把苏联特权阶层对剩余价值的支配说成保守性的、仅用于特供体系的行为,进而否认资本主义再生产逻辑的存在,这是通过割裂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进行断章取义的行为,在历史实证和经济学数据上也是不成立的。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表述,资本循环的过程分为以下阶段:第一个阶段(流通领域),资本家在市场上用货币(G)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W),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个阶段(生产领域),工人在生产资料上耗费劳动力,进行实际的物质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不仅再生产了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工资),更创造了剩余价值;第三个阶段(流通领域),资本家把生产出来的带有多余价值的商品重新拿到市场上卖掉,换回更多的货币,实现货币资本的增殖。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会将货币资本的增殖部分追加进生产领域的投资、研发更加先进的机器设备、雇佣更多的工人以扩大生产,周而复始。苏联后期的官僚特权阶层,恰恰是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各个工业部,把从全社会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国家预算、新工厂的基建投资、重工业和军工复合体的再生产(这种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可谓空前绝后),而不仅仅是贪污了一笔钱,或者像封建地主把收来的租子拿去修园子、买丫鬟那样,利用特权多吃多占、买几栋别墅、搞点特供商品。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苏联后期的官僚集团在社会生产中

行使的职能，实际上就是恩格斯预言过的、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总资本家”。

从这一观点出发，托派分子所依据的那些“反例”就一个也无法支撑他们的观点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对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同样地，苏联后期的官僚集团“接近”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们还能遵守公有制的法则，只能证明他们是国家垄断资本家，是作为资本家的整体——他们内部的运作机制和“典型的垄断资本企业”并没有没多大区别。这也能表明，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尽管已经变质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因为它继承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大部分官僚机构及其运行规则，继承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外壳，所以就像摩尔根通过考察现有的原始部落来推演整个原始社会的演进一样，它同样也可以作为考察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运动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参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

“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由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和竞争的加剧，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使‘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无比残酷地强化起来了。”

需要注意的是，这段话是列宁为了批判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对马克思在 1871 年做出的“英国和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没有官僚军事国家机器”这一结论进行的剖析。让我们回到前文对官僚这一概念的定义，结合列宁的这段话，就可以发现：官僚制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资本走向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当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极度激化时，资产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和海外扩张，必须在英美这样传统的“自由”国度里也迅速膨胀出一套庞

大、压抑且脱离群众的官僚军事机器。在后期的苏联，因为篡夺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直接继承了一套紧凑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所以这套经济体系从复辟伊始就会具有高度垄断的性质，而且是由国家机器直接支撑的；而在原来的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没有彻底清除官僚制，虽然意识到要限制它，但后续却适得其反——这就促使官僚制像历史上垄断资本控制的国家机器逐步官僚化、严密化一样，被不断加强。可以说，现代的官僚制本身就是资本剥削逻辑的必然结果。我们在现代那些典型的垄断企业中也处处可以看到科层制的官僚，也处处可以看到各种形式主义、为了晋升而唯上级是从、为了争夺预算、资源和地盘而互相封锁信息和筑起部门壁垒、用 KPI 和末位淘汰来压榨员工等让普通劳动者深恶痛绝的现象，而苏联后期的官僚集团的作为——企业厂长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产值或产量指标而弄虚作假、甚至制造不合用产品；各工业部之间互不买账、各自为战（甚至出现了著名的“部类壁垒”），这些官僚特权割据现象——和那些典型的垄断资本企业如出一辙。

诚然，单单只看这些官僚的行为，的确很容易就把他们看成是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东西，仿佛他们真的只是那种不顾利润和产出瞎指挥的、“按权剥削”、不顾资本再生产的所谓“封建地主阶级”，以致于人们说出了“奴隶主（指国内的官僚）不如资本家”的话语。但是，这不过是自由派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制造的滤镜罢了。前文只是从事实方面对那个所谓的“实证”进行了驳斥，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苏联后期“计划经济”下饱受诟病的官僚集团内部的特权截留和寻租问题。

必须注意到，“官僚”的修正主义政策不仅仅是被机会主义分子大谈特谈的东西，它们总是伴随着扩大企业自主权、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这些旨在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扩大差别措施。作为“集体总资本家”的国家机器以及代表国家管理企业的各级厂长、经理不仅通过各种管、卡、压的措施直接对工人进行直接的剥削，而且也通过争取预算、扩大基建项目的方式进行间接的剥削。当全社会的剩余价值被国家收缴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剩余价值大池子”。在这个池子怎么

分、谁分得多、谁分得少的问题上，就展开了激烈的官僚内部再分配斗争。对于进行经济规划的官僚们来说，如果把资本大量投向轻工业和农业，由于直接面对广大民众的消费极限，极其容易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迅速引发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品过剩和利润率下滑；他们的 KPI 是上级下达的产值指标、生产总吨位、基建投资额，而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不仅能够完美容纳庞大的资本体量，更能通过国家信用兜底、高昂的进入壁垒和无休止的固定资本更新，为垄断集团提供最稳固、最庞大的权力基石与剩余价值榨取空间——只要不断扩大重工业和军工生产（即扩大直接剥削的规模），这个庞大的剩余价值池子才会越来越大，官僚集团才能够从中分到更多的好处、维持更高的特权。于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部门的官僚们凭借其在国家机器中的战略地位，成功通过争取预算、扩大基建的方式，把大笔剩余价值划拨到自己的“部门领地”中，通过层层转包、物资截留和特权消费据为己有。

我们只要把现代的大型垄断企业和苏联后期官僚集团放在一起比较，就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都知道，谷歌开发的 AI，也就是 Gemini，在最近半年里面出现了严重的“降智”，而这是由谷歌公司内部各个部门争夺算力（GPU）、争夺预算、争夺 HC（Headcount，编制），导致管理混乱不堪导致的。当企业膨胀到十几万人的巨无霸时，它内部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了。各个部门（比如谷歌的云服务、搜索、硬件、各路 AI 实验室）不需要去市场上自负盈亏地买算力，它们的算力、预算和人员编制，全部来自于公司高层的内部行政规划和预算再分配。一个总监或 VP 的权力有多大、能不能升职加薪，不取决于他给公司赚了多么微薄的净利润，而是看他手下管着多少人、手握多少台 H100/B200 算力集群、掌控着多么宏大的战略项目；然而资源是有限的，且不是靠市场价格自动调节，而是靠政治斗争分配的，所以部门的高管们就开始搞办公室政治、拉帮结派、向高层表忠心、写精美无比但空洞的 PPT 汇报。这么一比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苏联后期的官僚资本集团的行为和谷歌这一类大垄断资本内部的矛盾在运作逻辑上是互通的——只要生产资料和资本集中到一定规模（无论是私有垄断资本还是国家垄断资本），自由竞争的外部市场就会在微观内部失效，

取而代之的一定是庞大的科层官僚制、行政化的人事斗争，以及围绕着核心资源展开的残酷内耗。列宁说，“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这种为了争夺剩余价值支配权的争斗下，苏联后期的“计划经济”充其量和一般垄断企业内部的生产计划一样，社会生产和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样处于无政府状态。更何况官僚们为了捞取更多利润而用“谢基诺试验”等手段直接剥削工人了！

按照托派和其派生出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们的意见，难道谷歌这一类垄断企业内部的高管们就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什么“封建官僚”吗？马克思说过，“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资本维持自身的统治，从来就不是仅靠经济关系上的强制力，而一定要使用冗杂的官僚系统。此外，托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判断标准也是极其荒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将劳动力作为自由买卖的商品，而他们在论述时却把标准偷换成了有没有形成资本循环，这就是典型的不分主次的行为，和马克思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如果按照“消费不具扩张性、不搞扩大再生产就不是资产阶级”的逻辑，那么历史上许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官僚资本家，甚至一部分只知挥霍祖产的没落资本家，难道就不属于资产阶级了吗？难道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就不属于资产阶级了吗？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是一个宏观经济规律，它并不以某个具体个人或某个官僚集团是否天天想着“拿剩余价值去投资开公司”为转移；“资产阶级”更不是私有企业主的身份标签，它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这些先生们的判断标准是在用一种极其古典的、甚至有些幼稚的“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标准（即资本家必须亲自拥有并世袭私有厂房股票）套用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在最典型的西方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如跨国大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也早已发生分离。大量的大型股份公司由职业经理人、CEO 和董事会管理。这些职业经理人拿着极高的薪酬，全权支配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产，拥有绝对的行政指挥权、人事任免权和剩余价值分配权，但他们可能并不拥有这家公

司多少股份，甚至随时可以被董事会解雇——这和“待遇随时收回、不能世袭、没有法定私有产权”的苏联官僚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难道那些手握几千万年薪、支配庞大资本、决定无数工人命运的现代跨国公司高管，因为“缺乏最终的法定所有权”或“随时可能被撤换”，就不是资产阶级或资本的代理人了吗？显然不是这么回事，苏联后期的官僚集团不过就是一个集体性的、国家级的垄断职业经理人群体罢了。

如果他们没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如果后期的苏联真的只是“公有制异化”的“堕落工人国家”，为什么他们能在苏东剧变时迅速地把原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他们又是“保卫”的哪门子“公有制”呢？没有一个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会允许这么做！然而我们自视甚高的托派们及其派生物们却能得出如此违背现实的结论，其原因不过是他们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法，只知道按照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是按照探究出的本质来定性和考虑问题！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后期的官僚们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实际上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却明知自己的特权被“法律条款”束缚而不直接彻底私有化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从来懂得社会历史的变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懂得用革命的辩证法去看待历史的惯性，而自命为“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继承者”的托派及其派生物们因为抛弃了这一点，转而采取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像他们树立的“斯派”稻草人一样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甚至开始自相矛盾起来：他们一面根据列宁的原话认为“官僚”是一个“新阶级”（即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一面却又根据抽象的“法定所有权”认为“官僚”“没有所有权只有管理权”！

既然苏联后期的官僚体制是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而来，那么他

们也必定是在这一“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基础上复辟私有制的。苏修官僚身处国家垄断机器中，铁饭碗绝对有保障，不管经济搞得好不好，只要国家的资源源源不断，他们的部长、书记、厂长地位就稳如泰山；他们不需要承担私有财产的投资风险，却能无偿调用成千上万吨的钢材、几百万公顷的土地和千千万万名工人的剩余劳动力。别墅、疗养院、特供商品、专属医疗、出国考察、子女通过特殊通道直升名校——对于当时的官僚个人而言，这在社会上已经处于绝对的顶端。而且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确立了“保持干部稳定”的路线（不轻易清洗官僚），所以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暂时的平衡。此时的苏联就像阳和平说的那样，是一个“畸形的、不按照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国家”。

但是，上文提到过，此时的“计划经济”已经和典型的垄断资本企业内部的生产计划没什么区别，已经变成苏修统治集团内部争夺资源时实现暂时平衡的工具了——一个公司内部各个部门的利益争斗最多就是产品出问题，但是这种冲突放大到国家层面，就是“计划经济”的外壳下各个利益集团由于发展不平衡这一绝对规律而发生更为激烈的冲突——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由于能够跳出资本逐利性这个框架，所以各部门之间还能有效地协调；走资派上台以后，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润挂帅以及上文提到的各部门之间争夺资源和预算，这些实际上就造成了生产无政府状态，也随之在垄断体制内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互相之间矛盾愈发激化的利益集团。就像阳和平说的那样：

“（苏联体制）崩溃以前的统治方法，是不符合这个基本原则（按资分配）的。苏联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一开始必须在计划经济的外壳下运转，直到这个外壳再也不能容纳他们资本积累的极限，不能适应资产阶级的这种基本原则。所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实力会随着生产资料和科技的发展而变更，所以原来一党执政的计划经济无法摆平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你比如说，煤炭的价格，钢铁的价格，布匹的价格，生产量等等，在市场经济下，那他通过价格就调解了，但是计划经济下，你得要价格规定、生产计划

的调整，这利益集团里面可以想象矛盾越来越大。因为资本主义下科技发展不是均衡的，不是每个行业每个地区都是那么平稳的发展。如果有的地方突然有个新科技出现了，那么他的影响力就会增加，计划经济体系里面怎么能满足他膨胀起来的东西，太难了。……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摆平统治阶级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越来越激化的矛盾，崩溃是这种制度的必然结果。这个道理和帝国主义战争无法避免是一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光是造成一个国内各个资本集团的势力大小改变，也会造成国家之间的实力的变迁。因此，各自的势力范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没落的不甘心让位于崛起的，先富不能带动后富，反而要时时刻刻防着后富颠覆先富，这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同样的。”

随着时间推移，官僚特权膨胀到了极点，当第一代、第二代官僚老去时，他们发现自己虽然权倾朝野、腰缠万贯（隐形财富），但他们的儿子无法合法继承这个部长或书记的席位。此时，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因为苏联经济在 70-80 年代陷入全面停滞（物资匮乏、科技落后于西方）而变得异常尖锐，于是他们开始担心如果哪天政治风向变了，或者新领导上台，他们积累的特权随时可能因为高层的斗争而化为乌有。于是，他们不再满足于当一个“随时可能被收回待遇的职业经理人”，他们要合法性、要世袭、要私有化。也就是说，苏联的官僚集团继续维持那个“计划经济”的外壳，这和北欧的福利制度一样，并不是简单一句“掩盖阶级剥削实质”就能解释，这只是结果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体制在前几十年为他们提供了零风险的特权保障；而他们最终选择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亲手砸碎这个体制、搞全盘私有化，正是因为他们要将几十年来通过权力积累的隐形优势，最终“合法地”固化为子孙万代的私有财产。托派们正是忽视了苏联官僚集团这些决策背后的现实基础，觉得如果这个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就必须立刻“随心所欲”地变成他们以为的“典型的”资本主义，而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恰恰导致了他们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让我们再回到前文《资本论》中总结的资本循环过程，资本循环的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下劳动力作为商品属性的具象化，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隐性控制。实际上，只要劳动力还具有商品的属性，只要“官僚”能够决定哪个工人的去留、控制工资和奖金的数额，虽然不像“典型”的资本家那样明显，但是资本循环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而社会主义时期的“官僚”们恰恰是从这里着手逐渐夺取所有权的。需知法律法规的颁布都有其对应的已经充分发展的现实基础，从苏联1961年颁布并长期严格执行的“反寄生虫法”（Anti-parasite laws）就可见一斑：如果所有人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里被完美安顿、绝无失业，国家根本无需动用刑事手段去大规模惩治那些“不从事国家认可的社会劳动”的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之所以要颁布这个法律，恰恰是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条件，篡改了生产的目的（从满足人民需求变成了一味地追求利润），导致社会上特别是落后地区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存在大量游离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的自由劳动力、失业者、不愿被国企绑定的临时工或“边缘人”。此外，无论是在修正主义上台后的苏联还是中国，都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各级官僚（特别是地方州、市级官员及国营工厂厂长）利用行政特权，将国营企业的原材料、机器设备和劳动力挪作他用，建立起实质上的私营“地下工厂”。这类案件往往涉及地方各级官僚系统的全面庇护（即所谓的“保护伞”）。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苏联和中国的走资派官僚掌权后推行的政策，恰恰就导致了社会上大量失业人口的产生（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而保持大量的失业人口正是进行资本循环（G-W-G'）的重要条件。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就可以厘清一个误区，那就是官僚特权阶层不完全等于贪污腐败分子，更不完全等于利用制度合法地多吃多占的官僚。通过对苏联官僚集团的行为的分析，就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谓的官僚特权阶层为了能够合法化盘剥劳动人民的特权，就不会仅限于自身的多吃多占，必定要推行种种旨在恢复旧剥削秩序、把自己手中的委托管理权转化为所有权的措施；他们乱上马项目、搞浮夸风等极左行为和利润挂帅、试图扩大企业自主权等右倾行为实际上是一体两

面，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自己对剩余价值的支配权，把自己的管理权转化为所有权。从这一结论出发，就不难得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独立的“新阶级”，而和资产阶级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也正是如此，苏联和中国的走资派官僚们从来不能满足于自己在现有体制下的特权，而是卖力地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种种对群众“管、卡、压”的举措，阻挠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主张“搞活经济”，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些行为无一不是为了将劳动力重新变成商品，为了阻挠劳动者把名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转变为事实上的所有权，也就是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复活撬开缝隙。这实际上就是他们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再生产，在经济领域也会因此而形成一套基于党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隐形资本循环。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此，在以后期苏联为典型的修正主义政党掌握的国家更是如此。

脱离了这个深挖经济关系的判断和分析，就会把对“官僚”的阶级属性这一问题的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矮化成道德层面的批判，甚至会把斗争的对象从资产阶级偷换成一个抽象的“官僚”，把矛头指向的东西从和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变成社会主义本身，而这恰恰是历来的托派、无政府主义者等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实际上产生的作用——托洛茨基主张“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国家”，看似和毛主义的“继续革命论”神似，实际上丝毫没有撼动官僚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它认为“公有制”就是“公有制”，只要打倒了一个独裁者、设计一套万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等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万事大吉了。结果这一主张并没有导向他们眼中“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混淆起来，最终导致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本身，给资产阶级自由派做了嫁衣，给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带来一点哪怕成效再微小的“改良”。可以说，托洛茨基的这个主张就是从早已被马克思批烂的“巴枯宁之问”那里抄来的，除了跟在自由派屁股后面天天念叨“先锋队必然腐化”来消解革命的正当性，到处在革命的共产党人中间搞破坏，把工人们从革命的道路上误导到资产阶级所愿意的道路上去，他们还会干些什么呢？他们天天把历史上作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帮凶的中国托派和托洛茨基主义切割开来，

但是我们从这里就能看出，中国托派的抽象行径，不过是托洛茨基主义本身反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必然产物罢了！

问题很明显：**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变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和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论”没有半点相同之处。**只有对托派的“官僚阶级论”进行深刻批判，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问题做进一步的阐释。很显然，托派在官僚问题上的错误并不仅仅是名称和定义之争，它和这一机会主义派别的核心政治主张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下一节我们就来谈谈托派最喜欢用马克思和列宁原著进行诡辩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定义之争，并且要讲清楚这和本节论述的官僚问题跟他们的核心政治主张“政治革命论”的联系。

中国当代阶级斗争

中国劳动中介的扩张及其对工人的压迫

于斯，月季

一、中介是怎么产生的

在如今的中修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为了维持生活，工人不得不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资本家，以换取生活资料。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就意味着它需要进入市场进行买卖。和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交易也可以通过中间环节来完成，劳务中介便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并不断再生产出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即相对过剩的失业人口。这支后备军的存在，使工人阶级内部陷入激烈的就业竞争。为了获得工作，工人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恶劣的劳动条件。资产阶级借此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削弱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可能性，使工人在面对资本家时难以形成有效的议价能力。这种状况也为劳务中介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始终适应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及其需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产业规模相对较小，产品主要在产地附近的市场上销售，商业资本的规模有限，商业活动的分工也比较简单。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出现，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迅速扩大，商业分工日益细化，商业资本也随之扩张。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产业规模较小，工厂的用工需求相对有限，工人与工厂之间通常不需要大规模、专业化的中介环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用工需求日益集中，劳动力的招募、配置和管理也逐渐形成专门的商业环节，中介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劳务派遣企业数量从 2017 年的 5.81 万家增至 2023 年的 35.23 万家，便反映出这一时期劳务派遣行业的扩张。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类似劳务中介的中间人已经存在，但其活动更多表现为零散的局部现象，尚未发展成今天这样大规模的产业。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机器生产进一步发展，劳动分工日益细化，劳动力的配置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大幅提高了招工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工人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从技术条件来看，这些进步本可以降低工人与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使工人拥有更多就业选择。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技术进步并不必然转化为工人就业选择的扩大，也可能被资本用于加强对劳动力的组织、调配和控制。为了更有效地组织生产，应对经济危机和市场需求波动所造成的用工起伏，降低劳动力使用成本，资本需要一种能够灵活增减用工数量、转移用工责任的方式。劳务派遣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在生产高峰期，企业可以迅速补充劳动力；在生产低谷期，则可以通过退回派遣工等方式减少用工数量，将部分用工风险和管理责任转移给劳务派遣机构。由此，劳务派遣成为资本应对生产波动、调节劳动力使用的一种重要形式，也为资本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使用和支配劳动力提供了条件。

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反官僚、反资本的斗争不断爆发，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迫使中修建立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制度，以缓和阶级矛盾。但这些保障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未能对资本形成真正有效的约束。与此同时，劳动法在形式上承认了劳务派遣等用工方式的合法性，也为资本将招工环节外包给劳务派遣机构提供了法律形式和制度条件。

在上述条件下，资本开始大规模地利用中介完成劳动力的临时招募、集中和遣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用工需求的变化，劳务中介也逐渐摆脱零散、局部的形式，发展成为规模更大、组织更系统的产业。

更重要的是，采用何种用工形式的决定权并不掌握在工人手中，而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因而能够决定劳动力以何种形式被招募和使用。他们之所以不直接招工，而转向劳务中介，并不只是因为劳动力供给不足，还能借助中介从而更灵活地调配劳动力、转移用工责任，并为压低用工成本、加强对工人

的控制创造更便利的条件。接下来，将具体分析劳务中介究竟在哪些方面为资本剥削工人提供了便利。

1、借助中介转移用工责任，增加工人维权的难度

资本家不愿意直接招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直接招工通常意味着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并承担相应的用工责任，包括缴纳社会保险、依法支付工伤待遇和经济补偿等。通过劳务派遣等方式招工，则可以将劳动关系安排在劳务派遣公司与劳动者之间，使工人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形成不同于直接雇佣的法律关系。

一旦发生工伤、欠薪或其他劳动纠纷，实际用工单位便可能以工人属于劳务派遣人员为由，推卸本应承担的责任，将矛盾转移给劳务派遣公司。工人不得不在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反复交涉，而中介又可能通过拖延处理、相互推诿等方式消耗工人的时间和精力。与此同时，劳动者依法维权还需要承担时间、交通、举证等成本。对于收入微薄、缺乏积蓄的工人来说，长期维权本身就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最终可能迫使一部分工人放弃追究责任。

因此，劳务派遣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劳动关系与实际劳动使用相分离，为资本转移用工责任、增加工人维权难度提供了条件。

2、借助中介灵活调配劳动力，降低招工成本

资本家普遍依靠中介招工，首先是因为工厂的用工需求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使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用工需求随着市场变化而不断波动。

当工厂订单突然增加时，资本家需要在短时间内补充大量劳动力；当订单减少

时，又需要迅速缩减用工规模。此外，恶劣的劳动条件也会造成工人频繁流失，使工厂不断出现新的用工缺口。如果完全依靠企业自身的人事部门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长期维持相应的招聘人员和招聘渠道。但在订单平稳或生产淡季，这些招聘资源可能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反而增加企业的日常管理成本。

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波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资本家既需要在生产扩张时迅速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又不愿意为用工需求下降时闲置的招聘资源持续支付成本。因此，他们需要一种能够随时补充劳动力、又能灵活调整用工规模的渠道，而劳务中介恰好能够满足这一需要。

劳务中介通常掌握着基层劳动力市场的招聘网络，通过火车站、城中村、招聘网站等渠道积累求职者信息。当工厂急需数百名普工时，如果完全依靠自身的人事部门逐一筛选简历、联系求职者和安排面试，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需求。相比之下，中介凭借现成的招聘网络，可以迅速组织一批劳动者，帮助工厂填补用工缺口。

对资本家而言，招聘速度直接关系到生产能否正常运转。如果因为工人不足导致生产线停工、设备闲置，造成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支付给中介的费用。因此，即使中介需要从工人的劳动报酬中抽取一部分收入，或者向企业收取服务费用，资本家仍然愿意利用中介招工。归根结底，中介将分散的求职者组织起来，使资本能够更快地获得所需劳动力，并减少自行招聘和调配劳动力的成本。

3、利用临时用工压低劳动力成本，扩大对工人的剥削

通过中介招来的工人，往往处于比正式职工更加不稳定的就业状态。在一些企业和用工实践中，这些工人缺乏规范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稳定的工资保障，工资还可能按照计件或小时计算。与正式职工相比，他们更容易受到订单波动、临时退工和工资结算方式变化的影响。

这种用工方式使资本家能够根据生产需要灵活增减工人数量，并将部分招聘、

管理和退工事务交给中介处理。与此同时，一些企业还通过劳务派遣、临时用工等形式，规避或压缩本应承担的用工成本。中介则通过向企业收取服务费、赚取劳务差价等方式获利。由此，资本家减少了部分用工支出，中介获得了商业利润，而工人承担的却是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不足以及收入风险上升等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劳务派遣工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必然没有劳动合同或社会保险。劳务派遣单位依法负有相应的用人单位义务，用工单位也不能仅凭派遣关系免除法律规定的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资本可能利用复杂的用工关系和劳动者维权能力不足，将本应由企业承担的成本和风险转嫁给工人。

因此，劳务中介并非单纯地为工人与工厂牵线搭桥。它还能够通过组织劳动力的招募、分配和退出，使资本更灵活地使用劳动力，并为压低用工成本、转移经营风险提供便利。工人获得的只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工资，而资本则借助这种用工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劳动力的支配。

4、中介对招工渠道的控制，使工人难以绕过中介直接就业

与资本家依赖中介招工相对应的，是中介对劳动力招募渠道的控制。中介通过占据火车站、广场等线下招工场所，以及利用招聘网站、网络广告和各类线上渠道，大量发布和掌握岗位信息。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工人接触到的招聘信息相当一部分来自中介，使工人难以绕过中介，直接与实际用工单位建立联系。

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不是均衡的。工业和生产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和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而广大农村及三四线城市的就业机会相对不足，难以充分吸纳当地劳动力。为了维持生计，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工不得不背井离乡，涌入少数工业城市寻找工作。然而，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顺利就业。面对数量庞大的求职者，城市的就业岗位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就业需求，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因此加剧。对于这些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外来务工者来说，缺乏可靠的社会关系和稳定的信息渠道，使他们在求职过程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中介正是利用了这种处

境，将求职信息和工作机会集中到自己手中。一些不法中介借此欺骗、克扣工人工资，甚至将工人输送到劳动条件恶劣的工厂。贫苦工人的处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依赖。许多工人必须尽快获得工资，以支付房租和日常生活开销，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慢慢寻找劳动条件更好、待遇更合适的工作。海投简历、逐家面试都需要时间，而在找到工作之前，房租、伙食等基本开支却不会停止。对于缺乏积蓄的工人来说，这些时间成本往往难以承受。他们只能优先寻找日结工、短期工，解决眼前的吃住问题，而这类岗位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中恰恰被中介大量掌握。

即使有工人试图绕过中介，直接联系资本家或工厂负责人，也可能被要求转而联系中介、通过中介办理入职手续。这是因为，中介不仅替资本家承担了招聘工作，还能够帮助资本家灵活调配劳动力、转移部分用工事务和责任。对于资本家来说，中介并非可有可无的介绍人，而是能够服务于其用工需要的商业环节。此外，一些难以通过常规招聘渠道就业的特殊群体，例如存在信用限制或缺乏完整身份、就业手续的人员，也可能被迫转向中介寻找工作。这进一步扩大了部分中介对特定劳动者群体的控制。由此，工人对中介的依赖并非单纯源于个人选择，而是由就业机会分布不均、劳动力供过于求、求职成本高昂以及招聘渠道集中等因素共同造成的。中介一方面从资本家那里承接招工业务，另一方面又利用工人急于就业、缺乏其他选择的处境，通过收取费用、克扣工资或压低实际报酬等方式牟利。工人越是缺乏独立寻找工作的条件，就越容易受到中介的盘剥，而这种盘剥又为中介的持续经营提供了利润来源。

5、中国缺乏劳动监管，为黑中介的生存和扩张提供了空间

黑中介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甚至肆无忌惮地盘剥工人，除了劳动力市场本身提供的条件外，还与劳动监管的失效密切相关。在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下，劳动监管部门的实际工作受到既有政治经济关系的制约。尽管这些部门在形式上承担着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查处违法用工行为的职责，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

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利益与资本增殖的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矛盾。

对于黑中介而言，只要违法招工、克扣工资等行为尚未引发大规模的工人集体斗争，或者尚未造成足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秩序的严重后果，相关问题就可能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即使有关部门偶尔开展专项整治，如果缺乏持续监管和严格执法，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黑中介赖以生存的条件。一些整治行动可能在舆论压力下集中展开，但风头过去之后，违法招工和侵害工人权益的现象仍会变本加厉重新出现。

当工人试图举报或投诉时，又面临着另一重障碍。一方面，调查取证、往返奔波和等待处理都需要付出时间与经济成本，收入微薄的工人往往难以长期承受；另一方面，如果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履行职责，工人的举报就可能迟迟得不到有效回应。维权渠道不畅与维权成本高昂相互叠加，使部分工人即使遭受侵害，也只能忍气吞声。因此，黑中介的猖獗不能仅仅归结为少数中介经营者的道德败坏。只要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失衡、工人对就业渠道的依赖以及资本对低成本用工的需求持续存在，而违法行为又得不到有效查处，黑中介就能够不断寻找新的牟利空间。劳动监管的失效，进一步降低了其违法经营的风险，使其得以反复侵害工人权益。

归根结底，黑中介既依赖劳动力商品化和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而生存，也依赖资本对低成本、灵活用工的需求而获利。当工人缺乏独立的就业渠道，资本又能够借助中介转移用工事务，而监管机制无法有效约束违法行为时，中介对工人的盘剥便获得了持续存在的条件。

二、劳务中介的经济性质：商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

劳务中介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可以从相关调查数据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3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9753 万人，月均收入为 4780 元，其中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样为 4780 元。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总体就业和收入状况，并未单独统计通过中介就业的工人。至于农民工通过中介求职的比例、企业采用劳务派遣或劳务外包的比例，以及制造业短期岗位中派遣工的占比，从历史调查数据来看，劳务派遣早已不是劳动力市场中零散的用工现象。据人民网 2016 年报道，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2011 年全国被派遣劳动者约 3700 万人，占国内职工总数的 13.1%；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总工会等方面的调查还显示，2011 年大型企业劳务派遣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超过 16%。此外，全国总工会相关调查报道指出，个别企业的劳务派遣工使用率甚至达到 70% 以上。这些数据表明，早在十多年前，劳务派遣就已经在中国企业用工中占据相当规模的地位，部分大型企业对这种用工方式的依赖尤其突出。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数据反映的是 2011 年前后的历史状况，不能直接用来推算当前的劳务派遣比例。

不过，要判断劳务中介的经济地位，不能只停留在其规模和数量上，而必须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劳动力买卖关系以及利润来源入手。中介通常不占有工厂的机器、厂房和原材料，也不直接组织生产并创造新的商品价值。它既不是凭借生产资料占有权获取利润的产业资本家，也不是主要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取工资的无产者。那么，中介的收入究竟从何而来？马克思在分析商业资本时指出，商业资本本身不创造剩余价值，而是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商业资本通过商品买卖帮助产业资本实现商品价值，并从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相应份额。劳务中介虽然交易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劳动力商品，但从其经济职能来看，同样具有商业资本的性质：它介入劳动力的招募和配置，并通过这一流通环节获取收入。

传统商业资本通过收购和转售商品获利，劳务中介则通过连接工人与用工企业获取收入。两者都处于流通领域，都不因单纯的买卖行为而创造新的价值，其收入都与社会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及其分配关系相联系。区别在于，传统商业资本主要经营物质商品，劳务中介经营的则是劳动力的招募、配置和使用渠道。当然，劳务中

介的收入不能全部简单归结为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利润。中介可能向企业收取招聘服务费，也可能通过劳务结算差价、克扣工资、收取不合理费用等方式获利。前者涉及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后者则可能直接侵害工人的劳动报酬。只有具体分析其经营方式，才能准确判断利润的来源。中介经营本身需要支付费用。例如，租赁办公场所、发布招聘广告、维护招聘网站、雇用招聘人员以及组织求职者，都需要耗费资金。这些费用中，属于纯粹流通活动的部分，并不直接增加商品的价值，而是为了完成商品交换和维持流通活动所必需的支出。

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看，纯粹流通费用需要由社会生产所创造的价值来补偿。中介的经营规模越大，其维持招聘网络和组织劳动力所需的费用也可能越高。问题在于，这些费用最终由谁承担，以及中介能否借助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将费用和经营风险转嫁给工人。在实际用工过程中，一些中介通过压低工价、克扣工资、收取管理费或设置不合理的报销条件等方式获利。工人因此少拿到的工资，便成为中介收入的一部分。即使中介声称有关扣款是为了补偿招聘和管理费用，也不能因此免除其依法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工人本来就必须依靠工资购买食物、支付房租、维持家庭生活，并恢复自身的劳动能力。当中介进一步压低其实际收入时，工人的生活资料就会相应减少。这意味着，工人不仅要承受产业资本对其劳动的剥削，还可能因为劳动力市场中的中间环节而承受额外的收入损失。中介取得的收入也并非全部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经营费用，一部分可能成为经营者的收入，还有一部分可能重新投入商业经营。中介取得的收入即使最终用于消费，也只是通过消费需求影响生产，而不是因为中介的买卖活动本身创造了新的价值。

因此，劳务中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凭空增加。它首先改变的是既有收入在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当中介借助对招聘渠道的控制，把经营成本和利润要求转嫁给工人时，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便会受到进一步挤压。

要进一步说明中介如何从劳动力的流通过程中获利，可以从工资结算关系入手。假设某工厂按照每小时 20 元的标准，向劳务派遣公司支付一名工人的劳务

费用，而中介向工人承诺的工价只有 18 元。假如工人实际工作一小时，且没有其他依法应当支付的工资项目，那么工厂支付的 20 元与工人约定工价 18 元之间的 2 元差额，就构成了中介取得收入的一种可能来源。如果中介随后又以管理费、押金或其他不合理名目扣除工资，工人最终拿到手的收入还会进一步减少。当然，工厂支付的劳务费用不一定全部属于工人的工资，还可能包含依法约定的招聘服务费、社会保险费用及其他用工成本。因此，不能仅凭企业支付的劳务费用与工人实收工资之间存在差额，就将全部差额直接认定为中介利润。具体的利润数额，必须根据合同约定、费用构成和实际结算情况加以判断。但这一例子仍然说明了一个关键问题：中介可以凭借其在工人与工厂之间的中间地位，取得一部分收入，而工人却未必能够充分了解工厂支付的费用、工资的真实标准以及各项扣款的依据。

在这种关系中，中介并不需要亲自参与工厂的生产劳动，也能够通过组织劳动力的流通获取收入。它所提供的招聘和配置服务可以具有实际用途，但这种用途并不意味着中介创造了与其收入相对应的新价值。其商业收入最终仍然需要在社会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及其分配关系中得到解释。更重要的是，中介对工人的扣减并不总是受到正常商业竞争的约束。当劳动力供给充足、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激烈，而工人又缺乏独立的求职渠道时，中介就可能利用工人急于就业的处境，压低工价、增加扣款，甚至通过欺骗和违法手段侵吞劳动报酬。因此，中介能够取得多少收入，不仅取决于其招聘和组织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还取决于工人对就业机会的依赖程度，以及工人拒绝不合理条件的能力。中介能够持续压低工价，根本上还与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再生产相对过剩人口有关。**中国工人阶级所处的整个经济地位，使其被迫接受任何能够维持生存的劳动条件，这个根本原因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工人阶级政治上经济上弱势的地位，这种弱势地位正是中介能够存在并持续获利得以繁衍生息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规模的变化，会不断改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口持续存在，使劳动力市场长期面临供给过剩的压力。当大量工人争夺有限的岗位时，工人就更难通过拒绝低

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来维护自身利益。中介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获得了压低工价的空间。对于急需工作的工人来说，即使他们知道中介公布的工价低于其他岗位，或者实际工资可能被各种名目扣减，也未必有条件拒绝。因为拒绝一份工作，就意味着继续承担房租、伙食和家庭开支，而下一份工作何时出现、劳动条件是否更好，都存在不确定性。由此，中介对工人的盘剥并不能简单地用正常商业利润来解释。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渠道受限和工人缺乏议价能力，使中介能够利用工人的生存压力获取额外收益。只要工人难以摆脱这种处境，中介就可能反复压低工价，而不必担心工人能够轻易转向其他就业渠道。

归根结底，劳务中介的经济地位及其获利方式，必须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中理解。中介通过组织劳动力的流通获取商业收入，而劳动力过剩、工人之间的竞争以及工人对就业机会的依赖，则为其压低工价、转嫁费用和扩大收益提供了条件。工人不仅要面对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还要面对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之前所经过的中间环节。中介由此成为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一个能够从工人就业困境中获利的商业环节。

三、中介作为商业资本对资本主义的作用

一般商业资本经营的是衣服、手机等商品，商品售出后便进入消费领域；劳务中介经营的则是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劳动力依附于劳动者本身，不能脱离劳动者而独立存在。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劳务中介的职能与一般商业资本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

一般商品的买卖，通常以商品所有权的转移为直接结果；而劳动力的买卖，则是劳动力所有者在一定时间内将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资本。劳动力进入生产领域后，才会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劳务中介的作用并不只是撮合劳动力的买卖，还在于组织和加速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使产业资本能够更及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务中介可以同时

为电子厂、机械厂、物流仓库等不同产业部门输送劳动力。当某个企业的用工需求增加时，中介能够迅速组织工人填补缺口；当某个企业的订单减少、生产收缩时，劳务派遣等用工制度又使企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直接用工关系带来的调整成本。与产业资本分别进行招工相比，中介集中掌握招聘渠道和劳动力资源，能够降低企业搜寻、筛选和组织劳动力的成本，加快劳动力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配置。由此，劳动力的供给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资本主义生产中频繁发生的用工需求变化。

这种灵活性主要服务于产业资本的生产和增殖需要。企业可以根据订单和生产任务调整用工规模，将一部分招聘、管理及用工关系处理成本转移给劳务中介，并借助派遣制度降低直接雇佣工人所承担的部分调整成本。对于工人来说，这种制度却可能意味着工作稳定性下降、议价能力减弱，以及在企业与中介之间追索劳动报酬和承担责任时面临更多困难。从劳务中介的收入来源来看，需要区分不同的经营方式。一部分中介向用工企业收取招聘、派遣或管理服务费用；一部分则可能通过压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扩大企业支付费用与工人实际所得之间的差额来获取收入。不能将所有差额都直接视为中介利润，因为其中还可能包含社会保险、管理和其他合规用工成本。但在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工人急于就业且缺乏议价能力的条件下，中介确实可能利用工人就业选择有限的处境，压低其劳动力价格。

因此，劳务中介的作用不能简单理解为在劳动力买卖中收取手续费。它通过集中招工、组织劳动力流动和降低产业资本的用工成本，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中介压低工人工资、产业资本借此减少劳动力支出的情况下，工人可能无法获得与劳动力价值相适应的工资，而产业资本则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创造条件。劳务中介由此成为产业资本组织和支配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并在一定条件下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但是，劳务中介作为一种商业资本，其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限的。商业资本通过参与商品流通，帮助产业资本节省流通时间和费用，加快资本周转，但它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社会为流通所耗费的资本和劳动，必须由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来补偿。如果商业资本的规模超过社会流通的实际需要，过多资本和劳动就可能被

耗费在重复的中介活动中，原本能够由较少的流通环节完成的工作，却需要更多机构、人员和费用来维持。这样一来，商业资本原本节省流通费用、加快资本周转的作用，就可能转化为对社会生产的阻碍。以劳务中介为例，一个工人从老家前往工厂就业，可能需要先经过省外中介 A，再经过省内中介 B，最后由本地中介 C 将其送入工厂。如果这几层中介分别收取费用，却没有提供与其收费相适应的实际服务，那么，多层中介就会造成重复收费、重复登记和合同手续上的额外耗费。工人的工资可能因各种不合理收费而减少，企业也可能承担额外的招聘和管理成本。原本旨在缩短招工时间、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的中介体系，反而可能成为劳动力进入生产领域的额外障碍。

这说明，中介环节并非越多越好。劳务中介只有在能够有效组织劳动力供给、降低招聘成本、缩短招工时间时，才可能发挥促进生产的作用。如果中介之间只是层层转包、重复收费，既没有扩大有效的劳动力供给，也没有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那么，它们所耗费的人员、场地、信息发布和管理费用，就会成为社会生产的额外负担。中介数量的增加不仅未必加快劳动力流通，反而可能延长招聘链条，使工人更晚进入生产领域，增加产业资本等待劳动力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劳务中介所获得的收入并不都具有相同的经济性质。中介向企业收取的合理服务费，可能是产业资本为节省招聘和管理成本而支付的流通费用；中介通过克扣工资、收取不合理费用获得的收入，则可能直接损害工人的经济利益。不能把中介收入的每一部分都简单视为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中扣除，也不能认为中介获得的所有资金都不会重新进入生产领域。中介机构同样可能将收入用于支付工资、租金和其他经营费用，也可能将利润投入扩大业务。真正需要考察的是：中介体系耗费了多少社会劳动和资本，这些耗费是否减少了整个社会的必要流通费用，以及中介取得的收入最终如何分配和使用。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如果中介体系通过重复收费和过度扩张，耗费了大量本可用于生产或其他有效用途的社会资源，那么，这些资源就不能同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雇用工人和扩大生产。即使部分中介利润最终重新投入资本主义经营活动，

也不意味着此前的重复流通过费用就因此消失了。关键不在于资金是否重新流动，而在于整个社会为流通支付的费用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以及这些费用是否降低了可用于生产和积累的社会资源。过度膨胀的中介体系因而可能增加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削弱资本积累的效率。不过，这种影响并不意味着劳务中介的扩张会直接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危机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不能归结为某一种商业资本的规模过大。劳务中介的过度扩张，更适合被理解为可能加重资本主义再生产矛盾的一种具体因素：它既可能增加流通过费用，也可能通过压低工人工资进一步限制劳动者的消费能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并不意味着工人就能获得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收入。当中介通过克扣工资或不合理收费进一步减少工人的实际收入时，工人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消费能力就可能受到压缩。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仍然受到追逐剩余价值、扩大生产规模的驱使。生产能力的扩张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之间，因而可能形成更加尖锐的矛盾。劳务中介并不是这种矛盾的根源，却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加剧工人的贫困，进一步扩大生产扩张与劳动者消费能力之间的脱节。因此，不能把劳务中介的存在本身视为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原因，也不能把它的利润简单看成从资本积累循环中永久消失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当中介规模超过社会实际需要，重复的中介环节和不合理收费就会增加流通过费用；当中介又通过压低工资侵蚀工人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收入时，它还会加重工人阶级的贫困。这两种作用相互叠加，就可能使社会再生产的成本上升，使资本积累效率下降，并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由此可见，劳务中介在一定规模内能够帮助产业资本降低招工成本、加快劳动力流动，但其作用存在客观限度。当中介活动超过社会实际需要，特别是当多层转包、重复收费和工资克扣取代了有效的劳动力配置时，中介原本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就会减弱，甚至转化为阻碍生产发展的因素。**中介规模越是超过社会实际需要，其重复流通过费用、对工人收入的侵蚀以及对资本积累效率的负面影响，就越可能凸显。**

四、个人中介和劳务公司之间的关系

个人中介与劳务公司之间并不完全是同行竞争关系，或许还处于劳务中介体系不同层级上的上下游关系。个人中介是庞大劳务公司网络中最基层的业务人员，也是整个商业资本网络最末端的一环。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招揽工人，将工人组织起来并介绍进厂，以此获取介绍费。但个人中介通常缺乏直接与工厂签订招工合作协议的渠道和条件，因此必须依附于劳务公司开展业务。劳务公司掌握着与工厂合作的渠道和招工协议，个人中介则利用自身的人际网络为劳务公司输送工人，双方由此形成了依靠劳动力输送链条维系的利益关系。在实际运作中，个人中介通常先将工人介绍给驻厂劳务。驻厂劳务是劳务公司派驻工厂现场的工作人员，负责接收个人中介输送的工人、办理入职手续，并承担日常用工管理等工作。同一家工厂往往同时有多家劳务公司的驻厂人员，这就形成了不同劳务公司之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必然表现为争相提高工人工资，而更多地表现为争夺工厂的招工业务，竞争谁能够以更低的综合成本向工厂输送足够数量的工人。当劳务公司竞相压低供工成本时，工人的工资就可能成为被压缩的对象，劳动力价格也因此面临进一步下降的压力。

通过这一用工链条进入工厂的工人，往往以劳务派遣工等形式受雇。按照具体的用工安排，工人的工资可能由劳务公司发放，而不是由实际使用其劳动的工厂直接发放。劳务公司依据与工厂约定的结算方式收取相关费用，再按照劳动合同、工资约定及其他用工安排向工人支付报酬。个人中介则可能根据介绍人数、工人的在岗时长等条件，从劳务公司获得相应的介绍费或返佣。这样，工厂、劳务公司、驻厂劳务和个人中介便被纳入同一条劳动力输送与管理链条之中。从经济关系来看，这条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并不处于平等地位。产业资本通过使用工人的劳动力组织生产，占有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劳务公司则依靠掌握招工渠道、组织劳动力输送和提供相关管理服务获取收入，并可能从中取得商业利润；驻厂劳务作为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主要承担现场管理和业务执行职能，其个人收入通常取决于劳

劳动合同、薪酬制度或业务提成安排；个人中介则依靠招揽工人获取介绍费。各个环节的收入来源和经济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不能将它们一概视为直接克扣工人工资，但它们都可能参与劳动力商品流通所形成的利益分配。

问题在于，当劳务公司和个人中介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收取不合理费用或设置其他不合理扣款来扩大自身收益时，工人就不仅要承受产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还可能遭受中介环节对其劳动报酬的进一步侵蚀。特别是在工人缺乏稳定就业渠道、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条件下，个人中介能够利用工人急于就业的处境招揽劳动力，劳务公司则凭借与工厂的合作渠道控制工人的进厂机会。工人虽然是整个生产过程的直接承担者，却可能在工资确定、用工关系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缺乏相应的议价能力。

因此，个人中介、驻厂劳务与劳务公司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彼此独立的同行，而应当放在同一套劳动力输送和管理体系中考察。个人中介处于最基层，负责招揽工人；驻厂劳务承担现场接收和管理职能；劳务公司掌握与工厂的合作渠道，并从劳动力输送和相关服务中获取收入。三者组织地位、职能和收入规模上存在明显差别，但都可能成为产业资本获得和管理劳动力的中间环节。当这些环节不再以有效配置劳动力、降低必要的招聘成本为主要作用，而是通过层层收费、压低工资和转嫁用工成本来维持自身收益时，它们就会加重工人的经济负担，成为侵蚀工人劳动报酬、强化资本对劳动力支配的中介链条。

五、资本积累和集中在劳务中介行业的表现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相对过剩人口不断以新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大量劳动者即使没有稳定工作，也可能通过零工、日结、平台接单等方式获得零星收入，因而不能仅凭公开的失业率判断劳动者的实际就业状况。2023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年均值为5.2%。但这一指标不能完整反映就业不足、劳动收入不足和工作不稳定等问题。一个劳动者即使只能找到零星的临时工作，收入

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也可能不再被统计为失业人员。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无产阶级的就业状况，不能只关注公开的失业人口，还必须考察那些没有稳定工作、收入不足、随时可能失去工作，以及处于失业与临时就业之间的劳动者。至于这些人口的实际规模，则需要结合就业调查和具体行业资料进行估算，不能在缺乏依据的情况下直接断言实际失业人数是官方数字的一倍或两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在经济上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大批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转化为能够支配雇佣劳动的资本。这两个条件相互联系，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再生产。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原始积累，正是直接生产者遭受剥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生产资料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这种分离并没有停止，而是随着资本积累、竞争和集中，以新的形式不断延续。

劳务中介正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作为商业资本的一种具体形式，劳务中介介入劳动力商品的流通，将分散的劳动者组织起来，向产业资本输送劳动力。一般商业资本经营衣服、手机等商品，劳务中介经营的则是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劳动力依附于劳动者本身，不能脱离劳动者而独立存在。中介促成劳动力进入生产领域后，工人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劳务中介不仅承担招工和介绍工作等职能，还通过集中招聘、组织劳动力流动和降低产业资本的用工成本，帮助资本更迅速地获得和调动劳动力。在实际运作中，个人中介、驻厂劳务和劳务公司构成了不同层级的劳动力输送网络。个人中介通常依靠自身的人际关系招揽工人，因缺乏直接与工厂建立合作的渠道而依附于劳务公司；驻厂劳务作为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接收工人、办理入职手续和处理现场事务；劳务公司则依靠与工厂的合作关系组织劳动力输送，并按照相关协议获取服务费用或经营收益。个人中介可能根据介绍人数和工人的在岗时长获得介绍费，驻厂劳务则按照其劳动合同或薪酬制度取得报酬。不同环节的职能和收入来源并不相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产业资本获得和管理劳动力的中间体系。

这一体系能够降低产业资本自行招工的成本。当企业订单增加时，劳务中介可以迅速组织工人填补缺口；当订单减少时，企业又可以通过调整派遣用工等方式缩减用工规模。与企业分别进行招聘相比，中介集中掌握招工渠道和劳动力资源，能够提高劳动力配置的速度和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主要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并不意味着劳动者获得了同等程度的自由。企业可以根据生产任务调整用工规模，工人却可能因此失去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承担重新就业的风险。资本的用工需求越是频繁变化，劳动者的生活就越可能受到订单波动的支配。

劳务中介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同一家工厂往往同时与多家劳务公司合作，各家公司争夺的主要是工厂的招工业务和劳动力供应订单。在这种竞争中，劳务公司未必通过提高工人工资争取工人，而可能通过压低供工成本、扩大招工规模来争取客户。当企业将降低用工成本作为选择中介的重要条件时，工人的工资就可能成为被压缩的对象。若中介还通过不合理收费、克扣工资等方式扩大收益，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进一步减少。由此，劳务中介在提高劳动力流通效率的同时，也可能成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削弱工人议价能力的手段。不过，劳务中介的作用存在客观限度。商业资本通过参与流通，能够帮助产业资本节省部分流通时间和费用，但它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如果中介体系超过社会实际需要，出现多层转包、重复收费和重复管理，就可能增加社会为劳动力配置付出的成本。

劳务中介行业内部也存在资本积累与集中的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推动资本不断扩大经营规模、降低成本和争夺市场份额。大型劳务集团可能凭借资金实力、稳定的客户资源和跨地区的招工渠道承接更多业务，而缺乏稳定客户和周转资金的小中介，则更容易受到订单波动、垫资压力和结算风险的冲击。部分小中介可能因此退出市场，其客户和业务也可能被规模更大的企业接手。资本积累与集中并不只发生在产业资本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商业资本内部。劳务中介既是资本主义分工发展的产物，也可能通过争夺招工渠道、扩大劳动力供应网络和压缩经营成本，进一步推动商业资本之间的竞争与集中。但行业集中度是否确实提高，仍需要结合不同规模企业的收入、市场份额和并购情况等资料加以验证。

从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来看，劳务中介的影响并不止于劳动力流通领域。当中介通过克扣工资或不合理收费侵蚀工人的实际收入时，劳动者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消费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工人虽然参与生产、创造商品和财富，却不一定能够获得足以维持正常生活的收入；产业资本则在追逐剩余价值的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压缩劳动力成本。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由此可能形成更加尖锐的矛盾。大量劳动者缺乏足够的购买力，与资本不断扩大生产的趋势并存，可能导致商品积压、销售困难、生产收缩和投资减少。危机爆发后，企业为了维持利润，可能进一步采取裁员、压低工资和削减用工成本等措施，使工人的收入与消费能力继续下降，反过来加重商品销售困难。劳务中介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但当它通过压低劳动报酬、转嫁用工风险和加剧就业不稳定参与这一过程时，就可能进一步加重劳动者的贫困，并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因此，劳务中介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通过集中招工和组织劳动力流动，帮助产业资本降低用工成本、提高调动劳动力的效率；另一方面，当中介体系围绕争夺市场份额和扩大自身收益而过度膨胀，特别是通过重复收费、克扣工资和转嫁用工风险维持经营时，它就可能增加流通费用、侵蚀工人收入，并加剧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矛盾。劳务中介既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支配。

资本积累和集中并不会自动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展，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越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务中介所展现的，正是这一矛盾在劳动力流通领域中的一种具体形式：劳动者越来越依赖社会化生产体系谋生，而劳动力的组织、配置和使用却越来越受到资本增殖需要的支配。对劳务中介的考察，不能停留在对个别中介收费行为的批评上，而应当把它放回资本积累、商业资本竞争、劳动力价格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整体关系之中，揭示它如何参与资本对劳动力的组织与支配，以及这种作用如何受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约。

六、中国特殊的产业后备军为中介提供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出现两种对立的趋势：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在某些部门或企业中有时甚至绝对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却在迅速增加。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形成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相对过剩人口。这种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规律，具有三种形态：流动的过剩人口、潜伏的过剩人口和停滞的过剩人口。此外，还有处于最底层、因特殊原因无法找到工作的人。在以上的分析中，文章已经多次提到了产业后备军是中介存在和发展的土壤，但是并没有详细论述中国产业后备军为什么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特殊性对中介的扩张产生了怎样的特殊作用。接下来的部分将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述。

在中国，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特殊性在于其规模。中国的情况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人口基数极大，农村人口多，城乡差距极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产业后备军规模巨大。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农村人口仍然占相当大比例。尽管城镇化率已提高至 66.16%，但仍有约 4.8 亿农村常住人口。大量农村劳动力未完全脱离土地，这些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时进厂打工，农忙时回村种地，处于一种半工半农的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时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也可以在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回农村，形成一个随时可以被调用的劳动力蓄水池。

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约有 2.8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 1.77 亿人，跨省流动的约 7000 万人。中国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大量失业或收入不稳定的人口。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超过 2 亿人，其中有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员。他们的生活来源不固定，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障。他们可能今天有活干，明天没活干，也可能一年中有半年都在打零工，生活缺乏稳定保障。一旦农村经济状况恶化或城市用工需求减少，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他们就会迅速涌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这支庞大的潜在劳动力队伍，构成了

中国产业后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产业后备军的特点就在于可替代性极强，可以随时调动。当中介发布招工信息时，就可以在短时间内从三四线城市或农村地区调集大量劳动力。工人从外地招来，干完一批活再回去，形成一个可以持续调用的劳动力蓄水池。这种蓄水池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户籍制度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处于不稳定的地位，他们可以在城市打工，但无法获得城市户籍，也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物质服务和社会保障。土地制度使农民在失业时还可以回到农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只意味着他们不至于轻易地全部失去农村的退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量农村劳动力直接转化为城市流民。劳务派遣工的社会保险缴纳率不足 50%，意味着工人在失业后无法依靠失业救济来维持生活，不得不继续寻找工作，即使是条件极差的工作。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一个结果：十几亿人口构成了巨大的、可替代的劳动力供给群体；城乡差距又使劳动力能够持续地从农村流入城市；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在城市的稳定定居；土地制度则使部分农民在失业后仍能返回农村。这些条件共同决定了中国产业后备军的特殊性：不仅规模极大，而且流动性极强、可替代性极高。在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后备军主要表现为城市中的失业工人；而在中国，产业后备军可以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大规模调动，也可以在不同工厂之间频繁调动、遣散，再被重新调用。这种极高的流动性对中介的作用是直接的。中国产业后备军特有的巨大规模，为中介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使中介调动劳动力变得极为便利。中介不需要维持固定的工人队伍，只需要在需要时从蓄水池中抽取劳动力，用完再将其放回去。产业后备军越庞大，中介能够抽取的劳动力就越多，工人也就越容易被随时调用、随时遣散。中介不需要为工人的就业负责，只需要在工人需要就业的时候把他们送进工厂。

2017 年，劳务派遣企业数量为 5.8 亿家，2023 年增至 35.23 万家，增长了 5 倍以上。而同期，中国灵活就业人口从约 1.5 亿人增至约 2 亿人，农民工总量从 2.87 亿人增至 2.98 亿人。劳务派遣从业人员约 6000 万人，其

中农民工占 61%；63% 的农民通过中介找工作。这些数据证明，中国产业后备军规模越大，中介的规模就越大，两者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中介的扩张本身就是产业后备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表现。2025 年，劳务市场规模预计达 2.8 亿元；制造业中约 70% 的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电子厂、物流仓库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旺季时，派遣工占比高达 60% 到 70%。当产业后备军的规模持续扩大，中介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产业后备军越庞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中介就越能利用这种竞争持续压低工价，因为总有更愿意接受更低工资、更差劳动条件的工人。一个工人不愿意干，中介马上就可以换下一个。工人之间为了争夺一份工资而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压倒了工人之间的团结，使工价被持续压低。

中介通过压低工价，进一步压低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使工人更难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进一步扩大产业后备军。工人因为工资低而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不得不继续工作，甚至让妻子儿女也加入劳动力市场。这就使劳动力供给进一步增加，产业后备军进一步扩大。于是，产业后备军与中介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循环：产业后备军为中介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使中介可以持续压低工价；中介通过压低工价，进一步压低工人的生活水平，扩大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产业后备军越大，工人的议价能力就越低，中介便更加肆意地降低工人的工资。寄生是中介盈利的手段，产业后备军则是这种寄生得以持续的条件。

以上分析表明，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现象。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本积累和机器对人工的替代，都会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部分找不到稳定工作的人口，只能接受临时工、日结工、派遣工等非正规的就业形式。但特殊的是，中国产业后备军不是一般的产业后备军，它具有以下特点：

- 1、首先是规模巨大。中国有 14 亿人口，农民工总量约 2.98 亿，灵活就业人口约 2 亿。这一规模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找到相同的情况，是中国的特殊性所在。

- 2、城乡差距所形成的流动性，使中国的产业后备军可以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农忙时回村，农闲时进城。这种大规模的城乡往返流动，是中国产业后备军区

别于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

3、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工人即使长期在城市打工，也难以获得城市户籍及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使他们难以在城市稳定定居，也使劳动力能够持续在城乡之间流动。

4、工人失业后可以回到农村，这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失业时仍有退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他们全部滞留城市，形成大规模的流浪群体。

因此，同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但中国产业后备军具有特殊的规模、特殊的流动方式和特殊的制度条件。这些特殊性使中国产业后备军具有极高的流动性，而中介正是利用这种流动性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和扩张。普遍性决定了产业后备军和中介具有存在的客观基础，特殊性则有助于解释中国产业后备军和中介为何能够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以及劳动力为何具有如此强的流动性。如果没有这些特殊条件，中国的劳动力中介也就难以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七、中国中介是如何压迫工人的

1、中介通过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夸大工资待遇，隐瞒实际劳动强度，欺骗工人。工人在招聘软件或线下报纸上看到的是“高薪急招”“月入过万”，实际入职后才发现，工资底薪极低，需要靠加班和绩效才能勉强达到宣传中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实际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住宿条件也非常简陋。

2、中介通过劳务派遣合同或口头协议中的模糊约定，为推卸责任留下空间。合同中出现“根据的规定”“按实际情况调整”等表述，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形式依据，实际上却可能被中介利用，以合法形式掩盖压榨工人的目的。工人入职时通常不会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即使阅读了，也未必理解其中的法律含义。当工人想要维权时，中介便可以拿出合同条款作为依据，而工人往往难以证明合同条款与实际约定不符，也难以证明中介存在欺骗行为。

3、中介通过各种名义和手段压低工时单价、虚报工时、扣除各类费用。具体手段包括以管理费、保险费、服装费、体检费等名义扣除工资；以未干满指定天数为由，拒绝报销餐费、接送费，甚至拒绝支付工资；以各种理由拖延工资发放，迫使工人为了尽快拿到钱而接受不合理的扣款条件。有的劳务中介甚至能够从工人的工资中抽取三分之一。

4、中介通过劳务派遣合同，将工人挂靠在皮包公司名下，使工人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变得复杂。当发生劳动纠纷或工伤事故时，用工单位与中介可能相互推诿责任，工人只能找中介解决，而中介又利用合同漏洞、法律适用上的争议以及拖延诉讼等方式逃避责任。工人要申请劳动仲裁，往往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劳动关系；中介不提供劳动合同，或者合同内容存在虚假记载，都会增加工人的维权难度。即使转而提起诉讼，维权所需的时间和成本也可能令工人难以承受。有些中介公司甚至可能已经跑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被迫只能吃下这倒霉的苦果。

5、黑中介利用工人在异地举目无亲、经济困难的处境，通过拖延、威胁、不予回复、冷处理等方式控制工人。工人面临生活压力，不可能为了几百块钱就在异地耗上几个月甚至半年。中介正是利用工人耗不起的现实，采取拖延战术，迫使工人放弃维权。此外，中介还会通过傲慢的态度和威胁性语言，例如声称“你告也没用”“你拿我也没办法”，打击工人维权的信心，最终迫使工人放弃斗争。

中介是大工业发展和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业资本在劳动力领域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在资本主义为应对经济危机和用工波动所产生的矛盾时，在劳动力流通领域形成的寄生性中间环节。中介本身不直接创造价值，却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使资本能够以更低的用工成本、更少的用工风险来组织生产、获取利润。中介的扩张使工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也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归根结底，中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流通领域的具体表现。中介的扩张及其对工人的压迫，最终只会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大龄采茶女工调查报告

燕安

每年三四月份，许多农村大龄劳动妇女会前往浙江，应聘采茶这一临时性零工。这类工作通常集中在茶季期间，她们利用农闲时间外出劳动，主要是为了补贴家用、维持家庭生活。三月下旬开始，大龄妇女便陆陆续续出发前往浙江采茶。

这些采茶女工的收入普遍并不高。她们通常一个月工作二十多天，能够获得两千三百元左右收入的，已经属于其中相对较高的收入群体；更多人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元。对于承担家庭生活压力的农村大龄劳动妇女而言，这样的收入实际上十分有限。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里的关键并不仅是“工资低”，而在于她们能够作为劳动力商品出卖的时间和体力，本身就被限定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市场范围内。她们年龄较大、劳动技能有限，又缺乏稳定的就业岗位，因此能够选择的工作本来就少。在这种条件下，劳动力供给相对集中于少数低门槛行业，劳动者之间为了获得工作而形成的竞争，也就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与雇佣她们的农业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们即使劳动时间很长，最后得到的收入仍然十分有限。她们只能忍受加长的劳动时长，因为除了继续增加劳动时间之外，很难找到提高收入的其他办法。对于缺乏生产资料、缺乏稳定职业和社会保障的劳动者来说，自己的劳动力几乎就是唯一可以拿来交换生活资料的东西。

值得关注的是，从事采茶劳动的并非以年轻人为主。四十岁左右的劳动者已经比较少见，许多采茶女工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甚至还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了补贴家用、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一些劳动妇女即使身体有病，也不得不继续从事高强度劳动，一天往往还要连续劳动十一二个小时。人的年龄在增长，身体也会衰弱，能够出卖的劳动能力总有减少的时候；可是，只要她还得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取

得生活资料，她就不能退出这个市场。即使年老了，体力已经不如从前，只要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她仍旧不得不把剩下的劳动能力拿去交换工资。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时特别强调，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使用并不是一回事。劳动者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力，而在劳动过程中，他所创造的价值又通过具体劳动表现出来。对于这些大龄采茶女工来说，她们必须尽可能延长劳动力的使用时间，才能换取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收入；而随着年龄增长，她们的劳动能力下降，又迫使她们付出更多劳动时间来获取到能够维持生存的薪资。

她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低收入，还有相当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面对住宿条件差、饮食条件差等问题，许多女工表现出一种无奈的接受态度，认为“有得住、有得吃就行”。但实际上，她们所谓的“吃饱”往往也十分勉强，有时只能争抢吃饭才能够勉强填饱肚子。吃的也不过是清水面条。住宿条件同样十分简陋，有的住在铁皮棚里，有的睡通铺，有的睡上下铺，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连基本的休息条件都难以得到保障¹。这里也涉及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劳动者并不是机器，她必须吃饭、休息、睡眠，并且需要恢复在第二天继续劳动所必需的体力。食物、住宿和休息条件，实际上都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当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而不得不接受极低的生活条件时，表面上看是她们“降低了自己的要求”，实际上却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

更为严重的是，她们日常饮用的水也缺乏基本保障。网上曾有一位大龄采茶女工发布视频哭诉，称她们饮用的水中掺杂着大量沙子，浑浊得像黑水，喝下去之后还容易引发腹泻。这样的生活条件，甚至让她愤怒地表示，这种水“简直是给猪喝的水”²。相关视频一度引发大量关注，也激起了人们对这种劳动待遇以及背后资本逐利逻辑的愤怒。然而，随着采茶季结束、这份临时性工作消失，围绕这些劳动妇女处境的关注也随之消退，她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真正解决。

¹ 摘着万元一两的茶叶却要抢着吃一碗白水挂面【BV1E6RXYZEz1】；60 个女人挤一间房，震撼上亿人，我妈就是其中一个！！【BV1XkEtzAEZ3】

² 帮助采茶女解决饮水问题【https://v.douyin.com/ByvSHiX__mC0/】（注：原视频似乎已被下架）

但如果把这种事情归结为某个农场经营者的心肠不好，那就什么也没有说明。资产者他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是体面的、可敬的人，可是一到商业关系中，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利益，还是赚钱。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在这里不是人对人的关系，而是经济关系；工人在他面前首先是“劳动”，是他用来取得利润的劳动力。

况且资产者自己也在竞争，每个资本家都要同别的资本家争夺市场，都要设法保存自己的利润。在这种竞争中，凡是能够少付的费用，他决不会情愿多付。工人住得怎样，吃得怎样，能够得到多少休息，只要还不妨碍他继续劳动，在资本家的算计中就不会占得更高的位置。工人的生活资料被压到愈低的水平，资本用于维持这种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愈少。工人所忍受的恶劣条件，正是这种买卖关系本身的结果。竞争愈使资本家不得不计较每一项支出，工人的劳动环境、再生产条件便愈容易成为节省这种支出的出口。

与此同时，茶叶价格虽然上涨了不少，但采茶工人的工价上涨却并未上涨，就算有极少数资本家愿意多给一点可怜的猫粮，可一斤茶叶的采摘工钱才只上涨了一元左右。采茶采取按斤计酬的方式，目前一斤茶叶大约二十八元。茶叶长得多的时候，一天能够采摘六七斤；茶叶长得少的时候，一天甚至只能采到半斤不到。由于收入直接取决于采摘量，茶叶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她们一天能够挣多少钱。

这里的“按斤计酬”，不过是计件工资在这种劳动中的表现。采多少，付多少，看起来简直不过如此，工人所得的工资，看起来完全会随着她交付的产品的多少而增减。可是，计件工资的特点也正是在这里。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已经由这种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了，因而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也成为多余的，资本家用不着时时站在旁边催促，计件工资已经使这种催促进入劳动本身。采得少，所得就少；要增加自己的收入，工人就不得不更加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这样，原来由资本家从外面施加的监督（压力），就有很大一部分通过工资形式本身发生作用。实行计件工资以后，工人自己的切身利益迫使她尽可能紧张地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更容易提高工人们的劳动强度。

延长劳动时间也就成了工人切身利益中的事情，计件工资之下，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计件价格已经使少休息成为多得一点工钱的条件。表面上，她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劳动到什么时候，采茶工仿佛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可是劳动的形式早已夹持了这种意志。正如恩格斯写那些针织工人时所说的，他们以吃饭、睡觉、工作不受工厂钟声支配而感到骄傲，可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所以那样长，却是由于工资低，不得不这样。因此，前面所说的“她们一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与后面所说的“为了多采一点茶连午饭都舍不得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表现。

为了尽可能多挣一点钱，一些劳动妇女甚至舍不得花时间吃午饭，只带着馒头和榨菜到茶园里解决。馒头往往匆匆吃完，便又急急忙忙埋头干活，因为多休息一会儿，就意味着少采一些茶叶、少挣一些钱。在按件计酬的劳动制度下，劳动者不得不以延长劳动时间和压缩休息时间的方式换取更多收入。

劳动者第二天还要重新工作，她就必须得到一定的休息。可是，按斤付酬把一天所得同当天交出的产品量联结起来以后，少停一会儿，就可以多得到一点工钱；多休息一会就少采几斤，少掉的就是当天赖以生活的一部分收入。因为她们面对的是生活资料的现实压力。当一天少采几斤茶就意味着少几十元的收入时，“休息”也就变成了一个有经济代价的选择。结果，本应用来更新和恢复生命力的时间，也被一天天从休息中夺走。到这时，已经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维持决定劳动到什么地方停止，倒是每天能够耗费多少劳动力，决定还给她留下多少休息时间。

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看，这种制度的作用并不只是把工资算得更加方便，它还能够把提高劳动强度的压力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劳动者为了获得更多工资而自觉地延长劳动时间、加快劳动速度，最终表现为劳动强度的提高。

浙江的采茶活计一年不过这一季。看起来这些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只是趁茶季出来挣些钱，补贴家里的开支；可是茶季过去以后，她们还要继续生活。年龄增长了，体力也不如从前，肯雇用她们的工作却愈来愈少。

茶园农场主只是在需要她们时才雇用他们，所以这些工人常常接连几个星期没

有工作。劳动者所遇到的困难是显然明白的。她们每天都要生活，而雇用她们的人只在需要这种劳动的时候才出现。今天还有茶可采，便有一份工钱；茶季结束，这份收入也就跟着结束。年纪愈大，能够找到的活计就会愈少。只要还不能靠别的收入维持生活，她们就仍旧得去寻找愿意购买自己劳动力的人。对于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采茶女来说，生活是一天也不能停止的。她们归根到底只能依靠临时雇佣维生，因而一个月中哪怕只有几天没有工作，也足以把她们推向生活无以为继的深渊。浙江这些采茶妇女面临着工作时有时无，而生活却一天也不能停止的处境，临时做几天工，是她们继续维持生活的唯一办法。

采茶女工能够选择的工作愈来愈少了，实际上也是一个分析大龄劳动者问题的关键。资本家使用劳动力，只看这种劳动力在当时是否合它的需要。工人人口是在资本变化不定的需要支配下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去的。甚至在现代工业中，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少年工人正是资本所需要的，等少年期一过，能够继续留在原生产部门的便只剩下极少数，其余的人通常被解雇。体力渐渐衰退以后，原来还肯购买这种劳动力的部门也会渐渐减少，长期劳动使许多工人未老先衰，到了四十岁以后便已经不能继续原来的工作。劳动者仍旧要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可是资本能够使用她的地方已经少了。于是，她只好退到那些报酬较低、雇用也不固定的工作中去。“能够选择的工作愈来愈少”，也就是这种关系在年龄增长以后愈来愈明显的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并不会把所有愿意劳动的人都经常地吸收到生产中去。总有一部分工人今天有活干，明天没有活干，或者只能断断续续地找到工作。这些暂时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的人，同在业工人并不是毫无联系地处在劳动社会中。正因为外面总有人等着工作，已经有工作的工人就更难拒绝较低的工资和较重的劳动。资本需要增加人手的时候，可以从这些人中间找到工人；不需要的时候，又把他们排挤在生产之外。

失业工人的存在并不只是说明有些人没有工作。它还影响着已经得到工作的人。只要还有许多人等着接替，在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或减轻劳动时，资本家就有了压低这些要求的条件。就业的人和失业的人彼此竞争，结果这种竞争反过来加强

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有这样一批随时等着找工作的人存在，对已经有了工作的人也会产生压力。雇主知道外面还有人等着干活，在业工人拒绝低工资或过重的劳动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总有人可能接替他们的位置，如果不肯接受原有的工资和劳动条件，资本家随时还可能寻找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们。失业者和半失业者越多，在业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也就越困难，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资本家在扣减工人工资和支配劳动条件上就占据了更加优越的地位。

相对过剩人口也并不只是完全失业的人。工人有时有工作，有时没有工作，或者只能得到很少的工作，同样属于这种情形。资本在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把他们吸收进来，需求减少以后又把他们排挤出去，因此他们总是在就业和失业之间游移。年龄较大的工人所受的影响还更明显。劳动力长期被使用以后，体力逐渐下降，原来能够做的工作也可能不再要他们。工人到了中年，往往已经多少衰老，于是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原来较好的劳动部门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可即便这样他们还得继续生存，还不能停止寻找工作，却只能在条件更坏的地方继续出卖自己的劳动。

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年过六旬甚至七旬，却仍然需要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来换取收入。年龄越高反而使她们更容易被推向那些收入低、劳动强度高、保障不足的工作。茶季结束以后，她们的问题也许暂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但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他们的压力还远远不会随着采茶季的结束而消失。茶季过去以后，还有大量艰苦而高强度的农活等着她们，挖红薯，挖大蒜，采摘玉米，甚至还要前往新疆采摘棉花。随着季节更替和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总有一批又一批零工农活等着这些大龄劳动者去做。她们跟随着季节和农作物的节律，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干。

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她们的劳动能力随着农作物的生产周期，不断地被不同地区的劳动需求所吸纳。哪里需要劳动力，她们就必须迁徙到哪里；当一个季节的劳动告一段落，她们又不得不去寻找下一个季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像中修口中的“灵活就业”，但如果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这种灵活性主要掌握在劳动力需

求一方。问题在于，劳动者不得不随着工作机会而移动，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生活需要来决定何时劳动和何地劳动。所谓“灵活”，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非是指劳动状态的极其不稳定。这些农村劳动妇女在社会中始终从事着最底层、最不引人注目、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工作。她们往往没有一份能够长期稳定维持生活的职业，而是在各种零碎的劳动之间不断地奔波。当家庭需要她们时，她们就必须中断工作，承担起照料孩子和老人的责任；而一旦家庭的负担稍有减轻，她们又不得不重新走向社会，寻找零工以维持家计。

我们以往很容易忽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她们不仅承受着雇佣劳动的重担，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家庭劳动。照顾老人、抚育子女以及处理家务，这些劳动虽然通常没有直接形成工资，却同样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们实际上同时承担着两种劳动，一种是在市场中可以换取货币收入的雇佣劳动，另一种是在家庭内部无偿完成的劳动。后者虽然不直接表现为工资，却使整个家庭能够继续维持日常生活，也使其他家庭成员能够继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单纯按照她们一个月挣多少钱来衡量她们的劳动负担，实际上会低估她们承担的全部劳动。

今天中国的社会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需要继续劳动的大龄工人已经不只是农村妇女，大龄男性劳动者同样越来越多。老年社区保安、环卫工人、商场保洁、公共厕所清洁工……这些工作中都能看到大量老年劳动者的身影。而他们一个月能够拿到的工资，很多时候也不过三千元左右。

我曾经在一家一线城市的商场里做服务员，一个月的工资大约五千元。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出来做兼职的大龄工人，有阿姨，也有叔叔。他们上午或者下午在这里兼职四个小时，洗完碗、干完活，又赶紧骑着电动车前往下一个兼职地点，再工作四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被切割成一段又一段零碎的劳动时间。各种兼职加起来，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四千零八十五元。

我曾经问过他们：“年纪都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出来工作？孩子们呢？”

老人只是笑着说：“他们也要养家啊。现在不比以前了，钱越来越不值钱。能

出来干一点就干一点，也是想让孩子压力小一点。我这一把老骨头，能多挣一点，就能多给他们减轻一点压力。”

老人本来到了应当休息的时候现在却仍旧出来做工，所得的工资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使已经成家的子女少负担一点，社会的压力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又回到家庭内部。子女要养活自己的家庭，老人为了不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便继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本来已经应该退出劳动的人仍旧留在劳动中，而年轻一代也并没有因此获得轻松，生活的重担没有消失，只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来回腾挪。

这些老人，大多同样来自农村。他们之所以在年纪已经很大之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出来劳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足够的养老保障。有些老人甚至没有养老金；即使有，领取的金额也只有每月一两百元左右。这样的收入显然无法支撑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养老。他们已经到了本应逐渐退出高强度劳动、到了享受晚年生活的年龄，却依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体力去换取收入。年轻时，他们用劳动养育下一代；年老以后，他们本应得到社会保障，却又因为保障不足而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继续从事那些最辛苦、最不稳定、最缺乏保障的工作。

这些劳动者年轻时通过劳动获得工资，用工资购买生活资料、养育子女、维持家庭；而到了老年，劳动能力下降，本应由社会保障来承担一部分生活成本。但当这种保障不足时，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就重新压回家庭，甚至重新压回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优势的老年劳动者自己的身上。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对于这部分缺乏养老金、积蓄和其他稳定收入来源的人来说，继续劳动首先是一种迫切的生存需要。只有明白这种情况，我们才能理解大龄劳动者的问题。

从采茶女工到农忙季节的流动零工，再到城市里的保安、环卫和保洁工，都是那些已经年老，却还不能停止劳动的人在从事。她们和他们跟随着农作物的季节、跟随着城市零工的需求，也跟随着家庭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压力，一直不停地劳动下去。我们一些同志长久以来关注的，往往是年轻劳动者的就业、工资与劳动条件，却很少把目光投向那些已经步入中老年、却仍然不得不依靠劳动维持生活的大龄劳动者。事实上，他们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劳动群体。

在农村，大量土地荒废、流转或被征收以后，许多农户已经越来越难以单靠土地维持生活。年轻人进城务工，大龄劳动者也不得不另外寻找收入。采茶季节，她们到浙江采茶；茶季过去以后，又去挖红薯，挖大蒜，摘玉米，有些人甚至远赴新疆采棉花。农事随着季节更替，她们的劳动也跟着转移，哪里还有活可做，她们就到哪里去。长年落到她们手里的，往往又正是那些劳动最重而又报酬最低的活计。

要说明为什么一部分农民已经不能依靠自己的土地生活，而不得不一年到头到处寻找雇主，就不能再把今天的农村看成由大体相同的农户组成的整体。农户之间在土地、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上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大，这种差别又不断改变着他们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

农村中富裕农民的力量，并不主要在于人数多，而在于他们掌握了较多的土地、牲畜、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他们的农业已经不只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是为了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并从中取得货币收入。这些收入在满足家庭开支以后还有剩余，其中一部分又投入生产，使原有的经营继续扩大。因此，他们不再只是普通的小农，而已经逐渐成为农村中的经营者，有些还兼做买卖、放债或者经营其他产业。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正是通过这部分农户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

同他们相反，农村中的下层农户占有的生产资料很少，有些甚至已经失去了独立经营所必需的条件。土地太少，牲畜和农具也不足，仅靠自己那一点农业收入已经不能养活全家。于是，他们虽然名义上还保留着农户这个名义，实际上却越来越要靠给别人做工生活。自己耕种土地已经不能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出卖劳动力反而占了更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农民还没有一下子完全变成雇佣工人，因为他们可能还保留一点土地，也可能在农忙时经营自己的小块田地；可是他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依赖工资，他们同农业无产者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接近。

这样一来，旧的农民阶层就不再保持原来的样子。商品经济深入农村以后，有些农户积累了更多生产资料，逐渐变成农村资产阶级；另一些农户则不断失去独立经营的条件，只得越来越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旧式的自然经济就在这个过程中瓦解，原来仿佛同属于一个农民阶层的人，也愈来愈明显地分到两个不同方面。农

村中现存的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大体相近的小农，而是一边掌握较多生产资料并雇用别人劳动的人，另一边则是必须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人，这种人物占农民中的绝大多数。

一旦农户已经不能主要地靠自己的土地维持生活，而不得不把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工资当作生活资料的泉源，那么，决定这个家庭生活状况的就不再只是土地收成的多少。田地以外的劳动能否找到，工资能否补足生活的需要，开始越来越直接支配着一家人的生活。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用工的人数和工资高低。这样，原来分散在各处的市场关系，便经过劳动力的买卖，进入到农村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这些农村劳动者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同整个劳动力市场联系在一起。

如今，不少采茶女工已经五十岁以上，四十岁左右的相对少见，甚至还有七十岁的老人。为了补贴家用、减轻子女负担、维持基本生存，她们即使带着病也不得不继续进行高强度劳动，一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她们面对着低工资、恶劣住宿、饮食和饮水条件，却仍然只能选择忍受。因为对于她们而言，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工作条件够不够好，而是如果连这份工作都没有，她们还能依靠什么呢。

这实际上也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自由”的另一面。劳动者在法律意义上可以选择是否接受工作，但当她没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没有稳定的社会保障时，这种选择本身就严重受到现行经济条件的限制。诚然，她可以拒绝十一二个小时的劳动，也可以拒绝恶劣的住宿条件，但拒绝之后，她是否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对这些大龄劳动者来说，“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条件合理，恰恰说明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十分有限。她们接受恶劣条件，不一定是因为认为这些条件合理，而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条件拒绝。

这种处境同样存在于城市，随着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年龄门槛越来越明显，许多岗位偏向年轻劳动者，四十岁、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逐渐被归入“大龄工”群体。当年轻学生工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专业对口岗位又有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只能进入工厂、餐饮、服务等行业，与中年劳动者共同争夺有限的岗位。中年劳动者为了维持每月五千、六千元左右的收入，不得不把多个零散兼职拼凑起来；而当这

些零工岗位也被更多年轻劳动者占据之后，年龄更大的劳动者便进一步失去了就业空间。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中年人被迫转向更加零散的兼职，而老年劳动者则逐渐被推向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对于那些没有稳定养老金、没有足够积蓄的大龄劳动者而言，一旦连零工都找不到，就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

这种**向下挤压**并不仅仅是不同年龄劳动者彼此争夺工作的结果，年龄不同的劳动者会在同一份工作面前发生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本身又有它的条件。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所需要的劳动力总是有限的，当稳定就业的工作已经不能容纳现有的劳动者时，工人之间彼此争夺工作的情形就会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年纪较大、体力已经衰退或者没有专门技能的劳动者，往往更早地被排挤出来，只能转到条件更差的工作中去。

如果有人把大龄劳动者的处境归咎于他们自己“没有竞争力”，那就是把事情颠倒了。五十岁、六十岁的劳动者，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不得不同年轻人一道去争夺搬运、保洁、洗碗、采摘一类的工作，是怎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使他们到了这个年纪仍旧不能离开劳动力市场呢？尤其是在农村，许多老人没有养老金，即使能够领取，金额也往往十分有限。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微薄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支撑生活，更无法应对疾病带来的巨大支出。老人辛苦多年积攒下来的钱，很可能因为一场大病就迅速被耗尽，结果他们只能继续劳动、继续节衣缩食，把本应属于晚年的时间重新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之中。

劳动者在有劳动能力的时候，用自己的劳动参加社会生产，同时靠所得的工资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但是人的劳动力并不是一种永远不会衰退的自然力。几十年的劳动过去以后，我们的体力都会衰弱，疾病也会增加，能够继续出卖的劳动力也就越来越少；可是吃饭、住房、医疗这些需求却仍旧存在着。

如果这时还要求劳动者完全靠过去一点一点留下来的积蓄养活自己，那就等于把一个社会的问题重新变成了个人的问题。社会每年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只生产自己当天所消费的那一点生活资料。我们所生产的是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这个总产品在重新用于生产以后，剩下的部分还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生活需要，其中

当然包括那些已经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我们也总要照顾并维持那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因为这样的支出本来就是社会总产品分配出来的一部分，而不能看成对某些人的额外恩惠。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却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劳动者年轻力壮的时候，他的劳动力能够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因而有资本家愿意购买这种劳动力；等到他年纪大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下降，他在劳动市场上的处境也会跟着他的身体恶化起来。社会财富仍在增加，而曾经参加这种财富生产的劳动者，却可能因为已经不能继续按照原来的劳动强度继续劳动，而失去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倒并不是因为社会缺少养活老人的生活资料——问题只在于这些生活资料掌握在谁手里，又用什么办法分配。劳动者过去参加生产所创造的财富，已经以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形式同他分离开来；到了老年，他仍然必须用工资、养老金或其他货币收入把维持自己生活的那一部分重新买回来。说到底，这些财富原来就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自己过去的劳动。

因此，劳动了一生的社会成员到了老年还不得不继续寻找工作，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所在。他参加了一生的社会生产以后，为什么到了劳动力已经衰退的时候，仍然只有继续出卖这种已经衰退的劳动力，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财富在社会的一端不断积累，而劳动者一旦不能继续充当资本增殖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会反而失去了保障；老年劳动者的处境，不过是雇佣劳动制在未来我们身上的表现罢了。

从浙江的采茶女工，到跟随季节辗转各地的农活零工；从农村的大龄妇女，到城市里的保安、环卫、保洁、洗碗工，这些看似分散的劳动者，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个越来越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年龄越来越大，劳动能力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充足，停止劳动却仍然不是他们能够自由决定的事情。

随着劳动者逐渐衰老，这种关系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资本在劳动力尚且强健的时候尽量使用它，而当这种劳动力经过长年耗费，已经不能再以原来的程度供资本支配时，劳动者便开始从原有的工作中被排挤出去，滑落到报酬更低、劳动条件更坏的地方去。可是，资本家对于这种劳动力的需要减少了，劳动者对于生活资料的

需要却没有减少，甚至还是增加的。可恰恰在他的体力已经衰退、最难重新找到工作的年纪，他的生计反而变得更加没有保障。社会中明明已经有足够的劳动产品，完全能从社会总产品中拿出一部分，维持那些已经丧失或者正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他今天得到的工资，也不过是过去由工人阶级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一部分，只是以工资的形式重新回到工人手中，可是我们这些体面的绅士们，偏偏连从工人自己生产出来的财富中拿出这样一小部分来维持他们的晚年，也要装出一副仿佛蒙受了莫大损失的样子，甚至还要把本来属于社会产品中的这一部分说成是对穷人的恩惠。这样看来，最卑鄙的守财奴同他们相比，倒也算得上慷慨了。

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过去创造的财富已经作为资本同他对立起来。正因为这些财富原来就是劳动的产物，却已经同生产者相分离，集中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家手中，并反过来成为支配和使用劳动者的力量。劳动者越是衰老，能够卖出的劳动力越少；可是只要没有别的生活来源，他就越不能停止这种出卖。资本先耗费他的劳动力，随后又把已经耗损的劳动者排挤到较低的劳动等级，甚至排挤到过剩人口中去；至于这个人以后怎样生活，则不再是资本家所关心的事情。

最后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日本社会还存在着九十岁的高龄劳动者，在日本社会中，高龄劳动者继续劳动的现象已经相当明显。根据日本总务省《2020 年国势调查》的就业统计，90~94 岁年龄段仍有 48,074 人被统计为就业者，95 岁以上仍有 6,077 人就业，说明 90 岁以上仍处于劳动状态的人并非个别案例。近年来，日本多家机构和媒体也报道了类似现象。零工平台 Timee 在 2025 年的调查中指出，在有实际工作记录的劳动者中，最高年龄达到 90 岁；熊本放送报道了一名 90 岁的女性麦当劳员工，她长期负责店内清扫工作，成为日本麦当劳体系中年龄最高的女性员工，报道同时提到该体系中还有 94 岁的男性员工仍在工作。此外，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介绍了一家农业企业的高龄劳动模式，其中最高龄劳动者达到 90 岁。日本厚生劳动省劳动政策审议会在讨论高龄劳动者安全问题时，也有委员指出：“在现在的日本，有些人即使接近 90 岁，也不得不继续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在日本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部分劳动者即

使已经进入高龄阶段，仍然需要通过继续劳动来获得生活资料。

大龄劳动者的问题，归根到底不仅是某一份额工工资多少的问题，也不仅是某一个行业劳动条件恶劣的问题。它所反映的是所有与劳动、土地、养老、就业和社会保障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矛盾，当工人们年老以后依然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生存，但当未来连那些零散、低薪、艰苦的工作岗位都开始变得稀缺时，这些已经被年龄排挤到劳动力市场边缘的大龄劳动者，又将何去何从？劳动者从年轻一直劳动到年老，本来应该意味着她已经为社会创造了几十年的财富，到了劳动能力下降的时候，应当能够依靠过去创造的社会财富获得生活保障。然而现实却是，许多人到了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岁，仍然要重新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以求得生存。她们劳动了一生，却仍然没有获得足以使自己摆脱对劳动力市场依赖的生活条件。

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断的挤压着不同年龄的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就是因为生育率下降不再有新鲜血液提供这帮吸血鬼他们才会着急忙慌想尽各种手段来催婚催育。如果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越来越丰富的商品，能够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却仍然让大量老年劳动者为了几千元甚至一两千元的收入，在茶园、工厂、街道和餐馆里继续消耗自己最后的劳动能力，那么问题显然已经不只是“生产得够不够多”的问题了，真正的本质难道不是资本家贪婪的压迫和剥削么？

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正在这里表现出来，社会化生产使整个社会越来越依赖广大劳动者共同进行生产，但劳动者个人获得的生活保障却并不必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同步提高。相反，在就业竞争、年龄门槛和社会保障不足的条件下，一部分劳动者甚至必须不断延长自己的劳动年限。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情况下，那些年纪已经较大、体力逐渐衰退的工人，反而更难找到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养老金维持生活，他们就只能在本来已经应该休息的年月继续出卖劳动。我们过去从书本中读到俄国、德国工人的悲惨生活，如今在中修这里也一一的浮现了。

难道浙江茶园里那些弯着腰的老妇人，只是由于个人的不幸，才到了这样的年纪还不得不出来做工吗？当然不是。她们的境遇同那些六十岁还在搬运货物、七十岁仍旧清扫街道的劳动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这些人已经把自己一生中最好

的年月交给了社会生产，到头来却仍然不得不为每天的生活费用发愁。他们的劳动能力已经衰退得很严重了，为什么一个劳动了一生的人，竟连以后如何生活都没有保障呢？那些浙江茶园里那些五十岁、六十岁甚至七十岁的采茶女工时，她们早出晚归拼命去挣钱，她们的贫困难道仅仅只是某个家庭的不幸吗？为什么社会生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那些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究竟为什么还不能真正享有自己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只要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了却不能停下来”的劳动者就不会因为一个茶季结束而消失。今天她们在浙江茶园里，明天她们可能在新疆的棉田里，后天又可能出现在城市的街道和商场里。

她们随着各地雇工的需要辗转奔走，几十年的劳动过去了，却始终没有真正获得属于自己的安稳生活。而我们对大龄劳动者处境的考察，也不应当止在同情她们的艰辛，而应当进一步调查产生这种艰辛的社会经济根源，并把这种根源置于整个劳动者解放，革命工作中去。劳动者所需要的决不只是资本再给他们提供几份零工，使他们到了七十岁以后还能继续寻找买主？他们所需要的是改变那种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处境、改变使劳动者只有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生活的社会关系，使社会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真正归劳动人民共同支配。到了那时，劳动了一生的社会成员，才不至于因为自己已经衰老，就滑落到失去生活保障的境地。这就是劳动者的解放问题。而这种解放，决不能指望资本家发一点慈悲来实现。它必须由劳动者自己去争取，必须同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斗争联系起来。因为劳动者真正需要的，从来不只是更多的一份零工，而是一个不再必须靠不断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的社会。那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中国马列毛主义学生的阶级斗争

映山红

前言

随着新一轮经济危机的来临与第三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迫近，中国正酝酿着一场足以吞没修正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的革命风暴。越来越多的人在经历经济上的敲骨吸髓式的剥削与政治上以“维稳”为幌子的暴力镇压后，彻底看清了统治阶级以空洞华丽的辞藻堆砌出的“盛世”谎言，认识到只有彻底打倒这个空前未有的法西斯国家机器，中国的劳苦大众才能迎来第二次解放。学生，当代的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之一。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所以当实现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重担落到中国人民的肩上时，中国的马列毛主义学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行者和宣传队。

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运动自 2020 年疫情以来，逐渐从高校知识分子的秘密活动走进了广大觉悟学生和工人的视野里。

初入革命大潮，许多学生同志往往不知所措，或是听从公开频道“左派”的指引去阅读理论书籍，或是误打误撞加入了某个 QQ“革命组织”。然而，很多人钻进前辈的旧纸堆里摘寻字句，在争论爆发时舞文弄墨以示“理论高深”，更有甚者未曾进行过一次劳动实践、参与过一次群众斗争，就妄谈自创理论，要挺胸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承前启后；于墙内网络活跃的“革命组织”，往往迎来一次“革命高潮”后便在网警国安的收网行动中落幕，残存者被迫走向墙外。而“名左实右”的修正主义分子则趁机占领了墙内的宣传阵地，大搞调和主义、容纳安托西修，其内部整日无所事事、吹水聊天，为争夺“革命山头”不惜造谣辱骂、刷屏轰炸、举报开盒：这就是他们“革命的”网络斗争。这些卑劣行径，不知道葬送了多少怀

揣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败坏了整个互联网左派的名声，如今已是过街老鼠，人见狗嫌。

再来看中修相对难以监管的墙外吧。相当一部分组织，及其各类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对外群聊，在面对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时，采取取消主义、放任自流的态度，在客观上助长修正主义扩大阵地。他们不对其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导致他们的外围群聊甚至内部组织无一不褪变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丧失民主集中制的毫无革命纪律性的存在。他们对想要学习革命知识的群众采取一种“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态度，妄想等来大批先进群众自己敲门；对待相对落后的同志，则完全采取放养的办法。最后所取得的结果，则必然是这些群聊及其背后的组织，彻底地沦为网络斗争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代理人。例如，在 XMPP 上臭名昭著的安托西修主义的“流星报”、工农解放社的公开群、Lsep（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些自封的革命组织如今仍盘踞在墙外，如阴沟里的老鼠般下流龌龊，除了吹水聊天、折磨不服从“革命领导”的成员外，还热衷于碰瓷墙外革命左派，用无底线的造谣侮辱和漏洞百出的“理论批判”来攻击真心实意为革命服务的组织和拥护他们的革命群众。

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国马列毛主义运动中丑恶肮脏的一面——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却反马列毛的分子混进了这场光辉的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去，用他们的修正主义面貌冒充革命者，挤占了常年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人民群众对革命运动的认识空白。

用不着证明，这些渣滓对我们革命运动的阻碍作用几乎使革命者几年卖力工作的成果功亏一篑；用不着证明，不从理论上思想上彻底打倒这群冒充革命的跳梁小丑，不彻底用学生造反和革命融工实践从组织上政治上粉碎他们的棚窝，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就休想更进一步。那么，对于马列毛主义学生来说，如何去进行革命斗争呢？

一、中修教育制度和学校的实质

“学生青年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早上，天还没亮，闹钟就响了，你睁开眼，头还是昏的，腰还是酸的，心里一个念头：“我真的不想上学了。”你不是懒，你不是不求上进，你是真的累了。做不完的练习册和补习资料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十几二十年，学不完的书？放了学放了假还要补课、延时服务、参加各种辅导班？有没有担心成绩不好情绪崩溃过？有没有害怕明天考试失眠过？你们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少，压力越来越大？你们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差，眼镜片越来越厚？你们的身体越来越脆弱，动不动就生病？你们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和老师的关系越来越敌对？你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患上抑郁症、焦虑症，自残、逃学甚至自杀？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呢？难道是学生自己不够努力吗？难道是某个老师、某个家长的问题吗？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也不是个别学校的问题，而是整个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压迫所带来的问题，是一整套脱离生产、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奴化教育体系正摧残着我们一代又一代青年！”

学生同志们，看看这篇声讨中修教育的檄文吧。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每天所忍受的现实吗？这样的生活究竟从何而来呢？我国的教育是如何走到今天这种地步的呢？

1976 年怀仁堂政变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复辟时期。1977 年，在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头目邓小平的支持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废除的高考制度死灰复燃了；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工农兵推荐制度消亡殆尽了。这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夺权，其目的是扩大阶级差别、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为走资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铺路。无产阶级子弟重新陷入了服从资产阶级纪律、被分数高低决定人生的泥潭。各年龄段的学生沦为戴着枷锁的囚徒，无止境的作业、考试、习题如同一把脚镣牢牢扣在学生的脚踝。许多学生将他们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业，父母则完全供养着他们。然而，他们愈是将全部

时间精力投入到学业，愈是与生产实践相脱离，就愈是与实际脱节、与工农大众脱离，而更易于接受修正主义政府灌输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最终成为歧视劳动人民、鄙夷劳动的精神贵族，以至于进入社会以后，要么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要么是满脑子功利思想、对“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深信不疑的糊涂虫；要么是被夜以继日的学业投机搞垮了身体，心理多多少少也有问题的残废。

显而易见，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下，学生不是被培养成与工农结合、大有作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是资本家们听话驯服的奴才。资产阶级的学校并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场所，而只是雇佣奴隶的培训基地。只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普及，使用劳动工具对于劳动者所掌握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水平的要求相应提高，资产阶级才不得不把教育普及当作一种必要的手段。可见，受教育虽被资产阶级官僚与雇佣文人称作“基本人权”，其实也只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给予工人阶级的其他“平等权利”一样，仍旧是成为雇佣奴隶受剥削的“平等权利”，处处受限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需求。

中修统治下的学校是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一方面以教学、考试系统性灌输中国特色修正主义理论，用民族复兴、共同富裕等宏大口号与始终“稳中向好”的报道麻痹学生，用儒家思想驯化学生，使学生自觉服从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又支持民间修正主义对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同志本人抹黑污蔑，纵容极端民族主义者以“爱国”名义侮辱攻击进步学生，更有军国主义者公然叫嚣中美、中日开战。而学校本身，由于容纳大批脱离生产脱离人民的学生，充斥着种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一片乌烟瘴气。

中修学校绝不如官僚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宣称的那样，是学生“未来的孵化所”，仿佛脱离了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

列宁说：“资产阶级虚伪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硬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很清楚这种说法多么虚伪。就连提出这个论点的资产阶级自己也把贯彻资产阶级政治作为办学的重点，竭力通过办学替资产阶级训练机灵听话的奴才，

甚至在全国上下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替资产阶级训练这样的奴仆，教他们去执行资本的意志，听从资本的使唤。他们从来不考虑怎样使学校成为培养人的品格的工具。”

列宁一语道破了资产阶级学校的本质。今天中国的学校也不例外，只是比起其他国家、其他时期的学校更有“特色”罢了，不过不是什么进步，而是更为反动。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奴隶人格劳动力的渴求，到处挥舞着军事化管理制度与分数等级制度，以至于将整个学校变成了一所监狱，如血汗工厂般最大限度压榨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把数亿学生的手脚连同思想禁锢在了课桌。换个时兴也普及化的词，就是臭名昭著的“衡水模式”。这是其他一切外国统治者从未做到过的“文治武功”。

并且，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无尽贪欲、对劳动力的需求愈来愈榨干学生的生命。

据统计，中国受压迫学生不同地区普遍面临严重的学业压力与制度性压迫，表现为长期睡眠剥夺、心理健康恶化与身体活动缺失等。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虽教育资源丰富，但学业竞争激烈、补习泛滥；而湖南、四川、广西与“山河四省”则因资源匮乏，在高考筛选中承受更深重的不平等，在校平均睡眠时间不超过 7 小时。数据显示，小学四年级已有逾三成学生感受到巨大学习压力，初中接近半数感到学业压迫，高中阶段更是有七成学生无法升学，形成残酷的选拔体制。根据全国多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呈普遍恶化趋势，且随年龄增长明显加剧。2023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报告指出，初中生中有 43.5% 表示经常感到焦虑或压抑，高中阶段该比例升至超 60%。在 2022 年《儿童蓝皮书》中，北京、上海、江苏等教育压力大的地区，中小学生中存在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占比达到 20%-30%，而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山河四省”，有的省份中学生抑郁风险筛查阳性率

甚至超过 40%。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数据也显示，全国中小学生中存在不同程度心理问题者达 3000 万人以上。这一数据反映出，教育体制下的高压竞争、地域不平等和升学筛选体系正系统性地制造青少年心理痛苦，成为精神压迫与身体压迫的集中体现。如今，我国部分地区学生所承受的压迫已达到制度化、工业化水平，衡水中学与毛坦厂中学尤为典型。衡水中学实行高度军事化管理，学习时间从早晨 5:30 持续到晚间 22:10，超 17 小时，仅每两周休息 1—2 天，更有模仿与学习的高中更是能够在挤压学生休息时间中超越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则号称“高考工厂”，学生每日 6:30 起至 22:50 上课，宿舍继续做题至凌晨，年均做题量高达 5,000 套。两校高考升学率均超 80%，衡水一本上线率达 93%，毛坦厂本科上线人数年超万，但伴随的是普遍睡眠剥夺、精神压抑、身体透支，甚至“坐到屁股出血”、服药维持免疫力。在中国“以升学为唯一目标”的应试体系正在将青少年培养为服从性极强、但情感麻木、思想僵死、身心受创的劳动力商品预备队，其本质是一种系统性的奴化灌输与阶级分化机制。在选拔性的教育体制下，只有一小撮学业竞争能手成功在他们的家庭支持下，实现了阶级的跃迁，完成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中国儒家士大夫的梦想。然而更多的学生却在学校竞争中失败，被大批大批投入到劳动力市场。（摘自《论中国修正主义教育目的与当作商品生产的学生》）

学校变得越来越像血汗工厂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反映了资产阶级学校的第二个性，那就是垄断资本家的劳动力商品生产基地。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学校里，教育活动不仅服从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而且服从于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学生从事资产阶级学业，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配合无止境的做题训练使自己的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而这些提高在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时就成为劳动力商品再生产的价值补偿。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学生个人的活动服务于他们的劳动

力商品的出卖和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从资本主义下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中修义务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的学习应该看作是一种对自己的劳动力商品的生产。注意，我们讨论的学习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作为雇佣奴隶沦为劳动力商品时的才表现出来的特殊的形式，而这恰恰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彻底丧失了生产资料，他们的子女也被迫成为了劳动奴隶的后备军，因而他们的学习就服务于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并且工资中也要包含劳动者提高劳动能力的这部分收入。

也就是说，学生的受教育的活动之所以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劳动力商品的劳动，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迫使无产阶级的劳动力沦为了商品。既然作为商品，也就有生产的过程，那么本来是学习科学知识的教育活动也就从属于资产阶级对劳动力商品的需要，学习本身也就沦为了雇佣奴隶的再生产过程和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从社会总体生产关系来看，学生不是直接的生产性劳动者，他们没有创造剩余价值；但从劳动力商品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教育体制下的学习活动属于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是一种间接的、为未来剩余价值生产从事的“准备劳动”。

事情已经明了，如今的学校不是什么提供普遍教育和上升机会的梦想之地，而是死气沉沉的集中营。与其说是栽培祖国未来花朵的温室，不如说是扼杀青少年进步思想、破坏青少年体魄心智的炼狱。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们除了系统性地灌输中国特色修正主义意识形态、以种种胡闹般的纪律规定驯化学生外，还大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资产阶级人性论、儒家奴化思想和实用主义唯心论等反动思想。我们清晰地看到，中修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学校不仅是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机器，而且是个规模巨大的训奴场。统治阶级组织起如此庞大的工程，不过是为了向资本家成批成次地输送懂得一定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听话奴才。中修资产阶级教育的全部体系，不过是垄断资本家的劳动力商品生产基地。

在这里，学生为分数等级制所统治，不分昼夜地为了高考这一终极目标而冲刺着。一切不符合考纲要求——或者说不符合资产阶级对劳动力需求——的知识都被束之高阁，一切敢于反抗学校规定的学生都被当作反面教员遭受当众的侮辱。

“生命可以轮回，高考只有一次”的标语高悬在教室，高三学子百日誓师的口

号在教学楼间回荡，一年又一年的考试季过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来了又去。可是低头看呐，那些本该稚嫩的脸庞如今面如死灰，本该在操场奔跑的双脚如铁铸般拴死在教室，本该畅谈理想抱负的嗓音却只能吐出教科书上空洞无物的词句。窗外是什么划过，人群为何聚集？那是学生从楼顶一跃而下，到此刻他还未从数不尽的噩梦里解脱。就是在黄泉之下，父母哭丧的声音与官僚警察封锁消息、以钱了事的景象交织着，让冤魂难以平息。这是可以接受的吗？这是可以容忍的吗？任谁去为中修应试教育体系辩护，都绝无可能无视这些沾满血泪的事实！

今天，就算统治阶级用一沓沓数据把自己的教育成就吹捧得天花乱坠，用一大批精心挑选和雕琢的“读书改变命运”的经历（如今甚至要靠造假才能找出这样的人）鼓吹应试教育的“公平”，触手可及的惨淡事实也会击碎他们的谎言。

二、中国学生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

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下，学生遭受着深入骨髓的压迫。沉重的压迫使得学生与工人一样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在压迫突出、阶级矛盾尖锐的地区，学生们早已开始了集会、静坐、游行示威、罢课等手段展开了自发斗争。一如五四运动和八九运动中的青年学生一样，当代的学生也一直走在中国革命队伍的前列，担负起了反修反专制的革命任务，发挥着先头部队的作用。并且，由于分数等级制度的全面统治与资产阶级教育本身作为雇佣奴隶的再生产工具，当代中国学生（特别是学生中直接来自无产者和作为半无产者的那部分）展现出了许多无产阶级身上拥有的顽强斗志和艰苦朴素的品格，这使今日中国学生的革命性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出了以往的知识青年，使之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正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迫使无产阶级的劳动力沦为商品，学生的受教育活动也就可以看作是对劳动力商品的劳动，学生也便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学生所从事的商品劳动力的生产是一种小生产活动。学

生既是自身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者，也是自身商品劳动力的占有者。学生的生产工具是他们用于从事学习和刷题训练的大脑和智力，他们由于各自的智力、教育资源不同、所投入的劳动时间不同，从而所掌握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训练程度不同，从而决定了各自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在进行市场交换时，那些所占有的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更高的学生，其就能够获得更有利市场竞争地位，相反，那些占有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更低的学生，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落败。因而与小生产的最终必然分化的规律一样，学生内部也孕育着阶级分化。

上层学生，即那些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以及那些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投机成功、能够实现阶级跃升的学生，未来他们终将成为新的资本家和工人贵族，实现资产阶级自身的再生产。这类人由于在教育资源或是某些才能上的优势而容易在应试中取胜，从而占据了分数等级制度中的上层，通过担任各项职务和撰写中国特色八股文锻炼着镇压和安抚被压迫者的本领，最终通过一次次的投机活动、学业竞争跻身资产阶级，成为中修政府中的技术官僚、资本家和企业中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人贵族。他们往往在学业竞争中树立起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世界观，相互仇视，相互打击，害怕自己“掉入底层”。他们害怕革命造成的“动荡”会危及他们的“前景”和安稳生活，敌视敢于反抗的学生，热衷于安抚那些心存不满但对统治者抱有幻想的学生。他们与学校、教师沆瀣一气，一同构成了学校的统治阶层。

下层学生，直接来自无产阶级和落魄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占据了学生中的大部分。他们或者是预备成为劳动力商品的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已经半劳动者化、半工人化的学生工人，而未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下层学生与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校中客观存在的阶级压迫加速了学生内部的分化。除一小撮“品学兼优”的未来“有前途”通过学业竞争成为资本家和工人贵族的学生备受学校百般优待外，中修学校毫不掩饰对绝大部分注定成为“雇佣奴隶”的学生（“商品化劳动力”）的吃人面目，通过军事化封闭式高压统治和特色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灌输教育建立思想上的绝对专制，从而最大限度地

学生变作升官发财的工具，同时对外界宣称自己是为了培养学生自律、鼓励学习，蒙骗了无数为投机梦想蛊惑的家长。在技校和专科院校，他们就彻底张开了血盆大口，把学生当作了自己的摇钱树。学校资本家以“实习”为名义，以结业证书作为筹码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批量输往工厂，从产业资本家那里抽取学生创造的巨额剩余价值。

中国的雇佣市场中有一个特别的存在叫学生工。学生工的狭义的范畴其实就是指中专、大专甚至本科院校将学校里的学生在毕业以前就输送到全国各地的工厂中集体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中专与技校向资本集中的地区，以不同形式向不同部门输送廉价学生劳动力数量和程度尤为突出，学校内的阶级矛盾也尤为尖锐。学校以扣押学生工毕业照等各种手段强迫他们出卖劳动力，美名其曰：社会实践，迫使这些学生只有参与了社会实践、取得了实习证明才能毕业。这些学校每年都要向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大规模的工厂输送学生劳动力，彻底暴露了学校这个劳动力商品大型工厂的本来面目。这种对学生工人的大规模劳务输送主要以各省的中专学生为主，往往在每年的应届毕业生的最后一个学期甚至最后一年将毕业生大规模输送到工厂实习。学生工人被输送到工厂、餐饮、服务业等地，学校又在背后与企业签订输送劳动力合同，学生工人在半年甚至一年内就强制性作为该企业的雇佣奴隶，为资本家创造可观的剩余价值，而他们却只能取得工资收入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工资则被学校无偿占有。在一个工厂中间，社会工人一个小时如果能拿 25 块的工价，学生工人只能拿社会工人的一半，甚至更低。据一些工人和中介透露，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有的学生工人甚至只能拿 7~8 块一小时的工价。经过多方打听和调查，学生工人的平均工资为 13~14 一小时。这些学生工人和社会工人从事同样的劳动，出卖得也是时长一致的劳动力，却只有社会工人的不足一半的工资。

在反抗压迫剥削的道路上，下层学生与工人阶级不谋而合，而且不能不走向联合。随着中国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发展，中修法西斯统治日益腐朽、中

国阶级固化日益加深，垄断资产阶级抓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和扩军备战，生产严重过剩造成的经济萧条，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学生劳动力商品价格竞争愈发加剧，越来越多的学生将来注定或已经被卷入到无产者的行列，马列毛主义的兴起……所有这些因素无不冲击着站在两大阶级中间的学生群体，迫使他们做出思想上、立场上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下层学生将马列毛主义当作了自己的信仰，从而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走向了一致的道路。而这些学生的大多数在未来会走向工厂，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因此，学生，特别是下层学生，是未来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后备军。我们须知：影响了今天的学生，就等于掌握了明天的工人。

三、革命学生斗争的方法论

如果说前两篇是有关学生革命的原理上的阐释，那么接下来的篇目将介绍学生革命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来自于诸多学生同志的经验总结，是当代学生革命实践的结晶。我们所要总结的这条路线究竟能否作为指导学生同志革命的普遍指南，还需在实践中检验和深化。总之，我将根据现有经验为学生革命斗争擘画一个尚不成熟的路线蓝图。

1. 革命组织是学生斗争的灵魂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列宁《进一步，退两步》

一如小生产者锤炼自己的手艺和打磨自己的商品，学生不断将劳动投入到待在未来十几年后为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他们埋头刷题，一遍遍温习考点，背诵公式，指望通过重复的机械劳动提高在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市场中实现交换价

值前，他们只能空抱着自身所有的劳动力商品，渴望在学业投机中获胜，而彼此间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相互敌视、从而愈发自私自利起来。这是小生产者的特质。

但与一般的小生产者还要不同的是，学生并不参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其主要的社会实践是学校的学习（即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他们虽然在精神上受着很大压迫，但经过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就借由父母的供养获得了从事学习的学习用具和维持生命等物质生活资料。这种依附父母的经济地位，使学生成为脱离物质生产和脱离工人阶级的寄生者，从而很容易地在意识形态上的诸多领域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

正因为经济上从事纯粹培养自身劳动力的、脱离物质资料生产实践的小生产式活动，学生在政治上也带有着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总体上，一切学生都为各自的学业投机而相互竞争着。而在局部上，学生常常自发地根据性别、地域、兴趣爱好和关系远近等共同的社会关系自发地形成一些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之间彼此隔绝，对于团体以外极自然地带有一种疏离感，并且在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冲突中，小团体往往为了个人的需求或彼此间的共同需求“挺身而出”，去捧场子、讨面子，颇有一番江湖义气。在小团体之间，也存在一些中间分子，也许是兴趣较为独特、性格较为孤僻，也许是在社会关系上与其他人没有共通之处，也许是相貌不出众，他们没能找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圈子。其中的一些人，由于成绩、相貌、体格、爱好、社交等方面的特质不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要求，遭到了同学的霸凌孤立。而在学校内，在这些方面占优势的学生则理所应当欺侮霸凌占弱势的同学。校园内部等级制的存在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

在这种充满个人主义的环境下，学生习惯于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不能够或者不能彻底地为集体利益和革命利益而让渡个人利益，抛却个人投机幻想。而在政治立场上，他们往往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倒向这边，有时倒向那边，取决于个人自发性。他们往往带有严重的政治幼稚病：要么压根是沉浸于个人安稳日子的政治冷淡主义者，对统治者的谎言半信半疑，对革命派和反革命的意见毫无兴趣；要么对于不同政治派别的意见稍感兴趣以至决定了自

己从属的派别，却也仅仅只是依照自己的兴致和偶发的感想决定自己所要付出的投入。

我们必须指出，只有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小资产阶级学生才有可能依靠组织纪律的约束和统一协调的行动克服自发性，培养自觉性。唯有以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够真正带领学生由脱离人民群众的状态转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观念，彻底地在无产阶级的阵营里站稳脚跟，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派。

同样必须指出的是，网络宣传运动的形势也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学生必须接受革命组织的领导。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趋腐朽没落、中修统治“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背景下，马列毛主义运动开始兴起。这个运动最开始是从网络上进行的。来自中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为着改变社会现实的共同目的，将他们所拥护的思想理论和自己所处的一方天地的信息汇集起来了。这些青年主要是脱产的学生，由于脱离劳动、脱离人民，他们不能够真正分辨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理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屈从于个人的局部的利益。

一方面，他们在群组内大搞调和主义，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如游蛇般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根本上矛盾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在许多时候，只是根据个人的喜恶、一时的感觉和毫无来由的证据判断其他人的“纯洁性”。在解决矛盾时，常常于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陷入争论，却在革命原则上、路线上的问题上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另一方面，各个群组之间为了自身在“网络左派”中的影响力互相倾轧，勾心斗角，连开盒造谣、人身攻击、刷屏轰炸之类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一些所谓的“左派领导人”热衷于骚扰女性，恬不知耻地要求女性必须与其他男成员保持距离，而允许自己单独与女成员“交流”。为显示自己也要走“革命融工”道路，他们逼迫未成年人辍学打工，把劳动报酬上交给这些领导人。这些渣滓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它能够败坏左派名声，对中修统治构不成威胁，才得到警察的放任。警察甚至会为其提供开盒技术以打击左派。中修警察自然乐于看到反对派自

乱阵脚，但对于我们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不扫清这些渣滓的恶劣影响，我们的革命事业就难以推进。而这项任务，只有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下才能够进行。

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呢？这个组织应当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领导，旗帜鲜明地反对安托西修势力。这个组织绝不是松散的小资沙龙，而是由革命者与觉悟工人学生组成的战斗队。这个组织应当不仅在线上富有影响，而且应当把他的干部从线上派往各个车间、各所学校、各处田地里从事宣传鼓动，组织被压迫阶级斗争，将马列毛主义与群众反抗运动结合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去争取各个革命组织的大联合。这个组织应当把传播正确的革命理论，对革命群众进行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教育当作自己的职责，并且把建立和运用政治报作为承担这种统一思想、组织建设的职责的总构造。这个组织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并且善于利用这个武器反对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反对个人独裁和绝对民主主义。

在这些要求之中，从根本上区分革命组织与机会主义组织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愿意与工农群众结合。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子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这个理论在当代的诠释就是革命融工路线，那就是把马列毛主义者派到工人阶级中间去，去向他们灌输马列毛主义理论，使革命因素在工人阶级中间集中起来、巩固起来，逐渐地建立起工人革命团体，实现马列毛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最终完成中国新的共产党的建立。把这个理论当作“照妖镜”，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当今马列毛主义运动中涌现出了两派人，一派坚定拥护革命融工路线，一派不接受，或者为了散布自身影响力而进行修正主义式的融工。什么叫做修正主义式的融工呢？就是不分政治立场、不以建立工人革命团体为目的进行的“融工”，他们到工人中去，也把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带到了工人中。而最为反动卑劣的“融工”路线当属内网左圈融工，如新青年，他们强迫未成年人辍学打工，又私吞劳动所得，害人不少。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革命的学生必须遵从马列毛主义革命组织的领导，同修正主义团体划清界限；接受政治上组织上的教育，学习革命理论，从事宣传鼓动，建立革命学生小组，自觉同劳动人民紧密联合，并最终走向革命融工。

2. 从革命学生小组到融工建党

我们将革命学生小组视作革命组织在各地的“党支部”。它担负着宣传马列毛主义、组织革命学生学习理论和准备革命斗争、提高群众政治觉悟、领导被压迫学生和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职责。

①组建革命学生小组的准备工作

许多学生同志一旦脱离了线上，就孤立无援起来，往往由于左倾冒进破坏了群众基础，使一些激进分子遭到了群众的一致敌视，或者没有勇气并且缺乏对群众进行政治灌输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何谈建立革命小组？

那要如何组建革命学生小组呢？我们每到一处地方，首先要做的就是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民生习俗。放到革命工作里讲，就是对当地人民群众的斗争情况、生产状况、政治觉悟程度进行调查，以此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切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就是组建革命学生小组的准备工作——调查。> 毛主席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是这样。”

为了对学生的先进部分和落后部分进行划分，从而确定主要工作对象，我们就要去调查同学、教师和周围群众的政治面目，判断出其中的左、中、右来。这要求我们去迅速地融入到群众中去，广交朋友，结识各界人士。一些同志习惯于线上大谈革命，但是在线下真正与群众接触时，要么是出于“安全考量”局限在自己的

熟人圈、几个知心朋友或者干脆孤立自守，要么受小资产阶级革命热情驱使进行自发宣传，满口“中修”“文革”“六四”。他们根本不做调查，前者原地踏步，后者凭着冒进摸索来的感性材料直接开始宣传鼓动，这都是机会主义的工作方式，最后结果只有脱离群众走向灭亡。

要改变与群众脱离的情况，就必须沉下心来调查群众。学生同志时间往往不充裕，而我们的调查任务又是艰巨而漫长的。该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彻底地调动起主观积极性，以灵活多变地形式去与群众接触。在学校里，我们要把一切零碎的时间，包括下课、大课间、午休、晚辅、熄灯后，与不同学生交流。我们应当关注有哪些学生明确反对变革、安于现状，哪些学生麻木不仁、任人宰割，哪些学生对政治历史极为敏感、受到家庭和学校深重压迫、对当局表示不满。我们要与最为进步、最为积极的学生建立起巩固的联系，通过单独谈话和提供革命资料的方式灌输马列毛主义思想，促进其做出思想转变。对于明确的右派分子，我们要有所提防，与其保持一种迂回游击的态势，不去主动招惹他们，在必要时对他们做出打击（如污蔑毛主席、吹捧中修太平盛世、歧视劳动人民、发表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对于广大的中间派分子，我们要在其中树立起进步、正直、勤劳、热情的形象，通过日常的帮助和在群众遭受压迫时挺身而出获取群众的信任，树立自己的威信。有的时候，学生同志不得不通过游戏、动漫等小资话题来与群众建立联系。这种方式作为群众工作的手段是可行的，能够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但我们决不能将小资话题上的积极性同革命觉悟混为一谈，进而吹捧依靠小资娱乐来作为团结群众的主要方式，否则就要破坏革命工作的严肃性，不利于群众组织性和自觉性的提高，还使一些学生同志自己也开始沉迷于小资娱乐。拉近距离是必要的，但紧随其后的就是政治教育，这才是群众工作的核心目标。

在对周围群众的把握已经到了在脑海中想到某个人时，能够描摹出对方的政治画像之后（对方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交流中特别引起对方注意的是什么，时常散播的言论是什么），我们就来着手做左、中、右的划分。

我们有了这个划分后，就要根据划分来工作。坚定不移地依靠左派，团结和教

育中派，防备和适时地斗争右派。这就是学生群众工作的总方针接着，我们按照这个方针，就要去扩大左派力量。这就需要我们去宣传鼓动和组织建设。

②革命学生小组的建设方针

学生同志在做宣传鼓动工作和日后的一切革命工作时，都不要忘记全中国笼罩在法西斯白色恐怖的背景。地下工作必须是长期的而且需要巩固的主要工作，公开的工作则应当在合法和半合法的面目掩盖下进行。在调查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格外进步的群众，但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当前所处的环境是必须合法的还是可容许非法的。在同学聚集时，我们要注意观察是左派群众居多还是中间派居多，抑或是存在明显破坏意图的右派分子，我们就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辞，只以讲述生活、谈论时政的方式旁敲侧击地进行鼓动，激起一般群众对当局的不满；在单独谈话时，我们就可以用马列毛主义理论剖析一些社会现象，解释文革、改开、八九六四、修正主义等概念；而等到进步群众已经能够明确认识到中修的反动本质，意识到改革开放这一资本主义复辟代名词的本质后，我们就可以将其转移到线上匿名平台，为其提供革命资料，在那里接受马列毛主义政治和组织知识的系统学习。

等到左派力量渐渐壮大，有至少三人的学生已经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后，我们就要着手把学生同志组织起来。也许团结成一个小组尚需一个契机，也许在调查和宣传鼓动过程中已经结成了小团体，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去自己创造和把握机会。今后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是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以主人公的身份去推动世界的发展的，任何革命者都不能忘记这一点。接下来可以先私下进行一定的集中学习和讨论，使革命学生提高到具备一定的组织性，然后再将他们聚集起来宣布成立革命小组。有的学生同志可能不明白组织的意义，那么我们作为当地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就有义务去耐心解释组织的必要性，就要向他们指出：学生在长期脱离生产实践、从事自身劳动力商品的小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由于脱离劳动群众，学生易于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灌输，并且在网络上或多或少沾染了反动

思想和习气。这两个特征要求我们必须先在先锋队理论指导下，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和纪律去约束学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造其小资产阶级面目，彻底批判、打倒心中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动思想和习气，才能真正使学生由从各种幼稚病的患者转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这些任务，只有革命小组才能够办到。在革命小组中，学生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集中学习革命理论，共同批判反动思想，协作进行宣传鼓动和集体领导阶级斗争。这种组织办法，就把原本分散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了，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力量变为了原来的数倍，使得原来涣散无力、精神脆弱的学生也有了同当地反动派斗争的力量。

总的来说，革命小组的建立在整个帝国主义时代都是必需的，它往往是一地革命运动的开端。学生小组有诸多好处，一些同志或许要经过一番实践的教训才能明白，但诸位学生同志终究是要组建起这样的小组来的。

一个学生小组的任务应当包括组织理论学习、政治教育、宣传鼓动，领导群众斗争等。要想出色地完成这些工作，就不能不依靠制度。

学生小组的第一个制度应当是学习会。由领导同志自身主持集中学习研讨会，并且说服其他同志也来参加。由于集中学习的需要，学生不得不在时间安排上以纪律约束自己，进而培养自觉性。而由于不遵守纪律就会损害共同利益，学生渐渐地建立起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思想。接着，随着其他同志理论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领导同志需要鼓励其他同志轮流主持学习会。这一做法不单能够提高个人的宣讲能力和理论水平，而且连带着整体的宣讲动员能力和理论熟习程度都提升了。在集中讨论中，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暴露出来，从而得到了批判改进的机会。有的学生同志苦于在校时间过于紧凑、而假期太过短暂，难以组织起学习会。怎么办呢？那就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把这些零散的时间集中起来。在学习会开始前，主持人就敲定学习会课题并提前准备讲稿，又要求和督促听讲同志提前阅读指定材料。当学习会开展时，就可以直接进入讨论环节。有的学生同志的宣讲水平不够，那小组的领导同志就有义务去帮他延展话题、扩宽思路、抛出问题和解答，并且带动其他同志效仿，使学习会真正活跃起

来。

有的学生同志认为，如果学习会由于成员积极性不够而难以开展下去，就不需要办了。这是错误的。事实证明，一个革命学生小组在组织上的真正建立、在思想上的真正统一，往往是从学习会的举办开始的。这就是说，任何一个革命学生，想要组建革命小组，就要去办学习会。为着在紧凑的学校作息中挤出理论学习时间，除学习会之外，学生小组要举办自学会。这个自学会可能由于学习会已经占用了仅有的一点能够聚集的时间，不能够开展起来。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要求学生同志去自主学习，定期汇报理论学习进度，或者鼓励学生去参加线上革命组织的授课活动。

学习会、自学会，是根据改造世界观、提高阶级觉悟的目的进行的。通过学习会，我们已经把学生组织起来了。那么接下来就应当把学生分散的斗争活动统辖起来。

各个学生所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应当由学生小组统一领导。学生小组要建立一个任务条。这个任务条要写什么呢？它应当记录下每个宣传对象的思想转变进度，并根据这个进度去指示宣传员下一步的工作。每个宣传员心中对于各个宣传对象的“进度”要有所把握，根据对方的阶级立场、家庭背景、生活经历等等决定如何进行宣传工作。小组还应经常进行政治鼓动，揭露中修政府的罪恶，戳破统治者的谎言。宣传、鼓动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去进行。拿鼓动来讲，学校发生了跳楼事件，企业拖欠工人工资，政府强征土地、以“维稳名义”欺压人民，官员贪污腐败，富家子弟穷奢极欲、挥霍钱财，这些事件需要我们经过政治加工、而非纯粹地扩散才可以用于鼓动。鼓动不是去要求群众与中修斗争，而是通过这些现象向群众传达某个事实：“人民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中国劳资矛盾极为严重”“底层人民生活困苦”等等。群众清楚这个事实后，他们在思想上的逐渐转变，就终会于行动上体现。当群众迫切要求斗争时，我们就应当着手领导群众和布置斗争。对于那些已经持有无产阶级立场的进步学生，我们就要运用宣传的办法。宣传要借助一定的现实材料来传授某些观点。比方说，当代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严重，

就可以借此去揭示资产阶级社会下人口过剩的原因，进而去揭示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资本有机构成和无机构成的矛盾、技术进步为什么造成了工人失业等这样一些观点。等到宣传鼓动工作有所进展后，我们就可以将组织因素引入到政治灌输中。我们可以邀请觉悟学生参与小组举办的学习讨论活动，鼓励他们进行理论学习并且向小组同志汇报，而小组又要在一定的时间里对这些新同志的思想和理论的问题做解答。另一方面，小组同志又可以在公开鼓动中互相配合，针对觉悟同志进行灌输，鼓励他去同反对派辩论。这样就把个人单独宣传与组织协作结合起来了，并使后者逐渐地代替前者的重要地位。这样，觉悟学生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小组的一员。而最终我们要在恰当的时机将他们纳入到学生小组，促成质变。

除此以外，革命学生小组要定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并最终使其成为一种习惯，照见组织和个人的现期工作状况，以图做出主动改进。学生同志要牢记：应当奋不顾身，一刻也不停歇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一刻也不停歇批判揭露中修政府，一刻也不停歇斗争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各种反动思想的侵蚀。

还应号召学生同志们都去做调研，深入城镇工业园、商业区和农村地区，走访民情，观察和亲身参加生产劳动。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有利于调查我国工农情况、生产力发展状况，便于估计我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对于学生小组来说，不但可以在协作调查中巩固小组成员间的联系，提高革命积极性，也能够加深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坚定阶级立场将理论联系于实际，磨练胆量和与群众沟通的本领，为日后更加深入的发动群众斗争做准备。

③领导阶级斗争和为革命融工做准备

问题是工人群众已经因俄国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而非常激动，但我们却不善于把人民激愤之情的一切水滴和细流汇集起来——假使可以这样讲的话——和集中起来；这些水滴和细流是被俄国的实际生活压榨出来的，其数量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我们正应当把它们汇集成一股巨流。——《怎么办》

军警镇压群众和平抗议、政府和法院毫无作为、虚假的“民族复兴”与“共同富裕”口号、医保社保欠妥、工人遭受失业欠薪、舆论封控管制……一切这些现象、一切这些人民生活日益恶化的现实，都深深地激起群众的不满。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不满汇聚起来，使其真正变成能够摧毁中修统治的巨流。

一方面，我们要把一切首创精神和革命毅力投入到群众反抗运动中。在群众需求增长时，就去发动他们进行反抗斗争；在群众运动爆发时，我们要坚定地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承担起突击队和领导骨干的任务，说服群众接受马列毛主义路线的领导。同时我们要擅长根据群众的需要制定斗争策略。比如说，在工人讨薪运动中，群众还不能够接受罢工口号时，我们就尽力进行合法斗争，当群众意识到合法斗争只会遭到资方敷衍后，我们就大力鼓动工人进行罢工；比如说，当学生跳楼后，我们就去向群众揭露学生受到学校和家庭怎样巨大的压迫才终于不堪重负，学校官僚又如何勾结警察封锁消息和镇压受害者家长，当代学生是如何陷入到这种精神空虚、意志消沉的地步，学生与受害者家长、被堵嘴的教师在哪方面共同遭受压迫，又在哪方面彼此存在矛盾，最终如何走向联合。

另一方面，我们要使群众逐渐意识到：原来多年来，造成工人欠薪、家庭破产，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百般欺侮人民的是同一批人——资产阶级。并且，由于我国“特色”的国情，中修官僚垄断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绝对权利拱卫其对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垄断，从而保障其占有中国社会近乎全部剩余劳动以攫取百万亿

数目的利润，所有贪官污吏、大小资本家和独裁统治者统统都是一丘之貉。只有全中国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万恶的中修政府。

再从中国革命的整体进程看，革命学生小组必须要为革命融工做准备。中国马列毛主义运动的突出特点是脱离群众，而工人反抗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缺乏正确理论路线的领导。一边是大批工人群众已经自发开展起了经济斗争，工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一边是大量马列毛主义者沉迷网斗和小资沙龙游戏，革命工作流于自发性。可以看见，一如 1902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的情况，群众的自发高潮超过了社会主义运动的自觉因素。群众运动愈是迅猛发展，就愈对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的自觉性表现出巨大的无比增长的要求。

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势，要求革命者集中进行革命融工，在工人中间传播马列毛主义理论，灌输阶级意识，组建工人革命团体。最终在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的基础上，完成再缔造共产党的伟业。

对于革命学生小组来说，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扩充革命理论武备，尽可能地批判各种修正主义思潮，尽可能地联系工农群众，尽可能地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尽可能地为工人运动训练革命干部。我们要紧密联系革命组织，服从组织安排，接受组织指示，在线上 and 线下的组织活动中进行政治上组织上的融工准备。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春代表的性格。”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和他们变成一体，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

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最后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去同中修统治者做殊死的斗争！

中修社会帝国主义这头腐朽恶臭的庞大野兽，终将在整天动地的人民革命中流尽鲜血，彻底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让我们去迎接中国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吧！

理论辨析

革命队伍内部思想斗争经验的简单总结

烛火

前言

本文的灵感来源是一本名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的书，此书由秦毅于 1952 年编著，介绍了新中国改造小资产阶级的一些经验、方法和范例，对于改造当今中国革命者的小资产阶级落后习气也具有不错的参考价值。

此书虽然涵盖了思想改造的诸多问题，但笔者认为其在某些问题上的内容丰富性和理论深刻性不足，因此笔者结合了个人经验写成此文，主要谈谈**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如何进行思想斗争的问题，希望能在思想斗争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问题上进行一些补充。以后或许会继续更新该主题的文章。由于个人经验和理论水平有限，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本文的不足之处。

1. 为什么要有思想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思想是带有深深的阶级的烙印的，所谓“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即使是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中，就算革命者已经或多或少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由于革命者都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社会舆论、人际关系中耳濡目染，这些客观矛盾就必然反映在革命者的头脑中，具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落后思想——哪怕是原本就出身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也不会例外。有的同志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可

能占到七成，有的同志可能占到五成，有的同志甚至可能只有两三成。**如果不去主动地指出和斗争同志头脑中的错误思想，让同志自觉地意识到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在顺从自发性，让这些同志不自觉地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俘虏，客观上就是在害这些同志。**

而且，这些同志在参加了革命组织后，就会把头脑中无论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思想**连带着一起**带到革命组织中（尽管他们往往不是故意的）。如果不去对错误思想进行原则性的、不调和和不妥协的斗争，组织内的错误思想就会慢慢积少成多，且必然反映到组织的具体工作中。没有科学思想的指导，没有思想上的正确、先进、坚决和统一，就必然产生工作上的困难乃至整个组织的混乱。

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导致革命组织的领导权被投机分子夺取，使整个组织逐渐走向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从而无法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随着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垄断阶段，大量小资产阶级破产、地位滑落，连带着他们的落后思想一起加入了党，而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对于党内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采取了妥协纵容的态度。与之相反的是，从 1942 年开始，毛泽东同志等人在延安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清算了原有的错误路线，才保证了党和中国革命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可见，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夺取思想阵地，那么资产阶级就要夺取它。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革命组织内的思想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必须要主动去解决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革命组织的极其重要的工作，任何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自觉地提高自己和其他同志的思想政治水平，将这一工作视为自己的义务。

2. 思想斗争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

我们的同志可能知道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帽子”，可以用在犯了不同类型错误的人的身上。但是，仅仅知道“扣帽子”这种一般性的定性方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也就决定了人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的思想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在解决不同人的思想问题时，就必须要坚持进行耐心仔细的调查研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望闻问切、对症下药”，而不是简单地扣个抽象的“帽子”就结束了。

就拿如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关系举例：有人对父母的情感非常深厚，有人对父母无所谓，有的人则对父母恨之入骨（质）；即使是同样爱/恨着父母的人们，爱/恨的程度很可能又不一样（量）；有人最深爱父母，有人最深爱兄弟姐妹，有人最深爱爷爷奶奶；有人渴望未来成立自己的新家庭，有人抗拒成立新家庭……以上列了那么多种情况，甚至还只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已。即使是同一个现象，也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原因产生。例如，有人恨父母，既可能是因为他/她的父母确实是反动的混蛋，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她本身是不懂感恩的寄生虫……

以上可以看出，哪怕我们仅仅是讨论家庭关系这一个方面，情况就已经千变万化了，更何况人的社会关系远不止家庭关系。可想而知，人的思想和思想斗争能有多么复杂。

思想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思想改造具有长期性，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实践中，经常可以发现，哪怕我们已经在理论上比较彻底地批判过某一个同志的思想错误了，该同志也确实做了反省了，短时间内也确实有了一些明显的进步了，但是该同志的思想错误仍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存在着、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有可能重新犯严重错误。这种现象是常见的，是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在人的头脑中的体现。谁要是妄想不走任何弯路，不经过任何曲折，就能一刻不停地、直接地、

一次性地改造好任何一个人的错误思想，就必然要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这要求我们每一位立志于改造同志落后思想、改造人类社会的革命者，除了要拥有坚定的立场和丰富的经验外，更要有极大的耐心，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当然，我们也要反对个别落后同志以“思想改造具有长期性”为借口而停滞不前乃至开倒车的倾向。其他同志的思想斗争仅能起到外部的帮助作用，如果一个人内因实在太差，自身没有任何改造的意愿，即使其他同志给了再多的帮助，也无法使得此人取得进步的。

3. 分清两类矛盾

本文所谈的思想斗争，主要是指同志内部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斗争，而不是敌我矛盾性质的思想斗争。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不管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当成敌我矛盾，还是把敌我矛盾错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在实践中都会遭到十分惨痛的后果。那么，我们就需要区分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

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当今中国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与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与国外垄断资产阶级共同残酷剥削着中国劳动人民乃至其他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他们都是劳动人民的死敌。只有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在当今，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尚处于不觉悟的状态，即使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也尚未自觉认识到必须要推翻修正主义政权、重建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在当今，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就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就必须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要牢记“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一点）。

同时，理论和实践都早已证明，“安、托、西、修”（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在革命运动内部起到非常恶劣的破坏作用，阻碍着劳动人民的解放，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起到了帮凶的作用，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反对的敌人，我们与它们之间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而绝非人民内部矛盾。

这里尤其需要注意，我们说“安、托、西、修”是敌人，指的是在思想上必须与“安、托、西、修”的思想体系划清界限，在政治上要坚决地与其斗争，而不是说对于任何或多或少持有“安、托、西、修”观点的人，都统统不加具体分析地一刀切，全部划成敌人。这是因为，一个人持有错误的观点，完全可能是主要由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而**不一定**就是由阶级立场导致的。读者同志们自己可以想想，毛泽东同志早年甚至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哪个革命者又敢说自已向来就是一个100%的马克思者，而在思想上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呢？自己或其他同志左转前，是否多多少少也会相信“安、托、西、修”之类的错误观点呢？难道我们可以不去尽可能地说服教育，就把持有错误意见的人直接打成敌人么？这难道不是不愿意做耐心艰苦的教育工作，反而把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到革命的对立面、给资产阶

级反动派们帮了大忙么？

笔者认为，如今中国左派“派斗”（当然，有些人是假左派）严重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有些同志不愿意仔细地进行调查研究，也不愿意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能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别，而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导致了革命力量的内耗。

4. 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们在斗争同志的错误思想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务必、务必、务必**采取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这首先是世界观上的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方法论问题。

从整个中国革命队伍的角度看，大多数同志是真诚地想要解放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谁否认这一点，谁就是不相信同志乃至不相信群众（我们不否认革命队伍中有少数投机分子的存在，但毕竟是少数）。只要我们真诚地出于团结的目的，运用恰当的批评方法，努力扩大他们的积极方面，大多数同志是能够认识到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的，而不像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反动的阶级利益会死不悔改，会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能够适用的基础。

对于这些暂时犯错误的同志，我们必须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¹我们批评犯错误的同志，是为了救人、为了挽救革命力量，而不是为了杀人、为了损害革命力量，那么，批评的同志**在主观上就必须是出于团结和帮助同志的目的，而绝对不能是出于发泄情绪之类的维护个人利益的目的**，否则批评教育就必然演变成残酷打击，就不可能实现团结；同时，也只有通过批评和斗争，才能改正同志的错误思想，我们才有可能和原先犯错的同志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如果对犯错的同志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分歧只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分裂，

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也不可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在批评和斗争时，务必要逻辑清晰、有理有据，讲清楚为什么说某个同志是犯了错误，这一错误有什么具体危害，应当怎么改正，而不能只是扣个大“帽子”就完事了。否则被批评的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为什么是犯错了，就不可能真正改正问题，就实现不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这里，还需要批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个常见的错误世界观：觉得自己读了几本马列毛的书籍，脑子里有了点革命知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高人一等，只要其他同志不能理解我说的话、或者是不掌握我所掌握的知识，那就说明其他同志都很“蠢”，因此开始“批评”其他同志，卖弄自己的“学问”。这些可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不明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也不明白“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更不明白对于革命者来说，知识是改造世界的武器、是帮助同志进步的工具，而不是个人炫耀的资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自身的傲慢而做的这种“批评”，也不属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此外，还有极少数人根本没有把同志当作同志来看待，他们出于自己的某些私人利益（比如维护个人形象、泄愤等），用粗暴冷漠的态度对待其他同志，把革命战友当成可以随时抛弃的工具来对待。世界观根本不同，就必然导致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根本不同，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中就会导致“治病救人”与“打击整人”之分。因此，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当其他同志出现思想问题或犯了错误，个别人就立马打着“批评”“为了革命”“为了组织”的光鲜亮丽的旗号，行残酷打击之实，他们首先思考的不是怎么去说服教育、怎么去解决同志的问题，而是首先思考怎么解决出问题的同志，甚至使用行政压服、造谣诽谤等恶劣手段。

这种残酷打击的做法，由于披着一层马克思主义的皮囊，从而非常具有迷惑性，使得很多缺乏理论和经验、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朴素向往的年轻同志受到毒害，使得原本就受到资本主义社会迫害、迫切地想要找到出路的他们丧失对革命的憧憬和希望，把原本可以争取的革命力量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去，给资产阶级老爷们帮了大忙。不管这些搞残酷打击的人主观上是否故意、是否“问心无愧”，他们造成的客观影响都是非常恶劣的。一切革命的共产主义者，都有义务起来揭露和反对这

种做法！

但是，也有一些人面对同志的批评时，打着“言论自由”“反对官僚主义”的光鲜亮丽的旗号，却忽视客观事实，抓住别人犯的小错误不放，却对自己犯下的更大的错误避而不谈；或者是前后逻辑不一致，连观点自治都做不到；或者是无视他人的批评，只顾着自说自话。这些人实质上是在抗拒合理的批评意见、抗拒改造自己的落后方面。对于这类言行，我们也应当进行无情的揭露批判。

5. 发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有约五十年了，资本主义的各种腐朽现象早已渗透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毛孔中。如今的绝大多数人们都生活在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相竞争、互相猜忌的私有制环境中，很多人难以想象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怎样的；很多人也意识不到，“同志”这个看似普通的词汇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感情。

大家可以回顾社会主义中国时期的历史，想想雷锋、焦裕禄、张钦礼等同志的例子（在自私而又狭隘的“人性论”者看来，这些人要么不可能存在，要么是在作秀），这些同志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诞生的践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榜样。在不久的中国革命中，也必然会有更多的同志在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成为比雷锋、焦裕禄、张钦礼等同志更出色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者。

既然我们都处在革命的队伍中，为了同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共同努力着，就像是战友一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也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标的，那么，同志之间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互相关爱呢？同志之间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互相帮助，互相督促改正彼此的落后思想，把同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呢？学习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进行思想斗争、改造自己或他人的落后思想时，我们就不是孤身一人，而是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了。

6. 原则坚定，策略灵活

在思想斗争时，除了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正确的理论、毫不含糊的原则，还要重视斗争的策略问题。在现实的斗争中，显然并不是只要提出了正确的观点，我们就能直接赢得胜利了——不然世界革命应该在马克思的时代就成功了。

例如，在一个革命组织内，同志间的意见分歧是经常性地存在的。一个同志的正确意见，很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暂时地无法被其他人接受。为了打击错误意见、在整个组织内推行正确意见的同时又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同志，就必须对不同情况的同志采取不同的、灵活的说服策略，要善于为了整体的革命利益进行恰当的妥协。伟大的革命导师们都是非常重视斗争的策略问题的，我们以马克思和毛泽东同志的故事为例。

第一国际刚刚成立时，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都很低，国际的人员成分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工联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民主主义者，等等。因此在制订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时，各方的意见差异非常大。马克思认为，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又要考虑到各国工人运动水平参差不齐、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实际状况，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马克思在 1864 年 11 月 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最终，在纲领和章程中，马克思并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共产党”等明确的字眼，也没有直接驳斥各流派的错误观点，而是通过总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成就，从正面阐述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道理，巧妙而又透彻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贯穿了进去。最终，由马克思制订的纲领和章程在第一国际中顺利通过。

长征期间，二渡赤水之后，红军仍被蒋匪集团包围在遵义一带。为了打破僵局，林彪等人提议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1935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

苟坝召开了 20 多人参加的会议（苟坝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会上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进攻，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分析形势后认为这是为小利益冒大风险，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最后会上表决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当天深夜，毛泽东同志独自找到周恩来，再次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成功说服了周恩来。经过一番周折，才说服了其他人，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在此期间红军得到情报，大量敌军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可以想象，即使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同志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不采取更加灵活的斗争策略，如果马克思坚持要直白地驳斥其他流派的错误，如果毛泽东同志一定坚持要在组织会议上说服绝大多数犯错的人，那么，在国际共运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第一国际或许就会胎死腹中，本来就已经十分弱小的中国红军或许会再次遭受重创。由此可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灵活运用策略是多么重要。

再次提醒，本文所谈的思想斗争，主要是指同志内部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斗争，而不是敌我矛盾性质的思想斗争。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不能将适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生搬硬套用于解决敌我矛盾。

以及，现实的政治斗争是残酷和复杂的，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况之间是有差距的，是要考虑革命的“功利”的，有时候为了更重要的革命利益，不得不牺牲掉其他次要的革命利益。例如，在一个对外公开的革命群聊中，有极少数群众虽然也同情和支持革命，但也确实相当落后，经常散布落后言论和错误理论，已经普遍引起了其他群众的不满，且经过多次批评教育后仍然屡教不改。而当前中国的革命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同志们都有很多革命工作要处理，显然不能总是在这极少数的落后群众中花费过多时间。那么，即使此人还勉强算是群众，双方矛盾还尚未发展到敌我矛盾的程度，但是为了维护整个群聊的讨论氛围、为了安抚其他群众、为了节省同志们的精力以便将“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可能就不得不暂时放弃这极少数的落后群众，做出踢出群聊之类的处理。这是充分考虑到客观条件后的无奈选择。当然，这不代表我们不应该为了达到理想状态而竭尽所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

们仍应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帮助和争取工作。

7.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没有调查，就请同志不要做论断，要么去亲自调查，要么去虚心请教他人。有的同志可能会认为，调查只是适用于社会经济研究之类的场合，但实际上“先调查后发言”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基础，不调查，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矛盾。在思想斗争的领域，不去调查，就无法掌握同志的思想的真实状况、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分别是什么，思想变化发展的历史是怎样的、是在怎样的内外因的作用下形成的，思想变化的当前趋势是怎样的，等等。如果我们不去对同志的思想状况进行仔细的、全面的、耐心的调查，而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愿望进行判断：“俺寻思同志是因为某某原因产生了某某思想”，就必然导致唯心的盲动主义，只会胡扯一番甚至是扣帽子，而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例如，在网络群聊中，有时会围绕某个话题展开非常激烈的讨论，短时间内能有几百条消息。有些同志由于没有仔细地查看消息，不去对该话题讨论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不去考虑具体的场合，不去考虑不同人的概念理解或语言习惯的差异，眼中只看到了某个人说的某句话“有问题”，就立马开始断章取义，指责某某同志“有问题”。结果争论了半天，才发现对方实际表达的意思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发生了偏离。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犯了没有仔细调查的主观主义错误。由此产生的误会，不但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对于那些被莫名其妙扣帽子的同志也是很不公平的，很可能会打击他们以后继续发表意见的积极性，是在破坏民主关系。

例如，当听到关于某个同志或某个组织的传言后，有的人不去调查研究、不去多方考证，不明白“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也不具备相应的分析辨别能力，就盲目相信了这种道听途说来的消息。但是，此类传言完全可能是在断章取义，甚至是完全虚假的。听信谣言的人的主观认识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就必然在未来的

实践中犯错误。

例如，当看见其他人有某一类型的问题后，有的同志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却不明白矛盾的复杂性、特殊性，不明白个人经验的狭隘性，就直接以个人经验为基础进行生搬硬套，而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果就不能揭示其他人有某一问题的真正原因，不能理解这个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就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

调查的项目可以有很多。例如，在认为某位同志犯错误后：这位同志的言行具体是怎样的？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做出来的？认为这位同志犯错误的根据是什么，是道听途说来的，还是仔细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这位同志本人是如何解释他的言行的？在面对不同的批评时是怎么想的？曾经有没有犯过同一类型的错误？本人的解释和客观事实之间有无矛盾，能否实现逻辑自治？做出这些言行时的心理状态、思想逻辑是怎样的？这种心理状态、思想逻辑是怎么产生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因为什么事件而萌芽的？有无改正问题的主观意愿和实际行动？等等。

在思想斗争中，调查往往是困难的。首先，一个人可能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思想是怎样的，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思维逻辑，更别说其他人了；其次，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人可能不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人就需要通过观察和分析其具体表现，推测此人的思想到底是什么（而且推测不一定准）；再者，调查与自己思想不同的人的思想，也很考验调查者的细心和耐心；最后，在双方的信任关系不足的情况下，还要避免把这种思想调查变成居高临下的“审问”。

在一个革命组织中，如果同志间能够做到毫不隐瞒、赤诚相待、不怕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是能够大大有利于调查、有利于我们掌握同志的思想状况、有利于解决思想问题的。但这是以同志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和信任关系、组织内的良好民主关系为前提的，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精心呵护才能实现的，是不能急功近利强求的；这也需要同志个人有着自我改造的意愿，有着为了革命利益不怕暴露落后思想的大无畏精神。

每位同志在进行思想斗争时，都务必问问自己：我是出于团结的目的、改正同

志错误的目的做的批评呢，还是出于发泄情绪等维护私人利益的目的而做的批评呢？我在批评的时候，是尽可能地做了调查研究呢，还是主观主义地乱说一通呢？

8. 如何对待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革命者和革命组织克服自身错误的极端重要的武器。一个革命组织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是衡量其“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¹，是证明一个组织到底是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²。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就有记录中国红军内部进行批评的相关情况：

.....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也许是分别用来进行表扬和批评的红栏和黑栏了。

“表扬”的内容是称赞个人或集体的勇气、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里，同志们互相进行严厉的批评，并批评他们的军官（指名道姓的），例如说没有把步枪擦干净，学习马虎，丢掉一颗手榴弹或一把刺刀，值勤时抽烟，“政治落后”，“个人主义”，“反动习气”，等等。在有一个黑栏上，我看到一个炊事员因把小米煮得“半生不熟”而受到批评；在另一个黑栏里，一位炊事员揭发一个人“老是抱怨”他烧的饭不好吃。

我们先谈谈自我批评的问题。

只要犯了错误，就应当做自我批评。如果是犯了比较大的错误，就更应当做出正式且规范的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不是随便做的，是有具体的方法的。有些同志在做自我批评时，大体上是这么说的：“我在某月某日做了某件事，这件事是犯了某某主义的错误，向其他同志和组织道歉，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¹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²同上。

同志们，这根本就不叫自我批评。**这是在敷衍，是在描述现象而不是解决问题，就像是违反了资本主义学校的反动纪律后不情不愿地写检讨书一样——但是，难道一个革命者或一个革命组织也应当以这样的敷衍态度对待自己在革命中犯下的错误么？**

一个正式的、优秀的自我批评，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 做了什么事情，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2) 这些事情造成的客观影响是什么，为什么说这是在犯错误，为什么说不利于革命；(3) 是在什么样的错误思想的支配下犯错的，犯错时具体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4) 这样的错误思想可能是怎么产生的；(5) 以后要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改正；(6) 如果伤害了其他人，应对受到伤害的他人进行道歉，等等。

一个正式的、优秀的自我批评，**不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 只罗列现象，只口头承认犯错误，只口头道歉，而不具体分析为什么对革命不利、为什么说是犯了错误；(2) 只有空泛的“某某主义”之类的大帽子，而回避谈论犯错时具体的思想状态；(3) 把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于他人或环境，试图推卸自己的个人责任，等等。

如果我们不慎重、仔细地分析到底犯下了哪些错误，犯错误的原因又是什么，并通过语言文字用清晰的逻辑表达出来，又怎么能表明我们已经认真地反思了我们犯下的错误，并准备在实践中清算这种错误呢？如果我们把犯错误的原因推卸给其他人或环境（外因），而不去从自身的思想中找问题（内因），我们又怎么可能进步哪怕一点点呢？如果我们以敷衍的态度对待自己犯下的错误，又该怎样改进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怎样在我们的同志和群众中建立信任关系、怎样在一个革命组织中起到表率作用呢？

有的同志觉得，做自我批评会很丢脸，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他人会很痛苦。那么这里就部分引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一段内容：

在过去历史上，在现在一切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当权政党员群众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认真地揭露自己的严重错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到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什么样著作中曾经说过我们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或者曾经说过某一个共产党支部人是绝对不会犯错误呢？我们共产党人的党支部内生活所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否认有什么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的“神人”吗？

“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党，对于它们说来，实行自我批评，除了失掉错误以外，什么都不会失掉，而所得到的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只有充满了资产阶级庸俗习气的人，才会对其他人自我批评的行为进行冷嘲热讽。那么，既然犯错误是常见的现象，而在自我批评中，革命者只会失去错误，嘲讽者又只不过是一群庸人，我们又有什么好丢脸的呢？反而是那些被他人指出错误后仍然不愿面对、遮遮掩掩、死不悔改的人，在劳动人民眼里才是最可耻最丢脸的人！

9. 如何对待他人的批评？

做自我批评和接受他人批评，其全部的目的在于改正我们自身的缺点，在于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那么，在面对他人的批评时，我们关注的**必须是**批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确实指出了我们工作上的不足，哪怕批评只有 1% 的内容确实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我们也应当虚心接受；更不应该吹毛求疵，从批评者的语气、用词等方面找麻烦。如果批评者犯了错误，我们自然可以指出，但只要这

¹黑体是笔者加的。

种批评是善意的，我们就应当肯定这份善意，才能鼓励批评者以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改进意见。这里需要引用斯大林同志于 1928 年 4 月 13 日做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中的一段内容：

有时人们骂批评者，说他们的批评不全面，说批评有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人们往往要求批评的每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批评不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对批评就加以指摘和谩骂。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你们只要提出这种要求，就会把成千上万愿意纠正我们的缺点但是有时不善于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嘴巴堵住。这是坟墓，不是自我批评。

你们应当知道，工人有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点怕说实话。他们害怕，不只是因为怕说了会“挨揍”，而且也是因为怕批评得不全面会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并考虑到它的好的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

正是为了发扬自我批评而不是扼杀自我批评，正是为了这一点，必须仔细听取苏维埃人的一切批评，即使批评有时不完全正确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确。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确信：他们不会因批评不全面而“挨揍”，也不会因批评有某些错误而遭到“嘲笑”。只有这样，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具有群众性，才能真正得到群众的响应。

革命同志们自己换位思考一下吧——你批评的内容虽然有错误，但也有正确的地方，你主观上也确确实实是为了革命利益而好心提出意见，结果对方关注的不是

是你的意见的正确部分，而是对你过失犯下的错误进行疾风暴雨般的反驳，那么，你以后还会愿意积极地提出批评意见么？这难道不会让人寒心么？

有的同志看到他人批评的语气、用词有问题，觉得自己的工作“被否定了”，就立马开始委屈和闹脾气了，这是万万要不得的。革命同志们自己思考一下吧——我们正是为了整个阶级的利益而进行革命工作的，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而工作的，而不是为了个人荣辱而工作，既然别人指出了我们革命工作上的不足，我们不应该非常欢迎才对么？如果因为别人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陷就感到面子挂不住、感到委屈，岂不是把革命工作当成了自己的某种私有物么？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同志和群众的批评，又怎么可能克服自身的不足，怎么可能获取同志和群众的信任呢？

有时甚至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批评者主观上动机不纯，但其批评内容有合理性（在极个别情况下，敌人的批评也可能包括了合理的成分），那么在这时候，同样地为了革命利益，我们也应当虚心接受其合理的成分。当然，这不代表我们要认可批评者的不纯动机，因为批评者的动机问题与批评内容的合理性问题显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这也不代表我们在敌人的辱骂、诽谤面前也要站着挨打。

最后，一个优秀的革命者或革命组织如果下决心要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除了被动接受他人的批评以外，还应当主动调查研究，去寻求他人的批评，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尤其是那些被我们的错误伤害过的人的意见——因为他们作为亲历者最有发言权，最能指出我们到底犯下了哪些错误。

为了提高我们同志的革命素质，除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可以适当地对不同的同志的优秀方面进行表扬，推广先进经验，在一个革命组织中营造“比学赶帮”的氛围，让大家有可以学习的先进榜样。

10. 应该把犯错的原因归结于他人或环境么？

有的同志犯了错误后，不是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找问题，而是把责任归结于他人或环境。比如，两个同志在辩论的时候，甲同志的态度恶劣了些，乙同志就开始辱骂，革命同志间的辩论堕落成了流氓吵架。当我们对乙同志的辱骂行为进行批评时，他却说：“因为甲同志的态度不好，所以我就开始辱骂了。”或者说“因为我出身的家庭环境习惯进行辱骂，所以我也习惯辱骂了。”这些论调是十足庸俗的外因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依据，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乙同志在这里谈的“他人的态度”和“家庭环境”，统统属于外因，这些外因只有通过内因——也即乙同志自身思想的错误——才能起到作用，才有可能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为犯错误。假如乙同志能够意识到同志间的辱骂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次要矛盾，因而采取耐心冷静的态度，难道他还会对甲同志进行辱骂么？而在这个例子中，乙同志把自己犯错的原因归结于“他人态度不好”“我家庭环境不好”，而不是从自己的思想上找问题，按照这个外因论的逻辑，那遇到态度不好的同志时，马恩列斯毛等革命导师也会采取辱骂的方式；出身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的人就不可能改造自身的阶级立场，最终成为革命者了——因为他们家庭环境和阶级出身决定了这一点！

因此，在反思自己犯错的原因时滑向外因论，就必然导致推卸责任，阻碍我们自身的进步。这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考虑外因，而是说我们绝不应该把自己犯错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外因。

11. 应当因为害怕犯错而不发表意见么？

有的同志平时很少发表意见。一问起这些同志为什么不说话时，他们可能会这么说：“我感觉自己的想法不成熟，怕误导了大家”或者是说“担心自己的想法是

错的，害怕被批评”。这些想法也是要不得的。一个同志不应该害怕犯错误就不去发言、不敢做事、不敢为天下先。

第一，人多力量大，革命需要每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充分听取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有可能让一个革命组织少犯错误。如果在革命组织里不发言、不干事，我们要怎么为革命做贡献呢？第二，害怕犯错误、害怕被批评，说到底还是首先顾及自己的个人利益（比如面子），而不是首先从革命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就能够给其他同志带来启发；如果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其他同志就可以帮助我们指出错误在哪，我们就有机会意识到并改正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就算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也可以增进同志之间的互相了解。总而言之，张嘴说话永远比闭口沉默要好。第三，如果因为犯错误就被其他人残酷打击（而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式的批评），那责任在于他人，而不在你，因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或革命组织是不会残酷打击暂时犯错误的同志的。一发现别人犯错误就进行残酷惩罚，那是资产阶级才会干的事情。

12. 反对调和主义

前面说过，我们与暂时犯错的同志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绝对不能用残酷打击的方法对待这些同志。但是，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也不应当调和的；我们在耐心冷静地对待同志的同时，也必须彻底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两者是并不矛盾的。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惩前毖后”又“治病救人”，才能正确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然而，在实践中，有的同志看到了其他人犯了错误，不去制止，不去批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是把别人的大错误说成小错误，在进行“批评”时浮于表面、轻描淡写。调和主义是很有危害的，我们在本文开头部分已经提到了一些。

首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来说，不去主动斗争他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就会让

他们不自觉地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等到这些同志酿成大错后、或者是已经开始自觉维护错误思想后再去批评他们，就已经太晚了。不管我们主观上是否善意，纵容错误在客观上就是在害这些犯错的同志；对组织来说，不去彻底地批判错误思想，就可能让错误思想逐渐蔓延开来，使得革命工作无法取得成效，甚至使得整个革命组织滑向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就像历史上的第二国际一样；对发现错误的同志来说，不去批评其他人的错误思想，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们有义务为了革命利益而指出他人的错误、去帮助误入歧途的同志。

实践早已证明调和主义的危害。在历史上，考茨基和修正主义调和，最终滚到了修正主义一边；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调和，最终也滚到了孟什维克一边。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谁主张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谁就必然要滚到机会主义那里去。**”

笔者认为，调和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暂且不谈其阶级基础）有四种：第一种，是因为调和主义者自身多多少少也有这种错误思想，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这种错误思想的危害，因此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替持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辩护；第二种，是因为调和主义者希望组织内能和和气气的，害怕批评错误会造成同志间乃至组织上的分裂，但他们不明白“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只有经过批评或者斗争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思想分歧不解决，迟早也会造成组织上的分裂的；第三种，是调和主义者把自己的私人关系和情感凌驾在了革命利益之上，哪怕知道某个同志是错误的，但考虑到自己的个人感情，就“义无反顾”地替犯错的人辩护去了；第四种，是因为在正确意见处于劣势、错误意见处于优势的时候，持有正确意见的调和主义者害怕压力，害怕坚持正确意见会导致自己被群起而攻之，就直接放弃原则、放弃斗争，向占优势地位的错误意见屈服了。其中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实质上都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了革命利益之上，是一种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表现。

13. 要有反潮流精神

在革命中，正确意见处于劣势、不被众人理解，而错误意见处于优势，在革命中占了统治地位，这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从认识发展的逻辑来说，这也是常见的现象，真理最初往往只能被少数人掌握，只有经过了漫长的斗争，真理才能逐渐被大多数人认同。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日心说战胜地心说的例子；在社会科学领域，有马克思主义战胜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例子。在 21 世纪的今天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种反潮流的斗争。

既然无产阶级为了革命利益必须掌握真理，真理最终也必将战胜谬误，那么，在错误意见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持有正确意见的同志就应当发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而不应该随波逐流，向占统治地位的错误意见屈服。随波逐流也算是一种调和主义，但这种调和主义更具有特殊性，其后果是尤其严重的。

在一个组织中，当正确意见是主流、错误意见是支流的时候，持有正确意见的人向持有错误意见的人采取调和主义，还不至于立即危害整个组织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但是，当正确意见被错误意见压倒后，一个组织被错误意见占据主导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错误思想已经支配了组织，可以通过组织起到个人所不能起到的十分重大的破坏作用，错误思想已经具有巨大的实践上的危害性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竟然还要与错误思想调和，就等于是纵容这种巨大的实践上的危害性，就等于是让其他持有正确意见的同志孤军奋战、被错误的一方逐个击破，就等于是背叛革命。**因此，越是在正确意见处于劣势的时候，越是需要坚定的革命者主动站出来，去争夺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权。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应当有反潮流精神，要有为了革命利益而顶住压力的勇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二国际各修正主义政党纷纷公开背叛革命的情况下，列宁同志在鼓舞各国左派时就指出：“**人数很少吗？但是从什么时候起，革命者要根据他们的多少来提出自己的政策呢？**”¹**“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

¹ 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信

略。”¹毛泽东同志也曾教育共产党员应该有“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我们现在的革命觉悟虽然可能还达不到这“五不怕”，但我们今天如果不敢与一个革命组织中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话，明天又怎么可能敢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作斗争，去迎接更加激烈的革命风暴呢？

在反潮流的斗争中，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为了实现革命派的最终目的，就尤其要注意斗争的策略问题。我们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制订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反对攻打打鼓新场的两个例子，就是在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条件充分发扬了反潮流精神的范例，是值得广大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

注意，马克思主义者说的反潮流，是说要反对占统治地位的错误思想，而不是在正确思想占统治地位时顽固地替错误思想进行辩护——这不叫反潮流，这叫一意孤行。

14. 应当纵容小错误么？

前面讲到反对调和主义和反潮流精神，主要是强调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对不应该调和，要有反潮流精神。在这里，我们侧重谈谈如何对待小问题、小错误。

有的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小错误是人们经常会犯的，所以不需要批评和改正。”这个结论的逻辑是非常荒唐的，犯了“诉诸常见”的逻辑错误。向来如此，便对么？难道小错误就不属于错误，就不会危害革命么？既然也会危害革命，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批评呢？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还能得出这样的荒唐结论：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形形色色的剥削和压迫，而有些剥削和压迫是“大”的，有些则是“小”的，所以共产主义者只需要去反对那些“大”的剥削和压迫就好了，那些“小”的就可以放任不管

¹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了！如果作为先锋队的革命者不去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又怎能团结一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从而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巨任务呢？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以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看问题，而不应该以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如果一个同志的小的思想错误得不到揭露和改正，小问题可能慢慢就会发展成大问题；一场合下的小问题，在另一场合下可能就会变成无法挽救的大问题。

因此，这种认为小问题不是问题、小错误不是错误的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有危害的。当然，这不代表我们要上纲上线，把一切小错误都当成大问题，不加区分地进行同等激烈的批评。因为错误确实有大和小的程度之分，问题也确实有原则性和非原则性之分，我们在批评他人的错误时，也应当优先抓主要矛盾。本文仅仅是强调，不应当对小错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15.“小”问题为何引发大争论？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却成为导火索，在一个革命组织中引发了激烈和漫长的争论。争论结束后，有些同志回顾过程时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么一个小问题，也能引起这么激烈的争论呢？实在是浪费了时间。”笔者认为，矛盾不会凭空产生或激化。如果产生了非常激烈的大争论，就一定是有相适应的大矛盾作为驱动力的。这说明在小问题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更激烈、更复杂的大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会透过表象看本质，进行仔细的调查分析，才能找出真正的矛盾是什么，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笔者在本文论述其他问题时举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恰好也可以用来论述本问题：

例如，在网络群聊中，有时会围绕某个话题展开非常激烈的讨论，短时间内能有几百条消息。有些同志由于没有仔细地查看消息，不去对该话题讨论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不去考虑具体的场合，不去考虑不同人的概念理解或语言习惯的差异，眼中只看到了某个人说的某句话“有问题”，就立马开始断章取义，指责某某同志“有问题”。结果争论了半天，才发现对方实际表达的意思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发生了偏离。

在这个例子中，犯主观主义错误的同志可能会有好几个，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主观主义问题叠加在一起，产生的争论就必然尤其激烈。那么显然，在这个场合下，真正的矛盾已经不在于作为“导火索”的某一话题，而在于真正引发爆炸的“炸药”——即存在于同志头脑中的主观主义问题。如果不去对争论过程进行仔细的复盘，去揭露和改正主观主义问题，就好比换个“导火索”而不去拆除“炸药”本身一样，以后还是会继续产生矛盾的。

类似的，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甲乙两名同志长期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双方却不愿意坦诚地交换意见、公开地解决矛盾，而是藏着掖着，憋在心里不说。后来，甲同志犯了错误后，乙同志为了打击报复就“抓住时机”，开始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为了发泄情绪而攻击甲同志。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问题显然也不在于甲同志犯的错误，而在于甲乙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在于乙同志假公济私的打击报复。

如果读者同志们也遇到类似的由“小”问题引发大争论的情况，就要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才能分清什么问题只是“导火索”，什么问题才是真正的“炸药”，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矛盾。

软件行业简单政治经济学分析

哥白尼

软件的历史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诞生，无疑是让庸俗经济学家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软件啊软件，它是多么地“神奇”啊，它不过是一串电流、一组电子、一段信息，却能被售卖，能给人提供服务。因为软件的分发和下载是如此轻而易举的事情，它好像有了一种魔法，可以凭空创造价值的魔法。于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又复活了，供求价值论者看到了软件，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们迫不及待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完蛋了！”，他们认为，软件的出现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证明了商品价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这个新兴的软件行业，是否真的跳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呢？

为了分析清楚这个问题，就让我们把目光拉回计算机刚刚诞生的时候，在上世纪 50、60 年代时，世界上最早一批计算机诞生了，美国的 ENIAC、苏联的 MESM 等，这些早期的计算机和我们今天熟知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等差别很大。拿美国的 eniac 来说，其重约 30 吨，占地约 170 平方米，并且为了使得这个计算机能够运行起来，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换电子管、接线、散热、供电，这就让早期的计算机像是一个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阶级每天劳动，才能让它运转起来。而此时的软件，也和今天有很大不同，为了能够给计算机输入指令，当时的人发明了以打孔纸带或者编织铜线等形式来传递信息，这就是最早的“程序”，由此诞生了一批特殊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硬纸带上打孔以创造这些计算机运行所需的指令，这些工人就是最早的程序员。

在这个时间点上，计算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工厂，程序员和工厂里的电工、维修工一样都是工厂中的工人，而软件更类似于工厂的操作流程，是工厂的附属品，因为早期的这些计算机的指令并不通用，这些记录在打孔纸带上的程序一旦离开了工厂，就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也就不会有人想到可以对软件收费，即使是被一些科研人员公开出来的算法，也属于公共的科学知识的范畴。所以这个时候，软件业只是大型计算机工厂里的一个部门，它还没有独立为一个产业，也不具备经济学上的魔力。

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后 50 年里，半导体产业有了飞速的发展，计算机也迅速从工厂大小；缩减到衣柜大小；最后缩减到书本大小，由此诞生了个人电脑，到了 2010 年左右，又出现了可以被拿在手上的智能手机，计算机从一座工厂逐渐变为了劳动者也能购买的商品。而在这个过程中，软件也从打孔纸带；变成了磁带；又变成了电信号，最后体现为电脑上的文件，再加上互联网的诞生，人们动动手指就能下载软件，不需要跑十万八千里去现场拿取，又因为大家手上握着拥有相似架构和操作系统的设备，这些软件既可以在你的手机上运行，又可以在我的手机上运行，现代的软件就这样诞生了。

此时的软件业，也不再是计算机工厂里的一个部门，而变为了相对独立于计算机制造产业的两种新型产业。没错，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软件资本，这正是最令人们疑惑，也是供求价值论者拼命想要混淆的，但实际上确实存在着两种软件资本，分别是提供互联网服务的 it 资本，和售卖软件本身的软件出版商。这两类资本既相互依存，比如软件出版商依托于 it 资本的服务器来分发软件，而 it 资本又借助软件出版商的专业软件来维护服务器；但它们又是相互独立的，即使没有互联网，软件出版商也能通过售卖装有软件的光盘等来盈利，而 it 资本也可以在没有软件出版商的情况下提供互联网服务。

it 资本是产业资本

如果要我说，那些早期的计算机工厂也许从未离我们远去，it 资本就是它们衣钵的继承者，同样是拥有规模庞大的服务器，同样是需要大量工人来维护，只不过早期的商用大型计算机提供定制化的计算服务，而今天的 it 资本通过网络给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提供线上服务来盈利。然而在相同中又存在着不同，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的服务器不再需要那样大量的电工、维修工、接线员，往往第一次安装好以后，只需要少量的工人来维护服务器本身，而之前占少数的程序员，却变成了 it 公司的主要部门。

这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人们觉得，it 公司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敲代码的白领，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劳动者，进一步认为 it 公司的利润好像是从软件中凭空创造出来的——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就陷入了供求价值论的泥潭中去了。

为了不陷入这个泥潭，我们就得从 it 资本的资本周转入手进行分析，在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it 资本家用他的货币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就是 it 服务所需的服务器硬件和开发软件的程序员，服务器硬件作为生产资料，是不变资本，如果只是把服务器通电后放着，是无法生产出 it 资本家需要的利润的。而在 it 资本循环的最后阶段，他们售卖的是互联网服务，这种服务的售卖有时候不是以直接收费的形式，而是像淘宝、美团的平台抽成那样，把它们收费的过程隐藏了起来——但总归还是要收费的，并且他们售卖这些互联网服务所赚得的钱，必须大于他们购买服务器和聘请劳动力付出的钱才能盈利。那么，如此一来，it 资本盈利的奥秘就在于其资本循环的第二阶段，正是在这里，it 资本发生了增值。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如果仅仅是把服务器硬件放在那里，它的价值不会有任何增加，即使将服务器硬件卖出，也最多只能交换到原本购买服务器花出的货币，考虑到设备的折旧费，所得的货币还会更少，it 资本家需要买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这种商品他确实找到了，这就是 it 业程序

员的劳动力。正是因为 it 程序员投入了具体劳动，改造了服务器，又由于吸收了程序员的抽象劳动，服务器才在空无一物的计算机商品价值之上凝结了新的价值。未经编程的服务器的商品价值，在程序员的编程劳动下将旧价值保留在了承载 it 服务的服务器之中，同时程序员的编程又作为新价值的源泉同样凝结到了互联网商品之中，这样，互联网服务才能够作为一种商品并具备了商品交换价值。it 资本家也凭借对作为生产资料的服务器的垄断，掌握了编程完成的互联网商品。因此，蕴含了新价值的互联网商品也终于进入到了商品交换领域，IT 资本家也成功脱下了产业资本的外衣，作为一名商业资本家向他的顾客兜售互联网服务，以此完成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变，以此获得蕴含在互联网服务中的程序员所创造出的新价值。

it 资本为了得到这样一个可以给他们创造利润的网络服务，首先需要雇佣 it 程序员们，借助他们的劳动从无到有开发出第一版服务程序，但如果仅仅是这样，it 资本家的地位依然是不稳固的。在一种网络服务刚出现的早期，往往有诸多互为竞争对手的 it 资本家虎视眈眈，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他们需要自己的服务拥有更先进的功能，并且为了不被竞争对手打败，也需要调查其他 it 资本的优势并进行改进，这些功能上的优化，需要 it 程序员们持续投入劳动。在形成垄断之前 it 资本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一两个功能上的落后，可能就导致用户大量转向另外一个平台，在这一阶段的 it 资本和软件出版商有相似之处，它们的核心资产都是软件源代码，为了防止竞争对手窃取自己的源代码，就需要网络安全相关的程序员投入劳动。而在 it 资本形成垄断之后，为了应对节日、特殊活动期间的流量暴涨，和因为服务器故障、软件漏洞等导致的突发情况，也需要有 it 程序员来进行运维工作。在 it 资本不断循环的资本增殖过程中，没有哪一刻能够离开程序员的劳动，如果没有 it 业程序员投入的具体劳动，网络服务很快就会停转，随后 it 资本就会破产。

程序员们的劳动给 it 服务器硬件中注入了新的价值，但是并没能得到自己全部的劳动成果，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程序员的工资，并不比大多数体力劳动者更高，

这份工资同样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程序员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一定是多于资本家支付的工资，这多出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被 it 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资本家利润的一部分。it 资本家很清楚剥削的原理，他们明白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工人劳动的越多，他们剥削得到的利润就越多，这就是许多互联网公司采用 996 工作制的原因，所谓“狼性文化”的背后，实质上是剥削的文化，是让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而工人血流流泪的文化。

至此，it 资本的循环过程已经明晰了：第一阶段，it 资本家买入服务器硬件、电力等生产资料，以及作为劳动力的 it 程序员；随后 it 程序员不断投入劳动，开发软件、运维、优化，因为 it 程序员投入的劳动，服务器的价值发生了增加，而由于工资少于程序员的劳动所得，程序员的剩余价值被剥削走了；最后一阶段则是在此基础上售卖互联网服务，资本家剥削得到的利润重新变为货币的形式。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因此 it 资本就是产业资本，不是什么脱离了劳动价值论的神奇事物。

it 业劳动者受到的剥削

我们已经知道了，it 资本的增值来自 it 业劳动者，主要是程序员的劳动，不过无论是在中修还是欧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中，程序员都是一些坐在高大上写字楼里的，西装革履的白领、知识分子，总之是不像劳动者，这给部分同志带来了一种错觉，似乎程序员都是西装革履的，都拿着高薪花天酒地，像是 tg 上就有几个左倾机会主义的团体宣称“脑力劳动者都是小资”。实际上，像资产阶级所宣传的程序员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是少数大厂（如美团、阿里、腾讯、华为）的正式工，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岗位都是外包程序员。

所谓的外包，和派遣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工作紧张的时候，外包程序员们要承担大部分工作，加班到深夜，只睡两三个小时又要继续上班的事屡见不鲜，而 it 资本自己的正式工只需要翘起二郎腿干一些管理的工作；在工作少的时候，资

本家又会将这些外包程序员一脚踢走，外包公司又会将他们安排去新的，劳动更加繁重的岗位上。外包程序员的工资往往只有大厂正式工的几分之一，还要被外包公司抽走一部分，而他们的工作量却往往需要一天十多个小时的高强度脑力劳动才能完成。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外包程序员们自称为“码农”，因为我们就像封建时代的农民一样，做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着最少的工资，而 it 资本家和管理层的工贵们却像地主一样坐享其成，我们码农没有生产资料，只能持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勉强维生的工资，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

“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由此可见，码农们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他们受剥削的处境和体力劳动者是一致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和进行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们是一致的。

但即使普遍受到严重的压迫剥削，码农这一群体，却并不能算作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部分。在政治上，许多程序员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码农中有自由派思想的人占比不少，这些自由派码农，面对带给他们压迫的资本主义世界，无比向往；可是面对要解放劳动者的共产主义，却嗤之以鼻。在经济上，有部分程序员因为自己工资高于体力劳动者，能攒下一些存款，就用这些存款去进行炒股，甚至是倒买倒卖的投机活动，更有恶劣的是拿存款去进行赌博活动。在思想上，有些程序员认为自己是脑力劳动者了，就要比清洁工、外卖员等更加高等，总是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爆发矛盾，点的外卖晚了几分钟，就要给外卖员差评，在餐厅里，也总觉得服务员因为忙碌没有及时招待是“服务不到位”。

以上这三方面的现象，笔者本人就看到了很多，个人认为程序员不能算无产阶级中的先进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较为落后的部分，这些落后思想的诞生也有着物质基础。首先是程序员的工作性质，虽然有合作，比如前后端联调、开发与测试的交接，但总体上还是以手工业的工作方式为主，在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里，都是自己开

发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功能，互相不过问，这就导致程序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较为严重，缺乏和其他无产者团结的意识。再加上程序员作为技术工种，相较于大部分行业的工人，有较高的门槛，工资也会相对高一些，并且 it 业的工贵对于码农，也不会像工厂工贵那样对普通产业工人呼来喝去，多少会保留一点文明人的礼仪，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就导致一些程序员认为自己比其他行业的劳动者高等，因为这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在程序员群体中远多于其他行业的工人。

笔者认为，程序员这一群体并不是革命组织首要团结的目标，但是不可否认这一群体中也会出现革命的个人，在来到 xmp 后，我也结识了几个不同革命组织的技术人员，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不仅互相学习到了技术，也建立起了革命的友谊，如果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也是以革命为人生目标的技术工作者，我邀请你加入我们（详见本报后记）。如果你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认同的技术工作者，我也希望你多去团结其他行业的工人们，不要在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中变得麻木。

软件怎么卖钱？

如果说 it 资本是和早期的大型计算机工厂一脉相承的产业资本，软件出版商的性质却和它们很不一样，为了弄清楚软件出版商的性质，我们还是从计算机的发展进程中寻找答案，在上世纪 70 年代，微处理器诞生了。这一新技术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把计算机的尺寸由工厂或者房间大小缩减到了能塞进今天机箱的尺寸，使得个人电脑的诞生成为了可能，二是同一公司生产的同一型号的微处理器架构相同，而一份软件可以在所有采用同一架构的处理器上运行。

这样一来，软件就不再是和某一台计算机深度绑定的产物，原本给大型计算机制作打孔纸带的技术工人也有了脱离原有岗位的机会，从这些技术工人中出现了最早的软件研究者和程序员，他们不再给特定的一台计算机制作程序，而是给所有采用同一架构的计算机制作程序。在一开始，这些程序的作者多半是进行无偿分享，用户也会选择捐赠一些钱给这些作者，在个人电脑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这种田

园式的小生产者之间的自由分享还可以持续下去。

但是很可惜，软件市场这块“肥肉”很快就被野心家盯上了。1975 年，投机客比尔盖茨成立了微软公司，在第二年，1976 年，他就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致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在这封信中，他对开发软件的作者进行了无耻的污蔑，说他们的软件是垃圾，又攻击那些以开源精神无偿分享收费软件的人，污蔑他们为“小偷”。借着这封信的势头，在 1976 年同一年，美国国会就修订了《版权法》，在四年后的 1980 年，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专门《1980 年计算机软件版权法》。美帝国主义政府出台的这一系列法律，用暴力为软件投机客们提供了支持，至此，软件出版商作为一种新的资本粉墨登场，而始作俑者微软公司，在靠售卖软件发家后，又扩展了 it 业务，成为了跨国垄断资本。

软件出版商是金融资本

通过上面这一段，我们讲清楚了软件出版商的来历，今天的游戏公司、专业软件公司（如 adobe 等）都属于此类，与 it 资本这种产业资本不一样，软件出版商只有在资产阶级法权的保护下才得以存在，如果资产阶级的暴力机器失效了，版权法不存在了，软件出版商就要倒闭了。从形式上看，软件出版商和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书籍出版商一样都是依靠版权盈利，但对于书籍出版商和软件出版商来说，利润的来源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的早期，版权是一种为了保护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存在的剥削阶级法权，因为在自然状态下，信息的复制和传播是没有阻碍的，通过制定版权法，人为阻断了知识的自由传播，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才能够对知识收费。（请看附录：关于版权的提纲）

早期的书籍出版商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他们卖出书籍所得的钱不能全归自己所有，而是要先分为四部分，一是付给上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作为对生产知识物质载体的劳动者劳动价值的交换；二是付给作者的稿费，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资

料；三是付给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税收；最后的第四部分——交完上面三部分所剩的差价，才是能进入出版商口袋的利润，来自于对造纸厂、印刷厂工人剩余价值的瓜分。这个时期的出版商无法直接从版权中获取太多利润，他们只是代替作者从读者处收取了版权费，而后又要转还给作者，出版商的利润来源主要是商业利润，作品的好坏反映到销量上，也只影响出版商的资本周转速度，而不影响他们在书籍贸易中瓜分到的剩余价值的比例。

但是对于出现在帝国主义时期的软件出版商，情况就很不一样了，首先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的物质载体的价值进一步降低了，书籍出版商需要将销售额中很大一部分支付给上游印刷厂等产业资本，而由于分发一份软件的成本比印刷一本书的成本降低了很多，软件出版商需要支付给 it 资本的服务费也大大降低了，大型的出版商还会搭建自己的服务器，自己也作为 it 资本提供软件分发服务。这样一来，软件的销售额中分给产业资本的那部分就降低了许多，而商业利润的部分就更少了，刨去必须以游戏版号费等各种形式支付给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税收（保护费），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版权费。

为了能够独占版权费，软件出版商放弃了仅仅获取商业利润的经营模式，他们从市场上雇佣来能够开发游戏或者专业软件的高级程序员，提前预支这些创作者的生活资料，换取自己对版权的绝对掌控，直至作品最终开发完成并销售之前，这些软件出版商都无法获取任何利润。这是一种惊险的金融赌博，软件出版商要根据开发成本和对销量的预估来制定一份软件产品的定价，但未来的市场是不确定的，以游戏为例，如果当时出现了很多同类型游戏，即使制作精良，也可能销量惨淡，而一款低成本的简单游戏，也有可能因为某个独特的玩法而被部分玩家群体青睐，游戏行业的无序竞争更加剧了这种现象，往往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少数游戏公司获得了远超开发成本的垄断利润，大部分游戏公司亏的血本无归。

到了这一时期，版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知识分子们获取生活资料的凭证，而是变为了金融资本上桌赌博的筹码，而这些筹码最终都压在劳动者身上，因为资产阶级暴力机器的存在，想要玩电子游戏或者使用专业软件的劳动者，必须

支付一笔高昂的版权费，而这些版权费全都进入了金融资本的资金池，支撑着他们参与下一轮金融赌博。

软件垄断资本

在上一部分我们分析了软件出版商的性质，并且以游戏公司为例，说明了其利润来源于金融赌博的金融资本的本质，但并不是所有软件出版商在最开始都是这样。如果同志们对游戏行业有一定了解，应该知道，在大型的游戏公司开发的游戏以外，还有一些由个人作者和两三个人的团队开发的“独立游戏”，这些独立作者或许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开始并不是抱着投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赚取自己的生活资料而开发游戏的，但他们的作品要想销售出去，又不得不和这些金融资本在同一个市场中竞争。

这种竞争从表面上看是平等的，但显然，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口头上写在法律条文中的“人人平等”，就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是平等的了。相比于独立作者，大公司不仅拥有人数和开发经验上的优势，还可以多线作战，同时推出好几个软件产品，少数几个产品的失败不会影响整体的盈利，而独立作者的作品一旦失败，就只能放弃，选择转行或者成为大公司的雇佣开发者。不仅如此，软件公司还往往和官僚资本沆瀣一气，用流氓版权对独立作者进行打击，连菜单的位置、游戏玩法都能作为版权，面对拥有成熟法务团队并且和官僚资本有大量联系的软件资本，一旦被缠上，独立作者胜诉的几率就很渺茫。在中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更加的无耻，还发明了“游戏版号”这种专政手段，对于那些交足了“保护费”的大公司，在游戏开发完成之前，游戏版号就已经批下来了，而独立开发者甚至等待 5~6 年都无法等来一个版号，中修官僚垄断资本的专政手段，也直接导致中国的游戏行业长期落后于欧美国家。

在垄断资本主义这种毫无平等可言的制度下，独立作者、小公司，不断被大型软件公司吞并，正如马克思所形象地描述的那样：“在这种赌博上，小鱼为大鱼所

吞，羊为证券交易所的豺狼所杀。”最终形成了像微软、谷歌、腾讯、阿里这样的软件垄断资本，他们不再局限于单一的 it 业务或者软件出版业务，恨不得将游戏、专业软件、购物平台、外卖平台全部拉入自己的垄断版图，妄图建立起无可撼动的垄断帝国，软件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相较于形成垄断之前，不仅没有缓和，而是加剧了。

可是，软件垄断资本之间的战争，却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痛苦之上：为了能赢得“外卖大战”，美团等垄断资本强行压低商品售价，为了使得自己的服务费抽成不变，就从商家营收和配送费中克扣，最终落到餐饮业劳动者和外卖员的头上；高德、滴滴不断增加抽成，导致网约车司机的处境越发艰难，不得不每天开车十多个小时才能维持生活；而作为软件垄断资本主要员工的程序员，无论是基础的前后端开发，还是高级的游戏、专业软件设计师，都面临着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和裁员的威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互联网、计算机软件技术的进步，不仅没有让劳动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反而制造了新的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软件垄断资本。

对软件行业同路人的话

写到这里，本文对软件行业的分析就已经结束了，但我们的故事并没有写完，人类的历史不能终结于资本主义，而是要继续走下去，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需要继续革命。

在本文的读者当中，也许有不少是程序员，还有一些将要成为程序员的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你们认为我这篇文章写的如何呢？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还是很粗糙的，最开始我的标题叫《软件行业政治经济学分析》，写完以后一看，加上了“简单”二字，仅仅把软件公司粗略地分为了 it 资本与软件出版商两大类，而对于网游和单机游戏、操作系统和专业软件、购物平台与线上影视服务之间的区别，并没有进行详细研究。尽管粗糙了些，但这篇文章作为中国左翼团体中第一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分析软件行业的文章，在继续革命社的同志的帮助下，能把它写

出来，我内心还是很高兴的，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到读者们。

软件行业的资本家把我们程序员分为了 369 等，有些人可能是高级程序员、专家，工资远高于普通劳动者，有些人做了管理层的工贵，比别的程序员更加高贵，但最多的是 996 的码农。资本家和学阀们会这样说：“你努力工作，将来提拔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你多刷题拿高分，以后就能赚大钱。”但这样的个人投机活动，即使成功，也是使自己成为新的压迫者，无法改变那些被软件垄断资本压迫的大量劳动人民的命运，个人的投机、升官发财和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相比，哪个更加重要？如果你的答案是后者，那么，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继续革命社。

附录：关于版权的提纲

（由继续革命社集体完成写作）

一、在原始社会是没有版权的，因为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阶级，一个人的知识是无偿地分享给其他人，在这种最自然的状态下，知识的传播是没有阻碍的。

二、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分工也更细了，开始出现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他们专门负责生产知识（或者说信息），如各类文学作品、生产技术。为了赚取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些知识分子不得不进行一种简单的商业活动，买入空的纸张，然后将记载有自己知识的媒体高价卖出或者借阅出去。这种简单商业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学习这种知识的人收费，以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并不能积累过多财富。

三、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知识的复制和传播本就是没有阻碍的，出现了最早的盗版，大多出生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选择向暴力机关支付一笔费用，以暴力手段打击复制知识者，从而人为阻断了知识的传播，这就是最早的版权。版权作为一种剥削阶级的法权登上了历史舞台。

四、综合二、三两条，可知道，最开始的版权费包含的只有知识分子的生活资料和国家机器收取的保护费（也就是税收）。

五、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出现了专业的出版商，最早的出版社卖出书籍后，钱分为四部分。一是付给上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作为对生产知识物质载体的劳动者劳动价值的交换；二是付给作者的稿费，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资料；三是付给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税收；四是出版社自己赚的差价，来自于对造纸厂、印刷厂工人剩余价值的瓜分。出版社的出现，将从前知识分子们的简单商业活动聚集了起来，变成了商业资本，由于出版商的存在，知识分子们不再需要过多考虑销售和交税的事情，知识的生产和分发过程也被分开了。

六、在简单商业活动的阶段，对知识的收费是不固定的，往往由作者需要的生活资料来决定。但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由于知识的生产和分发过程分开了，稿费分成也被固定了下来，部分书籍的畅销超过了出版商的预料，导致部分作者也获得了远超自己生活所需的稿费，畅销书的出版商也可以就此抬高售价，赚取到超额利润。资本家尝到这种甜头以后，一种新的投机活动也开始酝酿：一部分出版商选择不和独立的知识分子合作，而是寻找那些作品卖不出去而穷困潦倒的落魄作者。出版商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可以解决落魄作者的燃眉之急，资本家将他们雇佣过来，提前预支了作者的生活资料，但代价是作者以后生产的所有作品，版权都归出版商所有，作者除了自己的工资以外收不到一分版权。

七、这种新的经营模式说明一部分出版商由商业资本蜕变成了金融资本，他们提前预支了作者的生活资料，使得知识分子阶层的作者变成了脑力劳动者，而作品的销售额，除了分给产业资本和国家机器的，剩下的都是出版商的版权费。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类似于期货的金融赌博，如果作品卖的好，出版商就能收回远高于成本的利润，反之如果作品无人问津，出版商就会血本无归。

八、随着越来越多的出版商由商业资本变为了金融资本，版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由作者从读者处收取生活资料费用的凭证变为了金融资本上桌的筹码，版权法也由一种对创作者获取生活资料的暴力支持变为了对金融资本的暴力支持。

九、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出现了软件出版商，其金融资本性质更加明显，书籍出版商还需要将销售额中很大一部分支付给上游印刷厂等产业资本，作为对产

业工人劳动价值的交换。而由于软件产品的特殊性，媒介的价值进一步降低了，软件出版商只需要支付销售额中极少的一部分，就能从 it 资本处购买到分发软件的服务。

论民主集中制与工人的民主制度的关系

红线笔锋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事实上，毛主席提出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指示。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将群众的意见（即他们所持有的分散的民主）给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分析，抽象成革命的理论，再回到革命的斗争过程中，通过来自于群众民主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群众运动，才算是不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又由于这样的集中是来自于群众的民主，所以集中就能够格外地反映群众的需要和群众的实践，更能够指导群众的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党和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者，都必须看到群众的意见和民主的想法，将群众的民主意见作为我们的工作的基石，只有我们进行了正确的集中以后，党和群众的关系才算是更近了一步，才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所以，要坚决反对那种脱离群众的意见和民主办事，只追求领导的集中指导而根本不顾广大革命群众的民主。实际上，这样的集中就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是反动的集中，是脱离从事生产和斗争实践的群众的集中。任何时候，无产阶级的分散的民主意见和分散的材料，即这些最能够反映实践和斗争运动的宝贵的民主，都会给自己开辟道路，他们同样会形成自己的革命的集中，代表他们的利益，在斗争形成自己的权威，从而在这种更能够反映绝大多数民主意见的革命的集中的指导下打倒反动的

权威和集中。革命的民主永远大于反动的集中，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革命的民主在形式上看来是少数派，但只要他们是真心实意地为中国革命服务，那么他们就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多数派，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共同的革命利益，因而他们就有权继续和反动的集中斗争下去。

我们认为的民主集中制存在的前提，恰恰是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以后，运用国家对剥削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的暴力专政。只有充分地社会上贯彻民主集中制，彻底且充分的反映无产阶级的需要，才能够彻底地贯彻对资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同时，只有发挥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够贯彻好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说，对敌人的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一起实现的，彼此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加强。

托洛茨基从 1905 年苏维埃的经验出发，将苏维埃视为工人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雏形。1923 年的《新路线》里，他警告党内正在形成的官僚趋势，主张“把党的路线重新系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之上”，并提出三项遏制官僚化的制度：①代表随时可罢免；②一切国家和党务人员工资不得高于熟练工人；③关键岗位定期轮换。此后他把这些要求概括为“工人民主”，认为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才是工人阶级意志的集中，而不是官僚权力的集中。

托洛茨基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指导”在他的不同文章中都有论述，但如同在这段材料中所说的，他将民主集中制视作是坚持他所指导的工人的民主制度以后的结果，或者是将工人的民主制度视作民主集中制本身。

民主集中制也不是像托洛茨基说的那样，只要建立起这三个制度就能实现的。这些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在制度上的基本要求，但是做到了这些制度并不意味着就实现了民主集中制，这只不过是做到了形式上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实现了集中。同时，这三个制度也不能够充分地应对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带来的

走资派的产生，只要有商品制度等资产阶级法权作为经济基础存在，无论是实行怎样的民主制度，都必然会在社会上和党内形成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势力的走资派，而存在走资派也必然在行政上造成制度的“官僚化”。也就是说，只要有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党内，党本身的民主集中制在形式上就不是彻底的，而必然存在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甚至是其路线的情况。同样的，无产阶级如果想要实现民主，那么就必須和资产阶级进行尖锐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民主的实现不是靠这些制度的规定就能够实现的，须知，只要有资产阶级法权就必然有党政机关的官僚化，那么无产阶级的民主本身就要遭到破坏。

因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是一体的，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坚强领导，在这个革命的集中的前提下实现革命的民主。然而，革命的民主也要源源不断地为革命的集中提供必须的基础，集中是源自于民主，但是坚持民主又必须坚持集中的领导，也就是要坚持党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一切党内外资产阶级进行尖锐的斗争。民主集中制只有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够巩固和彻底地实现，也就是在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同时，民主集中制才能够得到贯彻，任何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放松，就是在纵容他们破坏民主集中制，从而削弱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正如我在一开始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论述，无产阶级先锋队所以能够组织起来，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领导路线发动了无产阶级以后的结果，从而说明了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群众运动的表述，也同样是对如何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指示。任何的民主制度都不过只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路线领导下民主集中制的实现，也就是说，任何巧妙和精巧的民主制度都是如何发动群众和向群众做工作的方法，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使得工人阶级的自发的、不系统的、以零散形式表现出来的民主观点，能够被马克思主义组织集中起来。然而，坚持这些工人的民主制度，必須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才能够实现，这种实现的本身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这一集中起来的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斗争以后才能够保持。党内的不民主和官僚化是党内资产阶级路线在党内的结果，而社会主义

之所以有一条上层建筑上的资产阶级路线和党政机关的官僚化，恰恰是社会主义时期必然存在的东西，任何的工人阶级的民主制度都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才能够保持和实现的东西。因为，一旦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党政机关的领导权以后，任何再完美、再精妙的民主制度都要被取缔，都要被党政机关的官僚化和僵死化所代替，这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必然产生的现象。因此，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只是无产阶级政党集中工人的民主的工具，是实现党对工人的领导和集中民主意见的工具，也同样可以作为与资产阶级导致的不民主作斗争的工具，可以视作是民主集中制所要求的与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的途径。但是，民主制度的作用不能够将其提高到民主集中制本身，也不能够认为实现了民主制度就能够保证党政机关的非官僚化。同样的，党政机关的官僚化也不能够看作是没有坚持民主制度导致的，而应该看作是资产阶级对党政机关权力的争夺的结果。

托洛茨基将党政机关的官僚化看作是没有实现工人的民主制度的结果，实际上是在替资产阶级夺权进行辩护，将他们做的事情推到了无产阶级政党身上，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含义的篡改倒是达到了顶峰。

既然在社会主义时期必然存在走资派，从而必然导致部分党政机关的官僚化，那么作为“先知”的他提出了这三个民主制度就自以为是地认为可以消灭官僚化，无疑是在掩耳盗铃。因为，既然社会主义出现官僚化是必然的情况，那么出现这一情况就绝对不是没有发动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革命才导致的，也绝不是党内资产阶级以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系统性地争夺党政机关的领导权的结果，而一定是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听托洛茨基这位“先知”的指挥贯彻好这三个民主制度、贯彻好工人民主导致的。那么最为本质的，对那些真正打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东西——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经济基础——的斗争、限制以至最后的消灭，这一最根本的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措施就被托洛茨基无视了。托洛茨基采用这些表面上好听，实际上空洞的民主制度，是把民主集中制降低了档次，把民主集中制仅仅是看作一种民主制度，却根本忽视了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

先锋队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根本掩盖了只有发挥党内的路线斗争才能够彻底地实现民主集中制。将所谓的“工人的民主制度”看作是民主集中制实现的最高原则，也就是要求工人丧失掉民主本身，是将资产阶级必然造就的官僚化，胡乱强加到无产阶级身上，以恶毒的“先知”的咒骂说资产阶级造就的官僚化是无产阶级没有贯彻工人民主造成的。这不仅在理论上替资产阶级掩盖了官僚化的根源，还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一同将资产阶级干的恶事作为屎盆子扣在了无产阶级的头上，向无产阶级政党指责他们没有贯彻好托洛茨基的指挥。

这样，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上的不断革命，从而将资产阶级的一切权力都争夺过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他篡改为仅仅靠工人的民主就能够实现了，这无疑是转移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向，也同样是转移了坚持民主集中制要求的斗争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将工人集中和发动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反复的争夺和斗争。民主制度是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但是这个工具的保持则取决于工人能不能保持他们的领导权，一旦丧失了领导权，这个武装本身就要被资产阶级解除，那么就会表现出党政机关的官僚化。托洛茨基则是一味地指责官僚化的责任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因而，民主制度这个工具必须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对党的领导权的保持和反争夺上，服务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上。

附录

本刊后记

烛火

再次为《继续革命》第 14 期的延误向读者同志们致歉，编辑部正在整顿我们的供稿和编辑工作。《继续革命》第 15 期暂定于 11 月 10 日发布（但愿）。

我们要向每一位参与本期工作的同志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其名单如下

- 作者名单已置于各篇文章标题之下。
- 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有：
 - — 逐星
 - — 织工
 - — 7762
 - — 红线笔锋
 - — 大地风火
 - — 玉恒
 - — 月季
 - — 烛火
- 参与美工工作的同志有：
 - — 红线笔锋（感谢其承担了封面的绘制）
- 参与排版工作的同志有：
 - — 烛火（主要工作是这位做的）
 - — 7762

对于由于客观原因未提供笔名的同志，我们依然沿用了此前约定的做法，即使用其提供的特定字符串，或者是在编辑部内部昵称经过 SHA-1 算法处理后的前 8 位哈希值作为代替。这是为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如实记录下每一位同志的劳动成果。

再次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致歉 & 致谢

在革命风暴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的报纸的出版，是我们对中修反动统治的宣战，是对真理的捍卫，是广大工农群众的战斗呼声。我们深知，《继续革命》之所以能够与同志们见面，归根到底，是在于全国各地的革命同志们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推动了中国的革命的进步，也正是前人不解宣传马克思主义，才让我们有一个后人乘凉的机会，才能够站在革命前辈反抗中修的肩膀上将革命力所能及地向前推动。

我们要首先向那些在工厂、在田间、在岗位上坚持革命宣传的同志们致以最高的革命敬意。你们冒着失业的风险、冒着被打压和封禁的危险，依然把火种撒向沉睡的大地，用实践证明：无产阶级的思想不会被封锁，革命的声音不会被噤声！

我们要感谢所有参与写稿、编辑、校对、设计和传播的同志，正是你们无名而顽强的劳动，《继续革命》都凝聚了工人阶级的意志与信念，并向成为革命队伍相互联系与鼓舞斗志的重要阵地而前进。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读者同志们，正是你们可能进行的不畏惧监视、不惧打压，主动传播、分享《继续革命》。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正是有你们的参与与传播，纸上的文字才能变为刺破中修黑暗的利剑，编辑部全体成员衷心向全体读者同志们表达感谢。

最后，我们要将最深的敬意献给一切为推翻中修法西斯统治、为实现社会主义新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懈斗争的同志们。未来的胜利，属于一定我们！

革命是千千万万劳动群众的共同事业，是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才能够实现的，但为了我们的后代、为了我们的向着摆脱压迫的未来，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也一定会胜利。

（本文在原有第一期的报纸基础上，稍作修改。）

由于创刊工作仓促，编辑经验尚浅，我们的马列毛主义水平还很低，《继续革命》中可能存在部分表述不严谨、用词不准确、排版混乱、美工粗糙等问题，影响

了同志们的阅读与理解。在此，我们向广大读者和支持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革命宣传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我们将在同志们的监督与帮助下，不断总结、不断改进，力求使今后的每一期报纸都更准确地服务于斗争、服务于群众。

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与意见。

——《继续革命》编辑部

2025 年 7 月 29 日

关于我们

《继续革命》编辑部

如何加入见[如何来到 XMPP 与我们交流？](#)

(一) 我们是谁？

《继续革命》报刊由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组织编辑并发行。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是一个在 XMPP 上公开活动的马列毛主义小组，坚持马列毛主义原则，过去长期进行 XMPP 上进行授课活动。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不调和的斗争：驱逐了十月烽火一类的新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展开了对资产阶级色情思想、杯水主义思想的大批判，反对左倾冒进主义与右倾调和主义……继续革命社在长期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与马列毛主义文革斗争社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也因此被合称为“两社”。时至今日，我们仍在与一系列诋毁污蔑两社的机会主义分子做着坚定而不可调和的斗争。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组织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了一些错误思想。我们开展了思想整风，对组织内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在一次次的斗争中发展了我们的组织。我们希望继续革命社能够为中国二次共产主义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全人类共同的解放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列宁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指出：“在一般专制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所造成的那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起来。小组这种紧密的、闭塞的、几乎总是建立在个人友谊基础上的少数人的结合，是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必要的发展阶段。”

我们在讨论之后做出了开办《继续革命》报刊的决定，期望以此扩大和发展组织，并为中国革命进行理论指导，以期早日实现与其他小组的联合，建立新的、革

命的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国二次共产主义革命，早日推翻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

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的几位主要成员过去曾长期在 QQ 上进行活动，在屡被修正主义中国的警察打击后总结经验，认识到在 QQ 这一完全暴露于国安监控之下的工具上开展革命工作，无异于将一切组织信息拱手交给敌人，革命斗争根本无从谈起。我们认为，线上线下要两手抓，反对燎修的线上政治报建党，同时也反对纯粹线下而无任何线上的建党路线。因而在被打击之后并没有抛弃线上，而是寻找正确的方式来继续进行线上革命活动。

在修正主义中国网络封锁和高压监控政策日益严酷的现实下，我们积极探索海外平台，最终转战 XMPP，并将其作为网络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

（二）为什么是 XMPP？

XMPP 是一款起源于 20 世纪欧美自由软件运动的去中心化通讯协议。这场由欧美小资产阶级主导的自由软件运动，旨在突破垄断资本的网络专政体制。XMPP 系统的开源、多中心化特性，正是其革命潜能的体现。

相比之下，Telegram（电报）虽然流行，却仍被资产阶级操控，不仅集中式控制、数据不加密，还强制绑定手机号，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专政工具。而 XMPP 多中心化，有着数十上百个服务器可供选择，用户可自建服务器，避免集中控制；端对端加密，采用 OMEMO 加密技术，即使是服务器拥有者也无法窥探通信内容；完全匿名，注册无需手机号、邮箱或任何个人信息，仅需账号名与密码；并且 XMPP 支持与 Telegram 与 Matrix 群组（另一个去中心化开源 im 平台，但是革命派较少）桥接，实现更广泛的沟通与斗争。

以上种种优点决定了我们选择 XMPP 作为活动的平台。而现如今，XMPP 的中文区已俨然成为一片革命交流之地，主要活跃的群聊都是交流马列毛主义的革命群聊，只有一小截骗子扛着红旗反红旗，散播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毒草，成了

我们的反面教材，这就更加适宜作为革命活动的平台了。

反驳一些常见的关于 XMPP 的谬误。

1. 装了 XMPP 被警察找？

首先，是否真的是 XMPP 导致的？其次，即使警察可能意识到你在 XMPP，相比在 XMPP 匿名的交流，在墙内平台裸奔就合适了吗？

2. XMPP 不如 QQ 方便？

首先，在隐私保护方面，XMPP 有隐藏唯一标识符功能等，远比 QQ 丰富。其次，XMPP 在交流上的功能基本是齐全的。并没有缺少。

(三) 如何来到 XMPP 与我们交流？

手机端用户

- 点击链接下载 XMPP 客户端 monocles (清华大学 tuna 镜像源)
- 点击链接下载 XMPP 客户端 monocles (南京大学镜像源)
- 点击链接下载 XMPP 客户端 monocles (上海科技大学镜像源)
- 点击链接下载 XMPP 客户端 monocles (官方源 (被墙))

桌面端用户

- 官网 Windows 下载
- 官网 GNU/Linux 下载

注册账号

进入以后可以自由选择一个服务器进行注册，推荐服务器：@conversations.im, @chatterboxtown.us, @yax.im, @xmpp.earth, @draugr, @xabber.de 等。

注册示例

账号：革命新人 @conversations.im

密码：Osj02KS72hsk

部分服务器可能需要输入验证码

附录中已有更详细的注册教程，此处则不再赘述。

注册完成后，点击右下角“开始对话”→右下角+→“加入公开频道”，输入以下地址加入对应群组：

- 审核群：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 @conference.chatterboxtown.us
- 公开群：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 @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为适应《继续革命》报的出版与讨论，原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已转型为《继续革命》报读者交流群，而马列毛主义继续革命社则转入半地下形式，专注联络与吸收真正的积极分子。

(四) 注意事项

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活动平台，XMPP 自然引起修正主义当局的高度关注，正如电报被警察关照一般。为保障个人与组织的安全，特提出以下基本保密守则：

1. **严禁泄露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居住城市、精确年龄、外貌

特征、墙内社交账号、语音等；

2. **处理文件元数据**：在发送 PDF、DOCX、图片等文件前必须清除元数据，禁止上传墙内平台的截图，也禁止将 XMPP 截图外泄。
3. **开启加密通信**：
 - 路径：右上角菜单→设置→安全→勾选“始终使用 OMEMO 加密”。
 - 关闭默认信任：右上角菜单→设置→安全→关闭“验证前盲目信任”。
4. **其余安全措施**
 - 关闭通知：右上角菜单→通知→消息通知设置→关闭“允许通知”
 - 禁止截屏：右上角菜单→设置→界面→操作系统→关闭“允许截屏”
 - 隐藏下载内容：右上角菜单→设置→附件→接收→打开“在图库中隐藏媒体”，打开“近将媒体储存在缓存中”

至于详细的安全技术教程可在附页阅读。

(五) 推荐群组

以下为当前值得参与的革命群组（加入需先通过哨塔审核）：

1. **马列毛主义文革斗争社**地址：gbudn19@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审核群：[哨塔 @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https://哨塔@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2. **无产阶级工程部**地址：[无产阶级工程部 @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https://无产阶级工程部@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审核群：[哨塔 @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https://哨塔@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3. **马列毛主义人民武装部**地址：mlmcr@conference.ubuntu-jabb.net
审核群：[@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https://t.me/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4. **伐修社 - ARC 马列毛主义交流频道**
地址：arcout@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审核群：[@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https://t.me/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更安全的安装 xmpp 教程

0x3b80001

安卓手机紧急安全指南

首先，你需要在手机中创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本文适用于安卓手机，即鸿蒙 NEXT 的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除外的手机。如果你是这些设备，可以考虑只使用 Windows 设备从事革命工作。之后买手机时建议购买一加或者闲鱼上搞个二手洋货作革命机，此处不铺开。

关闭一些中资特性

如果关不掉可以考虑不关。

打开开发者模式

国内 ui 优化最好关掉，不然一些应用可能出问题，其实也没有什么优化。开发者模式这个东西以后可能也不可避免用到。

基本转自 [CSDN 文章](#)

- 不同的设备开发者选项界面所在的位置或所用的名称可能有所不同
- 进入“设置-关于手机”页面

- 找到设备的版本信息、或是安卓版本号、或是软件版本号 > 不知道是哪个，也可以把关于手机页面每个版本信息点过去，快速点击多次，如果是正确的，就会有提示“再点 x 次即可开启开发者模式”>
- 快速点击最多 7 次，就可以看到“已开启开发者模式”的提示
- 返回“系统管理”或是设置页面，就可以看到“开发者选项”，一般都在页面偏下的位置。

以下一部分品牌的开发者模式对应开启位置：

设备	设置
Google Pixel	设置 > 关于手机 > build 号
Samsung Galaxy S8 及更高版本	设置 > 关于手机 > 软件信息 > 版本号
LG G6 及更高版本	设置 > 关于手机 > 软件信息 > 版本号
HTC U11 及更高版本	设置 > 关于 > 软件信息 > 更多 > 版本号或者设置 > 系统 > 关于手机 > 软件信息 > 更多 > 版本号
一加 5T 及更高版本	设置 > 关于手机 > build 号
小米	设置 > 我的设备 > 全部参数 > MIUI 版本
vivo	设置 > 系统管理 > 关于手机 > 版本信息 > 软件版本号
华为	设置 > 关于手机 > 版本号

关闭某某 UI 或者某某 OS 优化

往下翻，找到相关选项即可。

如果提示你有风险，不要相信。

使用 shelter

下载安装

链接：

- [当下软件园](#)
- [F-droid](#)

xx 软件园能不能用？其实可以。只要普通下载（本地下载），不下 p2p 或者捆绑“推荐”工具就行。一般藏毒，毕竟 md5 校验很容易。国内下载这里可能是最好找的了。

克隆系统浏览器

就是那个广告超多的垃圾捆绑系统的浏览器。之所以要这个是因为不少国产系统 shelter 无法克隆非系统应用。

System Webview 也可以克隆一下

如果你 shelter 外面已经有革命应用了，靠这个系统浏览器，重走一遍当初配置机器就行。（如果你刚开始制作革命工作环境，往下看即可。）

使用 F-droid 安装革命软件

下载安装

链接：

- [旋风软件园](#)
- [Github](#)

更好清华源

外国源下载太慢了，建议更换清华源。

复制

```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fdroid/repo/  
?fingerprint=  
43238D512C1E5EB2D6569F4A3AFBF5523418B82E0A3ED1552770A  
BB9A9C9CCAB
```

在 fdroid 中，设置，储存库，右下角+号，手动输入 url，复制进去确认即可。

接下来，在储存库页面，点开 F-droid 储存库，取消所有官方镜像，不然可能会很慢。

安装应用

在 F-droid 最新页面下拉刷新储存库，右下角放大镜搜索安装应用。

推荐先下好的应用名称；搜索关键词

- 小企鹅输入法；fcitx

更换输入法

先更换掉系统的监听输入法。去到设置（生活资料里的），搜索输入法，切换工作设置，禁用其他输入法，启用小企鹅。

有的系统重启后输入法变回去了，可以用 adb 卸掉系统输入法，简单起见，这里先提供土办法，开机后重新设置一遍即可。

接下来搜索安装剩下应用，如：

- Proton VPN；proton
- 质感文件；质感
- VLC 应用播放器；VLC
- monocles XMPP 客户端；monocles

底下有更新一栏，记得及时更新应用。

安装浏览器

总要换掉系统浏览器的，个人推荐 Kiwi Browser，因为是唯一开源的支持扩展和开发者工具的浏览器。可以使用克隆的系统浏览器下载软件园文件。

- **多多软件站**（139 版本，比较新，请点击安卓下载）

- [Github 官方发布](#)

Windows 系统紧急安全指南

卸载杀毒软件等可替代或不必要的中修软件

中修软件可能记录你的活动上报

如：

- 杀毒软件
- 解压工具
- 看图工具

具体步骤：

- 按 Win 键，搜索控制面板
- 程序，程序与功能（有时候直接是程序与功能）
- 找到对应程序，卸载

尽可能使用安全自由的软件

下列软件遵循安装教程走即可，如果没有管理员权限，可以安装到其他目录，如 D 盘，建议创一个文件夹，如 APPS 安装在里面。

解压软件，下载 [7zip](#) 即可

输入法推荐小狼毫。

- [旋风软件园](#)
- [官网](#)

办公软件如果是 Microsoft Office, 暂不用替换, 但打开革命文件时仍建议替换为 onlyoffice。(

如果是 WPS, 在打开革命文件时建议替换为 **OnlyOffice**。

若没有电脑管理员权限, 你可以暂缓安装(有办法, 但麻烦)可使用 onlyoffice 在线版, 建议准备好 Proton 邮箱注册。

处理无法替代中修软件开机自启动

- Win (windows 标志) R 输入 msconfig, 回车 (Enter), 找到启动 (Start up) 去除对应软件取消勾选
- 或者 Ctrl Shift Esc 进入任务管理器点击启动取消勾选

注意尽可能不要让革命软件和中修软件同时运行, 可在任务管理器中杀死进程来强制结束运行。

使用安全浏览器

可以使用 **Chrome**, 墙内可访问

以及推荐, **Ungooled Chromium**, **Superium** (win 7 运行高版本 chromium), **Tor browser**, 但需要翻墙或者使用 TlsFragment。

Chromium 是一个开源浏览器内核, 基本所有除 Firefox 和 Tor (基于 Firefox) 的浏览器都是基于 Chromium 的, 最初由 Google 开源

为什么不用 Edge Microsoft 和中修疑似有点近，不排除直接给中修上传浏览记录，同理不建议用 Outlook 邮箱。

Github Release (发行版) 界面点开 Assets (附件)，一般都能找到文件。

网络安全入门

接下来简要介绍一些网络安全重点

简论

互联网访问就像送信。送信有三者参与：你（客户端），对面（服务端），邮差（中间人）。信封是无法被除了对面以外的人打开的。但是信封上写了发件人地址（你的 IP 地址），收件人地址（对面的 IP 地址），收件人名称（网站名）等。

中修的国家机器控制了邮差。所以邮差会根据收件人地址和收件人名称丢弃信件，实现封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把一封信连着信封塞到另一封信里，发给代理（代理服务器）。

单纯把一封信塞到另一封里特征过于明显，可能被中修发现并封锁。所以有一些技术手段来避免中修发现

最终结果是：

中修啥也不知道。代理服务器知道你访问的网站和你的 ip。网站知道你访问的内容，发的信息，但不知道你的 ip。

还有一些技术手段减少泄漏的信息，但是这里不多讲。

祸从口出

我们知道墙内是实名的，你说啥警察都知道你是谁住在哪里。因此不要和墙内身份关联。

首先，username（用户名）不要和墙内有任何管理，随便挑一个正面的英文单词，或者中文词组转拼音。如 Advance，或者 jinhou。个人建议避免中文用户名。

然后，不要讲自己的墙内身份。如果有人问你哪来的，最多告诉他平台，如 qq 来的，b 站来的。对同志的信任需要时间。

还有，不要截取墙内平台的图片，或者转发墙内平台的言论。

最后，密码不要太弱，比如 123456。至少大小写字母加数字。如 GEPH1893xj
嘴巴关严实了，信写得没漏洞了，我们来确保网络不泄漏，送信安全。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搞一个代理了。

推荐代理软件

有条件的同志建议亲自去官网查看最新版。

迷雾通

官网；官方安卓下载；官方 Windows 下载；官方 GNU/Linux 下载
安卓镜像以下链接一个一个尝试下载：

- [下载](#)

- [下载](#)
- [下载](#)
- [下载](#)
- [下载](#)
- [下载](#)

下载慢正常，等就行

注意！！迷雾通和一些 xmpp 服务器不兼容！若使用迷雾通翻墙，注册时建议使用 conversations.im 服务器注册。

中文界面，比较好操作。

注册新账户，人机验证码先要点注册才会显示。

注册成功之后登陆，就可以连接了。

proton VPN

[官网](#)；[官方 Win 链接](#)（需要自己选择系统，一般是 x64 架构）；[官方安卓 Fdroid](#)

安卓镜像以下链接一个一个尝试下载：

我非常建议使用 fdroid 安装。fdroid 安装可见 [Android 紧急安全教程](#)。记得更新，有时候连不上是因为版本太低，协议太老。

- [下载](#)
- [下载](#)
- [下载](#)
- [下载](#)
- [下载](#)

之后

1. 点 create an accout (创建账户)

2. Get a new encrypted email account (获取 proton 账户)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邮箱, 但没有专业知识不推荐, 中国人用的大部分邮箱并不安全, 而且 proton mail 一定意义上其实是后续必要的。
3. 填写 username, domain 为 proton.me
4. 设置密码, 上下输入一样的, 确认没有打错
5. 让你输入 recovery method (重置办法), 点 skip
6. human verifaction (人机验证), 直接完成拼图即可。
7. 等一会儿
8. Get started (开始)
9. Not now (现在不购买 plus)
10. 然后底下操作栏 settings, protocol 选 Stealth.
11. 回到主界面 connect 即可连接

XMPP 注册教程

安全事项

我们是在重重监控下选择的 Xmpp, 那么这逃离监控的技术也必然是中修所注意的。

先讲讲 Xmpp 能够成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通讯方式的原因

不同于国内的 QQ, 微信, Xmpp 账号的注册不需要邮箱, 不需要手机号, 也就是没法直接通过你的账号信息来找到现实的你

但是, 并不意味着在 Xmpp 上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你需要保证你的 Xmpp 账号的名字与头像, 和你在 QQ, 微信上的信息隔离开来**, 如果你没做到这点, 那么请新建一个满足此点的账号

因为 Xmpp 账号注册是 0 成本的，所以在 Xmpp 上的公开群组，是极大概率会受到中修的视奸的

所以你除了需要注意账号信息以外，还需要注意言行：

不要泄露你在国内平台的一切信息，如 QQ 号，微信号...不要泄露你在国内平台做过的行为，不要泄露你的年龄，学历，身高，性别，所在地（最好省级都别），不要泄露你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

如果有人询问你有关个人的信息，特别是在你并不认识对方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回答，并且要拉黑他，这样的人很可能是网警，需要高度警惕

服务器

XMPP 是一个去中心化协议，所以有不同的服务器，这是一些推荐的服务器，有一些不需要翻墙，但是强烈建议下载 vpn：

- draugr.de
- conversations.im
- chalec.org
- chatrrix.one
- hookipa.net
- jabber.fr
- jabjab.de
- macaw.me
- magicbroccoli.de
- redlibre.es
- suchat.org
- xmpp.earth
- yax.im

- 07f.de

你需要再想好一个用户名和服务器名组成地址，密码，然后准备注册 (register)。

客户端

用户名 @ 服务器名组成 Jid

输入你要注册账号的名字 (一般都是小写字母 + 数字的组合，中文名仅部分服务器支持)

设置密码时，一般服务器都会要求有大小写组合，以及数字，不小于 8 的长度

如果有一张图片，上面是一些扭曲的数字，就是人机验证，看仔细它显示的图片，输入你看到的就行了

网页端

如果你实在不想装任何应用，有一些 xmpp 网页端。我改了两个。

- **ConverseJS**，底下有个 Create An Account 表示注册一个账号。登录后加群在 GROUPCHATS 右边有个 + 号，点了之后填入 Group Name 群聊地址 (我认为这个英文不好) 和 Nick Name 表示加入后的昵称，然后 Join 加入。
- **XMPPWeb**，非常轻量级，以至于没有注册功能。加群在左边最底下，Create A Room 上面，左边输入地址，点击右边进入

Android 端

推荐 Monocles, Fdroid 可以下载。

安装然后你会进入它的初始界面，你需要添加一个 xmpp 账号，点击创建账号

然后它会让你选择服务商，你可以选择 conversations.im，不过，有可能你所在的地区会很难连接到它们的服务器。

如果你确实没法使用 conversations.im 作为服务商，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选项，使用其他的提供商

然后选一个你可以连接得上的（推荐 draugr.de），按流程注册好账号即可进入后注册完点联系人，右下角 + 号，新联系人或频道，输入 xmpp 地址，加入（写消息）就行。

Windows 端和 GNU/Linux 端

推荐 Gajim，需要 Win10 及以上或者 GNU/Linux。

- [官网 Windows 下载](#)
- [官网 GNU/Linux 下载](#)

Windows用户按 [Win]+[R]，输入 cmd，在 cmd 里输入 winget install gajim.gajim，以此来下载，比较方便

下载完成后，打开它

接着，你会进入”欢迎界面”

点击下方的注册

然后它会让你选择提供者（推荐 draugr.de）

点击开始聊天，输入群聊地址，双击开始新聊天

在右下角设置一个昵称，再点击加入，你就可以进群聊了。

进群后点击右上角往左数第三个按钮，可以查看群公告，请仔细阅读哟



誓与还乡团血战到底

正下批
造反派

誓将贵校化宏图

挥泪继承主席志

悼